自 序

“竹枝词”是一种由古代巴蜀地区的民歌演变而来的诗体，一般认为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第一个把四川的民歌《竹枝》演化为文人的诗体，因而名为“竹枝词”。这种诗体具有鲜明的民间歌谣格调，又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所以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也受到当时以及后世诗人的推崇，对后代影响很大。许多有名的诗人都写过“竹枝词”。

沈云先生的《盛湖竹枝词》成书于民国七年（1918），全书分上、下两卷，共选录竹枝词200首。这是一本以竹枝词为载体，全面反映盛泽的历史、人文、经济、社会、民俗、景观、特产等方方面面内容的诗集，诗集后还附以《盛湖杂录》，因此可以把它视为《盛湖志》的极好的补充。

《盛湖竹枝词》的作者沈云（1864~1921）字秋凡，原籍浙江秀水（今嘉兴），生于盛泽。沈氏系王江泾望族，1860年为避兵祸，其父举家迁居盛泽。沈云先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文学功底极深。1901年，里人郑慈谷（柳亚子先生的岳父）在自家的大厅世泽堂创办了盛泽的第一所学校——郑氏小学，1903年郑慈谷又与张嘉桐、洪鹗在太平桥堍的东书院原址上创办盛湖公学（后改名为吴江县第三高等小学），沈云先后受聘为郑氏小学和盛湖公学的教师。沈云还是南社的早期社员。

沈云为撰写《盛湖竹枝词》耗费了十年的心血，不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还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盛泽情状作了详实的调查，因此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真实、生动的画面，让后人能对百年前的盛泽有较为明晰的了解。

《盛湖竹枝词》成书之时，就受到当时社会名流的好评，柳亚子、陈去病、范烟桥、陈次青、洪雄声、张嘉荣、简书勋、孙光文、李世由（时任吴江县知事）、徐佩青、曹咏絮等人分别赋

诗填词祝贺，李世由、唐佩金为之作序，柳亚子、李世由、洪雄声、郑式如等筹资为之刊印。

三十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收藏了一册《盛湖竹枝词》，爱之如宝，反复研读，并将它作为写作时的资料依据，得益匪浅。

光阴荏苒，《盛湖竹枝词》成书至今已近百年，当时印刷的数量又十分有限（仅印了800册），故而如今能看到此书的人极少，再说诗后的附注又过于简略，不熟悉文言文的人也许难以读懂。

100年来，盛泽的变化天翻地覆，今天的年轻人对百年前的盛泽已经陌生，因此，一些关注盛泽历史的读者希望我能为此做些事。自2007年起，我在《吴江日报》的专栏《谈古论今说盛泽》中发表了78篇短文，介绍盛泽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重点介绍丝绸文化方面的内容，引起了不小的反响，2009年专栏结束时由古吴轩出版社结集出版。随后，我又抽时间重读《盛湖竹枝词》，并查阅了清乾隆以来的几本《盛湖志》、《盛泽镇志》和其它地方志，开始为沈云先生的《盛湖竹枝词》撰写《新注》。《沈云〈盛湖竹枝词〉新注》的撰写前后历时近3年，至2012年5月完稿，并自2011年12月起在《盛泽周报》上以专栏的形式连载。

《新注》以沈云先生的原注为本，对竹枝词的内容重新进行注释和解读，并添注更多的历史资料、百年来的变化以及今天的现状，力求让今天的读者能读懂，以进一步了解盛泽的历史文化。

在第十三届盛泽丝绸文化节即将开幕之际，谨以此书向丝绸文化节献礼。

沈莹宝

2012年8月15日于静远斋

思绪飘飘

傍晚的一场大雨，冲走了夏末秋初时节难耐的炎热。在这难得一见的凉爽好天气里，人们的步履不再匆忙，脸上的神态也安宁了许多。如此好的天气实在令人舒心，激起我心中一阵莫名的冲动，想去孩提时曾经戏耍过的旧时弄堂寻找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我不知道，但是它确实在我心底涌动着，复杂而真切，却不知道该用什么词语去准确地表达。为此，我的心底浮起一丝惆怅。

我在幽深而苍老的小弄堂里徘徊，耳边不时重复着沈莹宝老师的声音："亦红啊，想请你为《沈云〈盛湖竹枝词〉新注》写点文字，谈谈你的感受……"这是他前天与我通电话时提出的要求，他的声音虽然一如既往的亲切随和，可当我放下电话后就有点不知所措了……

沈老师即将出版的新作《沈云〈盛湖竹枝词〉新注》是为我的曾祖父沈云先生的《盛湖竹枝词》所作的新注，通过他的视角重新诠释了《盛湖竹枝词》中所描绘的盛泽历史文化。此举让我既钦佩又感动。

沈老师是我们盛泽的文化名人，为盛泽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和他接触比较多。沈老师对家乡盛泽充满了感情，对盛泽的文化渊源如数家珍，作为晚辈，我对他十分敬佩，每次聆听沈老师用通俗亲切的话语介绍盛泽文化时，我都觉得在享受中受益匪浅。曾经有领导赞誉沈老师是我们盛泽的一张文化名片，而盛泽的丝绸文化也因为沈老师的娓娓道来而更具魅力。

在《沈云〈盛湖竹枝词〉新注》中，沈老师用行云流水般朴实自然的文字为盛泽的历史文化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相信

我的曾祖父泉下有知也会感谢沈老师的。然而，当沈老师邀我写点感受的时候，我真的感到很惶恐与惭愧：我的曾祖父饱读诗书，为地方历史文化倾注了大量心血，写作了200首《盛湖竹枝词》，受到柳亚子先生的肯定并成为南社的社员，而作为后辈的我，虽然是一名文化工作者，平时工作也不敢怠慢，却未曾潜心研究过家乡的历史，对盛泽的文化积淀知之甚少，和先人的那份成就相比，我无法不愧疚和惶恐。

思绪飘飘间，我迈步踏上斜桥，站立于桥头凝神眺望。曾祖父的旧居就在斜桥的附近，这里的石桥、弄堂和一湾悠悠的碧水我都十分熟悉。面对眼前的一切，我突然感到从未谋面的曾祖父是那么的亲近和温暖，我想，除了那份血液里流淌着的亲情，或许还因为我们都深怀着一份对盛泽文化的热爱之情吧。

雨后的暮色格外的清新，暮色中的盛泽散发着江南古镇迷人的气息，此时，我心中那份莫名涌动着的情感似乎渐渐地清晰起来：初秋的微风中，我穿越弄堂时体会到的是一份对曾祖父的亲近感和对盛泽历史文化的亲近感，而触动我追寻这份感觉的，是沈莹宝老师以及他的《沈云〈盛湖竹枝词〉新注》。作为沈云的后人，我感谢沈老师对曾祖父沈云先生文化成就的肯定和重视；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我更感谢沈老师又一次为盛泽文化作出了贡献，《沈云〈盛湖竹枝词〉新注》的出版，将再次为老盛泽人增添一抹历史的记忆，让新盛泽人感受一份文化的浸润。

沈亦红

2012年8月22日

（作者系盛泽镇社会事业局文教科副科长、盛泽镇文联副主席）

目　录

自序 ……沈莹宝
思绪飘飘 ……沈亦红
一、合路村 ……001
二、盛斌结寨 ……002
三、盛章食邑 ……003
四、竹堂古祠 ……004
五、东庙与西庙 ……005
六、半巢居 ……006
七、西湾渔舍 ……007
八、红梨渡 ……008
九、九娘坟 ……009
十、沈万三轶闻 ……010
十一、廉吏阿撒都剌圆 ……011
十二、史仲彬轶闻 ……012
十三、西村先生 ……013
十四、明真道院 ……014
十五、目澜洲 ……015
十六、碧霞行宫 ……016
十七、圆明禅寺 ……017
十八、庆寿庵 ……018
十九、钱王墓 ……019
二十、烂溪周氏 ……020
二十一、海瑞祠 ……021
二十二、窦峰园 ……022
二十三、王孙旧宅 ……023
二十四、龙庵借读 ……024
二十五、卜梦熊 ……025
二十六、卜舜年 ……026

二十七、洞真宫 ……027
二十八、衫衫子轶闻 ……028
二十九、石门王氏 ……029
三十、三家村朱氏 ……030
三十一、汤三俊轶闻 ……031
三十二、一门俊士 ……032
三十三、周灿 ……033
三十四、朱明德轶闻 ……034
三十五、贞白楼 ……035
三十六、折芦庵诗僧 ……036
三十七、徐铮轶闻 ……037
三十八、孝子张天章 ……038
三十九、殉难池 ……039
四十、凌巷 ……040
四十一、徐佛轶闻 ……041
四十二、名姝柳如是 ……042
四十三、明月藕花共一楼 ……043
四十四、一门风雅 ……044
四十五、汤尹娴轶闻 ……045
四十六、张小姑抗婚 ……046
四十七、秀才浜 ……047
四十八、秀园 ……048
四十九、西园 ……049
五十、归鸿骧 ……050
五十一、无患木 ……051
五十二、计东 ……052
五十三、思子亭 ……053
五十四、丹青妙手 ……054
五十五、睐娘与香木城 ……055
五十六、拾锦塘 ……056
五十七、朱逢源轶闻 ……057
五十八、行行且止亭 ……058

五十九、仲有余寻父 ……059
六十、集寿老民 ……060
六十一、汪文柏 ……061
六十二、释力成轶闻 ……062
六十三、诗人之家“春晖堂” ……063
六十四、史善长轶闻 ……064
六十五、鸾影遗稿 ……065
六十六、话雨楼王氏 ……066
六十七、沈烜轶闻 ……067
六十八、停云读画楼 ……068
六十九、话雨楼寓贤 ……069
七十、钱杜轶闻 ……070
七十一、张孝子坊 ……071
七十二、红梨诗社 ……072
七十三、仲湘轶闻 ……073
七十四、李筠轶闻 ……074
七十五、沈曰富 ……075
七十六、郑氏昆仲 ……076
七十七、陈宗元 ……077
七十八、华阳堂 ……078
七十九、孙金彪轶闻 ……079
八十、庚申旧事 ……080
八十一、轧杀桥 ……081
八十二、愚孝旧闻 ……082
八十三、甘旨奉母 ……083
八十四、清末书家 ……084
八十五、清末画师 ……085
八十六、李龄寿 ……086
八十七、文采风流五百年 ……087
八十八、汪守愚 ……088
八十九、徐孝子 ……089
九十、陈其荣轶闻 ……090

九十一、井砖桥石上的历史 ……091
九十二、终慕桥 ……092
九十三、斜桥 ……093
九十四、文起阁 ……094
九十五、迎风庵 ……095
九十六、小洞庭 ……096
九十七、三义士墓 ……097
九十八、白马泉 ……098
九十九、普同塔 ……099
一百、山塘上 ……100
一百零一、绮疏曲阑 ……101
一百零二、山家坝与绿葭潭 ……102
一百零三、前姚与下姚 ……103
一百零四、画师桥 ……104
一百零五、菱叶渡 ……105
一百零六、桥梁与坊巷 ……106
一百零七、白龙桥 ……107
一百零八、澄溪桥 ……108
一百零九、庚申亭 ……109
一百十、绸市 ……110
一百十一、庄面 ……111
一百十二、会馆 ……112
一百十三、绍兴人 ……113
一百十四、县丞署 ……114
一百十五、慈善业 ……115
一百十六、吴绫 ……116
一百十七、丝织女 ……117
一百十八、绸贱伤民 ……118
一百十九、领投 ……119
一百二十、香云纱 ……120
一百二十一、弄堂 ……121
一百二十二、电灯公司 ……122

一百二十三、疏浚市河 ……123
一百二十四、渔业争端 ……124
一百二十五、长庆坊火灾 ……125
一百二十六、灾后重建 ……126
一百二十七、沉船旧闻 ……127
一百二十八、东西两书院 ……128
一百二十九、洋学堂 ……129
一百三十、瞎子算命 ……130
一百三十一、“念佛偈” ……131
一百三十二、时医“飞邀” ……132
一百三十三、“扑克”西来 ……133
一百三十四、天然美 ……134
一百三十五、时髦女郎 ……135
一百三十六、时尚饰物 ……136
一百三十七、“文明”婚礼 ……137
一百三十八、闹新房 ……138
一百三十九、“毛脚女婿” ……139
一百四十、“敲猪头” ……140
一百四十一、十庙烧香 ……141
一百四十二、慈渡庵 ……142
一百四十三、观音堂 ……143
一百四十四、永庆庵 ……144
一百四十五、五楼十阁 ……145
一百四十六、莲花池与莲子兜 ……146
一百四十七、养正社 ……147
一百四十八、大钟圩黄雀 ……148
一百四十九、圩名谣 ……149
一百五十、“挑脚秆” ……150
一百五十一、九曲 ……151
一百五十二、轮船 ……152
一百五十三、时鲜蔬菜 ……153
一百五十四、水乡美味 ……154

一百五十五、湖鲜 ……155
一百五十六、青壳螺蛳青口蚬 ……156
一百五十七、薹心菜 ……157
一百五十八、黄花鱼 ……158
一百五十九、河蚌 ……159
一百六十、酱肉 ……160
一百六十一、杜瓜 ……161
一百六十二、腌菜 ……162
一百六十三、土银鱼与针口鱼 ……163
一百六十四、菱角 ……164
一百六十五、云片糕 ……165
一百六十六、蒸缸羊肉冬酿酒 ……166
一百六十七、绸糖 ……167
一百六十八、定胜糕 ……168
一百六十九、点心 ……169
一百七十、过新年 ……170
一百七十一、请厕神 ……171
一百七十二、接路头 ……172
一百七十三、刘猛将神 ……173
一百七十四、马灯会 ……174
一百七十五、开庄日 ……175
一百七十六、小满戏 ……176
一百七十七、上花坟 ……177
一百七十八、网船会 ……178
一百七十九、双阳会 ……179
一百八十、坐蒲墩 ……180
一百八十一、轧神仙 ……181
一百八十二、蚕关门 ……182
一百八十三、看花蚕 ……183
一百八十四、“小暑一声雷” ……184
一百八十五、“上看初三下十六” ……185
一百八十六、立夏称人 ……186

一百八十七、端午旧俗 ……187
一百八十八、暑月食素 ……188
一百八十九、七夕乞巧 ……189
一百九十、观音赛会 ……190
一百九十一、中元对歌 ……191
一百九十二、宝塔灯 ……192
一百九十三、盂兰盆会 ……193
一百九十四、狗屎香 ……194
一百九十五、重阳节 ……195
一百九十六、烧香船 ……196
一百九十七、“开租欠” ……197
一百九十八、小年夜 ……198
一百九十九、祭年神 ……199
二百、过房亲 ……200

一、合路村

沧桑几阅市廛存，谁识当年合路村。
青草滩原瓯脱地，后人何事效争墩？

盛泽地处江苏、浙江两省的交界处。春秋时期（前770—前476），这里是吴越两国的边城之地，说不清属于吴国还是越国，故而盛泽最早的地名叫“合路”；到三国时期（220—280）又名“青草滩”；直到南宋时，才有了“盛泽”的名字。

清乾隆《盛湖志》上有这样一段记载：“盛泽古名合路。因春秋间吴越相争……盛泽与黄溪皆边城之地，可为吴，可为越，难为分析，故名合路。后禾城（嘉兴）迁徙，是处化为青草，故（三国）孙吴时名为青草滩。至唐宋时仍名合路村。”沈秋凡在《盛湖杂录》的《盛泽成镇始末考》中推断：“唐宋时犹名合路，是盛泽之名必起于南宋矣。”

两千多年来，盛泽历经沧桑，现如今已发展成为经济繁荣的丝绸重镇，与当年的合路村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秋凡先生发出了“沧桑几阅市廛存，谁识当年合路村。”的慨叹。

由于早年间文字记载的缺失，以往的吴江地方志上对于合路、青草滩、黄溪等地名的归属关系，说法不一。秋凡先生认为青草滩本是“瓯脱”之地，故而不必再为此争辩不休了。

“市廛”是指商店集中的地方。

“瓯脱”一词在匈奴语里意为“边境屯戍或守望之处”，指边境地区双方之间的缓冲地带。

二、盛斌结寨

元戎小队驻郊坰，壁垒湖滩草色青。
寨泽音讹碑可证，异闻曾载宋图经。

关于盛泽镇名的来历，史料记载有几种说法。“盛斌结寨”即其中一说。

沈秋凡所著《盛泽成镇始末考》载：“汤豹处贮真斋笔麈云：盛泽荡，古名盛寨湖。天启三年（1623），耕夫锄地得南宋单昇墓碑，称阡（迁）于澄源乡盛寨荡之濒（水边）。余初不晓盛寨二字之义，及阅《祥符图经》乃知，孙吴赤乌初，盛斌为司马领濠寨，建围作田，结寨于此，故名。今荡之东北隅有寨湖，则寨字之讹作入声，乃因寨与泽其音相近耳。”

根据汤豹处查阅宋《祥符图经》后考证：三国时期，孙吴赤乌三年（240），吴大帝孙权命上大夫倪让、将军徐杰、司马领濠寨盛斌分拨地界建围、作田、屯兵，自青草滩筑寨至野和溪（即今黄家溪）。老百姓称盛斌结寨之地为“盛寨”，后来因为“泽”与“寨”读音相近，所以又把“盛寨”渐渐地讹传为“盛泽”。

汤豹处是明末清初时的盛泽名人，好吟咏，善鼓琴，书画尤工，他在《贮真斋笔麈》中所记载的“澄源乡（唐中期后，盛泽之地属嘉兴澄源乡，后梁开平三年（909）设吴江县，澄源乡划归吴江）盛寨荡”，又称“盛寨湖”、“盛泽荡”、“盛湖”、“舜湖”，即今天的西白漾的古名。他的文章中所载之事应该可信。

如果“盛斌结寨”之说可信，那么盛斌应该算是开发盛泽最早的一位前辈了。

“元戎”是主将的意思，“郊坰”即郊外。

三、盛章食邑

开国南迁姓氏传，东西大泽至今沿。
万家烟火由来盛，何待朱明成化年。

关于盛泽镇名的由来还有一说，即“盛章食邑”。

清乾隆《盛湖志》称：“宋南渡后，临安盛章以建都之所第宅丛集，一廛月数十金，遂迁吴江之二十都(亦有它志称迁一都)。后论功封章为吴江开国伯，食邑于此，土田第宅在在有之。一都为盛庄，二都为盛家舍，四都为盛乌田，十七都为盛墩，其地(他)若盛家田、盛家廊、盛家汇，不一而足。而二十都其旧居也，东西连大泽，遂名盛泽；市东犹有盛家港、盛家荡，至今子孙犹居之。”

盛章，字如晦，临安人，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敷文馆学士，后因功封为吴江开国伯，食邑于此。由于盛章在吴江一带拥有大量的田产，其子孙繁衍散居于城乡各处，因此留下了许多冠以“盛”字的地名。他的旧居在二十都（“都”是旧时的一级行政区划），因东西两边都是大湖，故而名为盛泽，似乎也说得通，但同治《盛湖志》认为：“盛泽因章得名，无可征考，姑从阙疑。”

关于盛泽兴盛的时间，历来颇有争议。《盛泽镇志》称：“明弘治年间，盛泽仍以村名，居民仅五六十家。嘉靖《吴江县志》始称盛泽为市。”一般史料也认为盛泽直到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才因丝绸织造业的形成而逐渐繁盛。但是，史料中又有“晋泰始五年（269）建庙桥（东庙桥）”、“（唐）开元二年（714）建善嘉桥”、“开元八年（720）建龄嘉桥”、“（宋）雍熙二年（985）建登椿桥”、“元末（1368年前），沈万三建南胜坊、北胜坊”的记载。试想，从东庙桥到善嘉桥不足500米的市河上，宋朝时已建起四座桥，元末又建成两处街坊，怎么可能到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还是个村呢？难怪秋凡先生要提出“万家烟火由来盛，何待朱明成化年”的疑问了。

四、竹堂古祠

典午七贤联袂游，季鹰画壁竹堂留。
名区例有名人到，祠宇荒凉何处求？

“典午”是晋朝的代称，“七贤”即魏晋时的竹林七贤。相传魏晋之际，朝中斗争激烈，时局纷纭多故。时阮籍与稽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相与友善，他们标榜老庄，崇尚清谈，思想相合，志趣相投，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畅饮，为时人所推崇。这七人都是当时有声望的文学家，他们的清谈、任诞之风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几代文人，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季鹰”是西晋时的文学家张翰，字季鹰，是吴江的历史名人。旧时的吴江“三高祠”中所祀的三位吴江名人中就有张翰（另两位是范蠡和陆龟蒙）。

竹堂在斜桥西堍。相传竹林七贤曾寓此堂后，故而以堂为七贤祠，名竹堂祠，堂内还有张翰的绘图刻石。宋崇宁二年（1103）盛泽士人仲世昌在竹堂原址建祠，供祀名贤，后来才改建为庵，名北胜庵。

明代卜梦熊所作“盛湖八景”诗中就有“竹堂古祠”一景：“竹堂祠畔水声哀，此日登临愧劣才。野庙残春啼杜宇，古碑无字绣苍苔。清风高节余禾黍，白骨埋香半草莱。圣代只今崇祀典，何当淇澳葺层台。”

一千多年前的盛泽，还是江南乡野之地，芳草萋萋，竹林郁郁，风光一定是十分的清丽。竹林七贤喜爱这“天高皇帝远”的乡村野趣，常来这里雅集，辞官归隐的张翰在此堂内粉壁上涂鸦，那都是骚客们常有的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北胜庵改为盛泽纸品厂的厂房，现已成为民居。

五、东庙与西庙

东西庙貌肃千秋，叔侄成神两济侯。
犹听乡民称老太，金家池畔故居留。

东庙与西庙坐落在老镇区最繁华的商业区北大街（今为舜湖中路）的东西两头。

东庙与西庙祭祀的神是叔侄俩。传说元处士金元七和他的侄子金宁一（字应龙）死后为神，元至正（1341—1368）年间，因“阴翊漕运”被封为利济侯和宁济侯；清康熙（1662—1722）时，又因“黄河沙阻运船，神灵显佑”，两神被敕封为随粮王和威灵王。乡民在盛泽的充字圩东栅建利济侯祠，俗称东老太庙，又在充字圩西栅建宁济侯祠，俗称西老太庙，以后又“拓基建宫寝”，两庙渐成规模。相传镇西北郊的金家池（在中山桥北）就是两神的故居地。

历朝的统治者为了保证京师官、军粮食的供应，令各地百姓每年按期通过水路运送粮食入京，称为漕粮和漕运。因为运输困难，船只消耗，加上官吏侵吞，漕运耗费十分巨大，一石漕粮，实纳常须两石五斗甚至更多。而民运漕粮入京，路途遥远，“漕河又有洪闸浅冻之阻，往复逾年”，因此“漕运病民，为粮长者往往被累破家。”老百姓为求漕运顺利，只能求助于“阴翊漕运”的东、西庙的庙神，于是，两庙的香火也就出奇地兴旺起来。

东庙“旧系观音堂，又称小庙”，故而庙东侧之港仍名小庙港。

东庙与西庙因为地处闹市，因此人气很旺，尤其是东庙的庙场上，每天挤满了各种摊贩和卖艺人，吸引来众多的镇民，其热闹就像上海的城隍庙、苏州的玄妙观。建国后，东庙与西庙改作了粮管所的仓库。1965年，东庙被拆除，在庙址上建起了邮电大楼。

六、半巢居

避乱崖山此结庐，云萝小筑半巢居。
楼倾南北重逢劫，遗额空怀枋得书。

南宋祥兴二年（1279），南逃的宋军与元军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崖门镇）进行了一场海战，宋军全军覆灭，陆秀夫背负八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殉国，元朝最终统一了中国。史称崖山海战。此后，中国第一次完全沦陷于外族，因此崖山海战也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不少外国史学家将宋朝灭亡视为古典意义中国的结束，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南宋承宣郎王复为“避崖山之乱”，隐居于盛泽西肠圩。所居之地“有灌书堂、翠墨居、云萝小筑、潇碧山斋、半巢居、或默轩、南楼、北楼”等，至明末，大多“倾圮殆尽，惟半巢居岿然独存”，其匾额为“宋遗民谢枋得”所书。半巢居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毁于火，如今已踪迹难寻。

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是南宋著名文学家和爱国诗人。他蔑视权贵，嫉恶如仇，诗文豪迈奇绝，自成一家。南宋灭亡后，元朝为拉拢汉族士大夫，先后五次诱降谢枋得，都被他严词拒绝，宁可长期流亡在穷山野岭间，每天穿麻衣草鞋，面向东方痛哭。后来，谢枋得被朝廷押至大都，又以绝食抗争以殉故国。

在江南水乡，水流围起的土地叫作“圩”。百年前的盛泽老镇区，主要包括充字圩、西肠圩、东肠圩、大适圩、大饱圩几个部分。西肠圩东至新桥河，西至西白漾，北至中心市河，南至海角湾以南，是老镇区面积最大的一块土地。

七、西湾渔舍

渔舍几家西一湾，水云深处绿荫环。
石湖烟景分明是，谁撅洞箫数往还。

西湾在西白漾湖滨。元代王朝臣在此筑亭，亭中有匾额“水云深处”。岸边植榆、柳数十株，每至“春夏之交，扶苏交映，蔚然深秀”，风景佳绝，可与石湖烟景媲美。王朝臣常于月夜驾小舟游弋湖上，携洞箫吹奏南唐小令一阕，远远望之飘飘若仙。

王朝臣，字熊翁，元泰定元年（1324）进士，官至太子司经。他“究心经世之学”，熟读天文、地理、阴阳、历算诸书，“吴江州判官张显祖曾以太湖水利之事请教，朝臣详细告明，建议筑垂虹桥，并捐资助工”。当时文风“崇尚词曲，竞为浮艳”，朝臣却“以清真隽雅为宗”。著有《或默轩集》。

明代卜梦熊所作“盛湖八景”诗中有“西湾渔舍”一景：“结茅湖上面芙蓉，莳木成蹊远市东。出网鱼肥桃叶渡，隔篱犬吠荳花风。钓滩日借群鸥宿，津路时容一鸟通。天际欲浮沙草绿，回看归艇夕阳红。”

石湖是苏州南郊的著名风景区，“石湖烟景”深为文人雅士所喜爱。

“撅”，意为用手指按捺。

八、红梨渡

红梨渡口问红梨，芳草萋萋路欲迷。
碑误洪离庵误里，富豪遗迹渺难稽。

红梨湖又名桥北荡，位于老镇区北郊。元末明初之时，富商沈万三“植红梨万树于湖滨以点缀风景”，于是，这湖被当地的文人雅称为红梨湖。明崇祯二年（1629），红梨湖南侧连通西白漾的直港上建成了东旸桥（圆明寺桥），红梨湖也由此而得名桥北荡。

红梨渡在红梨湖南岸。早年间，湖北岸（今胜天、北角、荷花等村）的村民出入镇区全靠湖上的渡船。清康熙年间，村民俞南万在此修建凉棚，供候渡之人歇息，乡人感激俞氏的善举，把渡口称之为俞家渡。每当晚霞满天之时，乡人穿行于红梨林下，在此结伴候渡。此时，湖上波光耀金，湖畔红梨掩映，水面渡船徐行，“红梨晚渡”由此成为盛泽一景。

在红梨湖附近，有许多与“红梨”相关的遗迹和传说，“荡侧有碑，名洪离;有庵,名红里。”这“洪离”、“红里”等名皆“红梨”之讹。时至今日,这些与沈万三有关的遗迹都已踪影难觅。

在盛虹村豆腐港东侧，有一条石板路向北直达红梨渡口。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渡口还在。如今，虽然红梨渡的旧貌难辨，但从残留的部分石板路段和沿路栉比的民居中，还依稀可见当年人流熙攘的热闹场景。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艺龙集团的员工在红梨湖西岸的湖滨浅水中筑起了一道长堤，又在堤内建起楼堂、假山与回廊，建成一座水上园林。近年来，又在园外的大道口矗立起一座雄伟壮观的石牌楼，在水面建造起气势恢弘的楼船“红梨舫”，并改园名为红梨园。

九、九娘坟

九娘荒冢水仙生，岁岁花枝照眼明。
不见滇南夫婿返，陇头惟有鹧鸪声。

九娘坟在胜天村的中山桥畔。

九娘是江南巨富沈万三的第九房小妾，虽然地位低微，甚至没留下姓名，但却是一位极有见识与雅趣的女子。她喜作画，尤善画水仙，“所画水仙翩翩有出世想”。她看到沈万三一家“豪奢无度”，料知家道必定败落，因此不愿住在家中，“请居别墅”，于是沈万三在盛泽西北郊建楼安置九娘，人称“九娘楼”。

沈万三虽然富可敌国，却因富而惹祸，最后落得个充军云南的下场。《明史·马后传》记载：“洪武时，吴江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

九娘死后，葬于湖之北中山桥畔。传说九娘坟旁每年长出水仙，“去之复生”。据当地长者说，九娘坟虽早已湮没，但坟前的石阙直到1958年才被毁。

九娘楼所在的地方，老百姓称之“楼下”，就在今天红梨湖西北侧的荷花村一带，直到民国时，这里仍名楼下乡。

十、沈万三轶闻

建坊置井事迢迢，洗碗池荒傍小桥。
闻说当年陶穴地，至今村落尚呼窑。

建坊，指沈万三于明洪武（1368—1398）初在盛泽建造南胜坊、北胜坊“以兴市廛”。据清乾隆《盛湖志》记载，南胜坊在“西肠圩南浜处”，北胜坊在“充字圩斜桥处”，“皆里人沈万三所建”。南浜，即红木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被填平成路。市廛，是商肆集中之处，即今天所说的商业区，沈万三在600多年前已在盛泽建造商住用房，可以算是盛泽房产开发的鼻祖了。

置井、洗碗池，指斜桥西堍曾有万三井和洗碗池，据说都是沈万三留下的遗迹，但今天都已无迹可寻。此外，沈万三还在镇东的前窑、后窑建造烧制碗的窑，现在虽然窑已不在，却留下了地名。如今的前跃村，原名前窑。

关于沈万三的发迹，传说极多，其中一种说法是“通番”。据《吴江县志》载：“沈万三有宅在吴江二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说他通过海外贸易而致富，较为可靠。古代，中国出口的大宗商品主要是丝绸、陶瓷和茶叶，盛泽盛产丝绸，故而沈万三会在盛泽建街坊、置碗窑，并建九娘楼，便于在此经商和管理资产，于理可通。

此外，关于沈万三的名字，也颇有争议。一说沈万三名富，俗称万三，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一说明代将每县人口分为哥、畸、郎、官、秀五等，哥最低，秀最高，每等中又分三个小等；巨富则被称为万户三秀。沈万三秀，意为姓沈的、最高等的巨富，后来“沈万三秀”渐渐简化为“沈万三”或者“沈秀”。秋凡先生认为：“万三秀”乃粮长之称，“诸记载称沈富曰万三，或曰秀，皆误也。”

十一、廉吏阿撒都剌圆

故元宫阙已销沉，抔土犹留廉吏箴。
读罢残碑空洒泪，谁将宰木比堂阴。

达鲁花赤是元朝的官名，为所在地方、军队和官衙的最大监治长官，掌握最后裁定的权力。元朝的路、府、州、县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置达鲁花赤，虽然品秩与路总管、府、州、县令相同，但实权大于这些官员。

吴江县在元代升格为州。清同治《盛湖志》载：后至元元年（1335）九月，吴江州达鲁花赤阿撒都剌圆卒于任上。阿撒都剌圆为官清廉，家贫不能葬，靠知州刘太初等支助，葬于盛泽北仲家弄。原有墓碑，后陷入土中，以至消失在瓦砾之下。其子孙居于墓旁，据说黎里萧姓为其后裔，故又称萧剌史墓。

元代，北仲家弄一带想必还是荒野之地，故被选作墓地，如今则已成为民居密集的镇区中心。

清代沈曰寿有《谒阿撒都剌圆墓》诗："斜日荒原下晚禽，漫从旷代仰官箴。兹乡何幸留抔土，廉吏难为籍赙金。读罢贞珉挥客泪，指将宰木比堂阴。故元宫阙凭寥想，未许樵苏此略侵。"

"抔土"意为坟墓。"箴"是古代的一种文体，以规劝告诫为主。"宰木"是指坟墓上的树木。

十二、史仲彬轶闻

燕子飞来九鼎移，蛰龙行遁到今疑。
致身一录那堪信，税长何曾立玉墀。

史仲彬（1366—1427）字文质，号清远，盛泽黄家溪（今黄家溪、史家浜一带）人。其少时任侠好义，以“力田拓殖为业”，曾任税长，“人多德之”，后受诬陷死于狱中。

在盛泽，流传着一个建文帝四顾黄家溪的故事。

明初的建文帝朱允炆在“靖难之役”中被叔父朱棣赶下台后下落不明，是历史上的一大悬案。关于建文帝的去向说法很多，其中就有避难黄家溪一说。明万历年间，有一本据说是史仲彬所著的《致身录》流传，内容讲述建文帝在南京陷落之后，剃发扮作僧人逃出宫中，在神乐观遇到了翰林院侍书史仲彬，于是跟随史仲彬到了他的家乡盛泽黄家溪，躲避在史家的清远轩里，直到当年八月才离开；之后，建文帝在逃亡途中又三次到过黄家溪史家。史仲彬临终时将所著《致身录》交付其子史晟保存，以待后世知其君臣之艰苦。宣德九年（1434），建文帝第四次到史家，史晟以《致身录》呈建文帝，帝阅后呜咽流涕，说：“彬不愧斯语矣”。

《致身录》之说历来争议极大。据史仲彬《行状》及吴宽所撰《墓表》所载，他未曾入仕，故而《致身录》为“伪撰”。秋凡先生也在《史仲彬致身录辩》中坚称《致身录》不可信。

“蛰龙”暗指建文帝；“玉墀”为玉的台阶，指朝廷。

十三、西村先生

冷落松楸处士祠，残碑犹见古须眉。
穆溪坐啸应千里，儒雅风流系我思。

史鉴（1434—1496）字明古，盛泽黄家溪人，为史仲彬曾孙，因居穆溪之西，人称“西村先生”。“家居水竹幽茂，亭馆相通。好著古衣冠，曳履挥尘，望之如仙”。其祠墓原有石刻西村遗像，“角巾羽扇，状奇伟，须髯奋张”，惜已倾圮，无迹可寻。

他博览群书，尤长于史，钱谷、水利之学问尤所深究。虽隐居不仕，却留心经世之务，“足迹不出百里，而人皆知其名”。王恕任江南巡抚时，闻其名，访以时政，史鉴“指陈列病”，王恕深服其才。

他的诗文雄深雅健，落落无俗，崛然成家，尤擅长行书，著有《西村集》八卷，俱收入《四库总目》。

他还是著名藏书家、书画收藏家和文物鉴赏家，与沈周（号石田，著名画家，与文徵明、仇英、唐寅并称“明四家”）、吴宽（号匏庵，诗人、散文家、书法家，成化八年（1472）状元）相友善。家中植芙蓉数百本，每至花时邀约沈、吴来家中游宴。时称吴中高士首推沈周，史鉴次之。相传史鉴与沈周酒后作对联相戏谑，史鉴作上联“沈石田踏雪寻梅，寒酸之士”，沈周对下联“史西村对日吃饭，温饱之家”，十分风趣。

十四、明真道院

吴下胜流此盍簪，明真旧院共联吟。
于今庙貌都非故，哪有诗人载好音。

明真道院即三元堂，位于充字圩西庙之右。据清同治《盛湖志》载：明真道院初建于元泰定元年（1324），明正统五年（1440）法师陈绍正、俞真曜重建，历代屡有修葺。清初，驻防镇兵居于此。其前殿为贤圣庙，祀唐朝名将张巡，后改为宁绍公所（会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与西庙一起改为粮库。

明代中叶，史鉴（号西村）与祝允明（号枝山）、沈周（号石田）、王宠（号雅宜山人）等曾觞咏于此，留下诸多诗篇。祝允明《题三元堂》诗曰："玄峤时登试振衣，郁林苍树远霏微。云端洞口仙人过，月下山中长史归。金锁牵床砂气伏，紫霞穿径木芽肥。神仙能咏不能遇，一夜爽灵峰外飞。"沈周也在此作诗："踏破青青一径苔，碧云深处洞门开。紫芝瑶草春常在，前度题诗今又来。"可见，他还是这里的常客。

明万历时，卜舜年曾作《募修三元堂疏》。

此外，在镇北郊的洪里村还有一处"明真道院"，建于元至元二年（1265），由里人沈玉渊舍宅改建而成。

充字圩为老镇区最繁华的地段，东至小庙港、斜桥河，南至市河，西与北是西白漾和桥北荡。

十五、目澜洲

骨池庵里驻名流，诗卷曾同玉带留。
为恐观澜心不静，故叫题作木兰洲。

骨池庵在盛泽老镇区西南部的西白漾畔，元至元十四年（1277）僧善莹建，“其南，有莲花池，乡人无葬地者，皆水葬其中”，因此初名骨池庵；至正（1341—1368）中，“僧琇奏请赐额”，皇帝钦赐“圆照”匾额，于是改名为圆照庵。

圆照庵凭借西白漾的千顷碧波，“波澜溢目”，风光绝佳，故又名目澜洲。

明朝正德（1506—1521）年间吕常所撰《圆照庵记》记载：“庵四面水流环抱，盛川在前，波澜溢目，因名之曰目澜洲，文人墨客从游者旁舞，遂为一方奇观！”当时的吴中名流沈周、祝允明、文徵明和王宠等人经常在此流连忘返，留下许多诗篇。沈周的《又为改名木兰洲》诗曰：“不到目澜洲，何堪为赋咏？开洲水中央，四面水如镜。忽然微风起，澜生水不静。僧作如是观，静业中大病。不若改木兰，字异音不亵。令人无多议，吾诗与印正。”

民国十八年（1929），当时的盛泽区公所决定将目澜洲辟为公园，供镇民游赏。目澜洲布局极为精巧，厅、台、亭、阁、廊与荷塘、嘉木、花街、小桥相映衬，“径可逾丈，广才容刀，烟水弥望，崔苇杂生，树皆绝奇，竹亦尽苦。”令人回味无穷。

1970年围垦西白漾后，目澜洲顿失千顷碧波，不再有“波澜溢目”矣。近年来，目澜洲经两次扩建，面积已增至数倍。

十六、碧霞行宫

禅院何年报陆沉，碧霞楼畔碧波深。
门前剩有再生树，黛色参天阅古今。

碧霞行宫（旧名玉仙行宫、宸洲道院）在老镇区西南隅，其西为西白漾（1970年围垦后，成西白漾河），南依目澜洲。

这里原为报慈禅院，建于南宋，明中叶废。据说禅院之大部已沉入水中，故词中云“禅院何时报陆沉”。明嘉靖十二年(1533)，道士卜俊募资在其下院废址上建碧霞行宫，后为雷尊殿，上为玉皇阁，右为碧霞楼，下为来鹤轩，前为三教堂。清康熙三年（1664），又在其左建斗姥阁，下为卫房圣母殿，前为紫苏殿。碧霞行宫前为大王殿，西侧有一石墉，通向关帝庙和岳庙，俗称娘娘墉。

碧霞行宫门前曾有一榆树，枯死后又复生，故名再生树。

碧霞行宫所祀主神为碧霞元君。民间传说东岳泰山神有女“玉仙娘娘”，俗称泰山娘娘、泰山老奶奶、泰山老母；被宋真宗封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道教认为碧霞元君“庇佑众生，灵应九州”，“统摄岳府神兵，照察人间善恶”，是道教中的重要女神。

大王殿，祀宋处士谢绪。谢绪，会稽人，排行四，隐居于钱塘金龙山，宋亡时，投水殉国。传说谢绪死后为神，曾喝退河水，为朱元璋助战，被封为“护国济运金龙四大王”，为黄河之神，兼管运河，护佑漕运。

大王殿建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由山东绸商筹资建成，即任城会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碧霞行宫与大王殿改建为粮库，“文革”时被拆除，建渔民新村。

十七、圆明禅寺

精蓝曾驻吕山人，来访青邱诗句新。
妙偈惟余小八景，一般风雅渺前尘。

圆明禅寺，又名白马寺，在红梨湖（桥北荡）之西南（今红梨园之南侧）。

寺原在车溪桥旁，宋乾德（963—968）中僧月觉建，正统初年（1436）由住持僧祚移建于此，经明、清两代多次修建，始成恢宏气象。

圆明寺的大殿之左，有一座方形三层建筑，名仞利天宫，其第三层为钟楼，悬一口大钟，据说浇铸之时熔入了众多善男信女捐赠的金银首饰，故而钟声激越悠扬。“万籁俱寂时，铿然一声，声越麻溪、平望、黄家溪、王江泾”，于是“圆明晓钟”成为“盛湖八景”之一。

明崇祯二年（1629），在圆明寺的东侧建起了东旸桥，又名白马桥，俗称圆明寺桥，桥下有一泉，名白马泉，红梨湖也由此桥而得名桥北荡。

圆明寺一带有湖，有桥，有泉，有寺，有钟声，风景优美，向来为文人墨客所重，明初文学家、“吴中四杰”之一的高启曾多次来此冶游，留下诸多诗篇。

明代吕山人曾居于寺中读书，好友高青邱来访，两人诗词唱和，传为美谈。清代诗人阮清、计瑸、龚继稚等人还在此结诗社，风雅乡里。

释行正曾作《圆明寺小八景》诗八首，盛赞寺内寺外之景色，此八景是：龙桥待月、古木归鸦、洞庭远翠、葭岸归僧、深芦钓艇、午市鸡鸣、别浦归帆、古院钟声。

寺内大钟于1941年被日军掠走，圆明禅寺随之被毁，如今旧址上已成为民居。

“精蓝”，即佛寺僧舍。

十八、庆寿庵

白马桥西古佛祠，诗僧名士昔栖迟。
瓣香野水人何往，畴向西云酹一卮。

庆寿庵，俗名西庵，在大低圩（今永和村），距圆明寺半里之处，元至元（1264—1294）中僧本厚建。原名衍庆寺，明洪武年间（1368—1398）赐名庆寿，明成化二十年（1484）僧圆证增建西云楼，清初又先后建聚德堂、山门、杂室。东有伴竹轩，西有斗雪轩，南有可怡轩，景色宜人。

清初著名诗人、学者朱彝尊（号竹垞，1629—1709）所撰《重建西云楼记》曰："楼后洞庭两山隐隐拱其北，盛湖（西白漾）、梨荡（红梨湖）环其东，竹树阴森，蒲柳列植，芳洲曲渚，禽鱼翔泳，风帆烟云，朝暮献状。"

庆寿庵是座文化气息十分浓郁的寺院，不仅轩厅清雅，庵中的几代僧侣如彻观、需轮、德载等皆能作诗，因此颇受文人骚客们的青睐。著名诗人沈石田、黄圭庵曾先后居此读书，清道光（1821—1850）间，周叔斗等结诗社于此，并公议祀卜舜年（号野水）神主于庵中西云楼。庵中还藏有文徵明（号衡山居士，明代画家、书法家、文学家）的字卷，墙壁间嵌有诗人赵半江的《续灯碑》以及朱彝尊、潘稼堂的《西云楼记》石刻。

"卮"，是古代盛酒的器皿。

十九、钱王墓

吴越遥遥岁阅千，郎君第四卜牛眠。
麻溪有个钱王墓，桥畔居民俱姓钱。

清乾隆《盛湖志》记载："钱王（钱镠第四子）墓在麻溪口柏字圩（今坝里村)"，而同治《盛湖志》则认为："旧讹为钱王墓，非也。"实为钱镠的裔孙、处士钱大有墓。此墓早已倾圮。钱王墓旁有一桥，名钱家桥（今已拆除），周边村落多钱姓。钱王墓一带现为盛泽纺织产业园。

钱镠是五代（907—960）时吴越国的创始者。吴越国辖有杭、越、湖、苏、秀、婺、睦、衢、台、温、处、明、福等十三州，大约相当于今天的苏南、浙江和闽北地区。由于他一直以效忠中原王朝为主要战略，避免了周边割据势力对吴越国的侵扰，同时对内实行"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国策，礼贤下士，广罗人才，奖励垦荒，发展农桑，因此在当时混乱割据的局势下，赢得了相对的安定与繁荣，奠定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吴越富庶甲于江南"的基础。

后梁开平三年（909），吴越王钱镠割吴县南地松陵及嘉兴北境之绮川、平望、震泽、澄源、范隅、久咏六乡，置吴江县。盛泽之地原为澄源乡，自此归属吴江县。

钱镠的后裔中代代有名人，仅当代的政治家、科学家、学者就有钱其琛、钱正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复等，实为世所罕见。

"卜"，选择的意思。

二十、烂溪周氏

扬历三朝一重臣，百年门第郁轮囷。
锄奸虎虎有生气，忠烈留贻到后人。

盛泽自明代起，“黉宫（古时的学校）蜚声”，“人文蔚起，科第相望”，其中，烂溪周氏一门声望尤著。

周用（1476—1548）字行之，号白川，明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历仕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历任地方要职及工部、吏部尚书、左都御史，勤政务，慎操守，终以劳累致疾，卒于任上。死后追赠太子太保，谥恭肃，入府学乡贤祠，堪称一代名臣。

周用工诗文，善书画，才情横溢，其书画得到沈周的指点，气韵蔼然，备极高雅，著有《读易日记》、《楚辞注略》，并有文集十六卷行世。

自周用之后，周氏世代书香传家，科第不绝。

周用的曾孙周宗建为明天启（1621—1627）时监察御史，因不畏权奸魏忠贤之淫威，上书直谏魏党劣迹，惨遭残害，杖毙狱中，福王时追谥忠毅。“浩气归太空，青史留英风”，他的铮铮铁骨为后世所尊崇。

周用的五世孙周灿，是明崇祯（1628—1644）年间的浙江道御史，家居谢天港（今胜天村）。他写的《盛泽》诗传唱至今。

近年来专家考证，烂溪周氏还是鲁迅（周树人）一支的直系祖先，而周恩来的祖先周完一则是烂溪周氏的始祖周德的同父异母的弟弟。

“轮囷”是高大的意思，“贻”是遗留的意思。

二十一、海瑞祠

平反一狱亦寻常，庙食到今民不忘。
尽有含冤无可诉，喃喃来爇海都香。

海瑞祠即海忠介公祠，在耳字圩芜田（浮淀）港（今红洲、茅塔村）。

海瑞（1514—1587）字汝贤、国开，号刚峰，琼州（今海南琼山）人，官居南都（南京）右佥都御史，是明朝著名的清官，与宋代包拯齐名。海瑞死后，朝廷追赠太子太保，并谥号忠介。

海瑞为政清廉，洁身自爱；为人正直刚毅，从不谄媚逢迎，敢于蔑视权贵；对朝廷忠心耿耿，直言敢谏，曾买好棺材，冒死上疏。他抑制豪强，安抚穷困百姓，打击奸臣污吏，因而深受民众爱戴。

海瑞一生清贫，去世时，家中仅有“葛帏敝篾”（布制的帷帐和破烂的箱笼），于是同僚们凑钱为他办理丧事。海瑞的死讯传出，南京的百姓罢市祭奠。海瑞的灵柩用船运回家乡时，穿着孝服的人站满了两岸，祭奠哭拜，百里不绝。

相传当时盛泽有民蒙奇冤，“诬陷者众”，海瑞为其洗雪冤屈，因此民众为他立祠祭祀，俗称海都庙。今已废。

“爇”，焚烧的意思。

二十二、窦峰园

汤家东港窦峰园，甲第连云花木繁。
乱石荒芜斜照里，怀嵩无复草堂存。

窦峰园在大适圩（东港西岸），处士汤昆（维柱）所筑，故里人又称汤家园。

窦峰园内景色极佳，“有亭，有台，有池，有舫，桃洞石梁无所不具。”花晨月夕，主人与客常觞咏其中。钱汝楫《窦峰园看菊》诗曰：“旧说园林好，黄花绕洞门。三秋霜欲老，万寿艳还存。月冷池边石，云迷市后村。餐英有骚屈，相对酒盈樽。”中丞郭世隆“闻其名而高其人”，为窦峰园书匾额“怀嵩草堂”。

秋凡先生于百年前作词之时，窦峰园已倾圮，故慨叹“乱石荒芜斜照里，怀嵩无复草堂存。”

二十三、王孙旧宅

王孙旧宅秀园坊，公叔久更国姓忘。
莫是预知天下乱，微箕行遁祀存商。

王孙宅在西肠圩花园脚下（今花园街一带），王孙指宗室后裔。

明万历（1573—1620）间，有一位宗室后裔易姓埋名隐居于此。南塘钱云诗云：“秀园坊作武陵村，避世人从此闭门。已是久更公叔姓，无谁为说旧王孙。”

秀园坊即今花园街。明代，诸生仲有仪筑秀园，后废，其南廊下成为街坊，名秀园坊，后改名花园街。

“微箕行遁”，指微子与箕子出逃避祸的故事。微子是商朝宗室，因纣王“淫乱于政”，微子多次亲谏无效，便求教于太师箕子、少师比干。箕子曰：“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于是微子出走“微”（自己的封国）。箕子也是殷商贵族，因屡谏纣王不听，便“披发佯狂为奴，随隐而鼓琴以自悲”。周武王灭商后，箕子不愿作周朝顺民，从胶州湾东渡到朝鲜，创立了朝鲜“箕子王朝”。孔子将微子、箕子、比干同称为“三仁”。

二十四、龙庵借读

龙庵借读共婆娑，佛像装成巨莫过。
讵料百年无应者，东南未见塔嵯峨。

龙庵，即古龙庵，在西肠圩之东南新桥河畔，宋咸淳（1265—1274）中建。今废。

早年间，古龙庵近旁河上无桥，村民过河全靠渡船。“村落万家，出入于此，春花秋月，横舟待渡”，“龙庵待渡”成为“盛湖八景”之一。

传说，明朝朱之番（字元介）生长于东肠圩，后迁江宁，他曾借住于古龙庵中读书，并书写庵额。

朱之番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乙未科状元，官至吏部侍郎，曾出使朝鲜，与其国才士互相辩难，赋诗赠答，应对如流。他还擅长绘画、书法，收藏书画、古器甚丰。

朱之番善察地理，说盛泽“宜于东南建塔”，故在古龙庵造大佛像，以为必有好事者来此筑塔，谁料百年过后依然“无应者”，始终未见佛塔踪影。后来庵倾圮，佛像迁圆明寺。

里人卜舜年也曾读书于此。

二十五、卜梦熊

武略文肠卜梦熊，石林遗址没荒丛。
晚香绿晓渺何许，觞咏犹传好客风。

卜梦熊（1536—1601）字仲登，号景川，乃卜舜年之父。

他从小习文，无书不读，工诗善画，后又投笔习武，击剑骑射，为明万历癸酉（1573）武举人。甲戌年（1574）会试时，考官读了他的试卷，叹息道："真是天下奇才，可惜策语过激。"竟不敢将卷子进呈。梦熊闻讯后慨然曰："我不受功名羁绊，可以遍观天下形势！"于是策马东距鸭绿江，北至碣石雁门，西抵榆林套地、凉州宁夏，几达河源沙海，视察形胜，指点古来兴亡。回程中，他又渡河入洛，东还邹鲁，逆江流，历匡庐，过三峡，入剑阁，辗转浙江、福建，尽兴而归。

梦熊归里之后，立志杜门著书，有《晚香亭集》10卷、《武经髓》诸小说、《防倭防国志》、《古今陈变兵变》等行世。他又醉心于地方风物，撰有《盛川题景记》、《盛湖八景诗》、《盛湖志》等诗文。他所述"盛湖八景"为：五桥晴市、竹堂古祠、圆明晓钟、目澜夕照、西湾渔舍、东漾划船、龙庵待渡、凌巷寻芳。

卜梦熊所居宅名"石林西墅"，在大适圩斜桥之东北，为旧北书房之地，"叠石引泉，名花满径"。梦熊好客，"缙绅不一接，而白袷缁衣日盈座也。"其著书处名晚香亭，绿晓斋为其诗酒社处。今俱废。

二十六、卜舜年

毕竟狂生自有真，辽阳痛哭独怆神。
此身已分委泥土，留得清名问水滨。

卜舜年（1587—1620）字孟硕，号野水，是盛泽最负盛名的才子。

舜年幼承父训，足不出户，闭门读书，初次去嘉兴参加童子试，秀水知县阅卷后赞曰："旁若无人，奇士奇士！"当即圈定为第一名。他诗学孟郊（字东野），别具生趣，又擅字画，飒然风生。他的著作颇丰，有《绿晓斋集》、《石林西墅遗稿》、《人琴集七种》等行世。

舜年负才傲世，举止怪诞。他在书斋门上贴一对联："乡人皆恶，国士无双"，还写过一副"濯足须加汉光腹，抵掌欲捋梁武须"的对联，足见他傲视一切的狂放。

1619年，明朝大军在辽东萨尔浒战役中惨败于后金的八旗军，杜松、刘挺二将丧师，舜年闻之，赋长谣千余言，以诟杨镐(明军主帅，辽东经略)，故有"辽阳痛哭独怆神"之句。

卜舜年虽然只活了三十四岁，"名声终不出州里"，但家乡人敬重他的高才奇行，世代有人凭吊其故居，并称盛湖为"舜湖"，永为纪念。直至今天，以"舜湖"命名的街道、宾馆、工厂、商店还有不少，足见他对后世影响之大。

卜舜年之居所绿晓斋在充字圩（斜桥之西北），后称绿晓庄。至清代，成为诗人王奂的住宅，名"东皋草堂"，后人则称其地为王家庄。如今园景虽废，但王家庄的名字一直流传至今。

二十七、洞真宫

瑶草紫芝秋复春，洞真宫殿暂栖真。
世间肉眼哪能识，拜倒风尘只一人。

洞真宫在尘字圩程林村（今兴桥村，新亚宾馆东），宋淳熙二年（1175）道士陈守贞建。

明万历（1573—1620）间，全真道士苏蓬头修炼于此。苏道士“善吐纳之术”，“能旬日不食，啖则数升。夏不设蚊帐，冬卧积雪中，或浴于河，人皆称为仙”。但此人蓬首垢面，一般人都对他不太尊重，唯独卜舜年将他视为上品真仙，“敬执弟子礼”。卜舜年曾与苏蓬头密语一宵，得其秘旨而归，大哭三日，“悔向者之多迷谬也”。

据说，一日苏蓬头与汤真常、仲绍康夜谈，忽起身曰：舜年去矣。二人心疑，翌日闻知卜舜年果死。舜年死后，苏蓬头遂云游去，不知所终。

卜梦熊曾赠苏蓬头楹帖云：“三千年桃花开，五百里贤人至。”卜舜年也有《洞真宫赠苏蓬头》诗曰：“散发蓬头一废人，荒天鸟兽与相亲。风雷碌磕飞真气，霜月孤明映此身。乱斩群魔非仗剑，常留本性似怀胎。知君姓氏题天籍，我亦思从作帝臣。”

二十八、杉杉子轶闻

千里闻名一昔逃，谈禅底事忽号咷。
神龙见首忽藏尾，迹自离奇人自高。

杉杉子，齐人，不知姓名，年约二十三四岁。此人自少学禅，因闻听吴江卜舜年聪明绝类，不禅而仙，意欲度之，故不远千里来盛泽，至目澜庵相见卜舜年。未几，其父追至盛泽。杉杉子见父泣拜曰："儿已绝意人间，负阿父、阿母，儿不返矣。父有财，何患无儿。父归第，散粟帛，遣奴婢，斋持佛号，便足当倚闾之望矣。"

一日夜间，杉杉子与卜舜年共榻而眠，阖户息火，负衣抵足，相与谈禅。杉杉子"盛称仙学之谬"，舜年则"负气坚拒"，争执不下。至夜半，放声大哭，声彻户外。过后，舜年稍稍合眼，醒来时，身边已不见杉杉子，问其父，亦不知何往，其父无奈，只得离去。事后，卜舜年每每想起杉杉子便涕泣不已。

这是发生在卜舜年这位奇人身边的奇事，所谓"神龙见首忽藏尾，迹自离奇人自高。"令人慨叹不已。

二十九、石门王氏

龄嘉西畔故家存，争说当年王石门。
两字题楣忠与孝，一腔碧血惨留痕。

石门在西肠圩龄嘉桥西首（今舜湖中路南，潘家弄北口附近），是明崇祯（1628—1644）时孝子王尚仁的居所。

王尚仁，字桂旸，号山甫，父亲早逝，侍奉母亲甚孝。因母亲溺爱幼子，尚仁总是顺母意，照顾幼弟。尚仁年方弱冠即从商致富，“起家万余金”，并将一半家产分给弟弟。后来，弟弟受坏人挑唆，以“阴事”中伤尚仁，并诉讼至衙门，以至差一点倾家荡产。后来冤情大白，弟弟因诬告罪将绳之以法，尚仁却恳求知县免于治罪，知县不听，尚仁泣诉说：“如治罪，则伤母心，我愿以身代弟受罪。”知县为其孝心所感动，最后免除其弟之罪。后来，弟弟因感而悔，弟兄相爱如初。

王尚仁一门数代以孝行著称。尚仁之从子（弟弟的儿子）名士龙，字子苍，吴县籍诸生，“沉敏嗜学，研究性理，母病十年，侍汤药不怠”。尚仁之孙王瀚，字禹平，父早亡，“孝于母，母殁，哭泣过哀，泪尽，继之以血。晚年承祭，犹欷歔洒涕不止”。

对王尚仁一家的孝行，知县章日炌给予了“曾闵至行”四字褒奖。曾参与闵损（闵子骞）都是孔子的弟子，以孝行著称，“曾闵至行”意为至高的孝行。

石门王氏忠孝双全。王上寿（字公邵）为复社志士，乙酉（1645）清兵占领盛泽时，民多遇害，“王上寿殉难时，以血手按石门上，其指痕历历可见”。此屋今已废。

三十、三家村朱氏

金风亭长旧家乡，景泰年间早易方。
一自胪传文恪后，村人犹艳状元郎。

三家村在镇之东南（今杨扇村），是清初著名文学家朱彝尊（号竹垞，又号金风亭长）祖居之地。

明代时，朱氏世居于此。景泰四年（1453），朱煜（字西湾）出赘于秀水（今嘉兴）商河之陈氏，其族人仍居于此。至今，三家村一带依然多朱氏后裔。

秀水朱煜一支多才俊之士。朱煜之后人朱儒，精通岐黄之术，为太医院御医。朱儒之子朱国祚（1559—1624）字兆隆，万历十一年（1583）状元，后官至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居官清而能容，质而有大体”。明熹宗时，东林党与阉党斗争激烈，朱国祚不愿卷入党争，连上十三道疏请求致仕，才获诏准。归乡第二年去世，赠太傅，谥“文恪”。国祚“未第时，读书圆明寺，手书护法二字留焉”。

朱国祚的曾孙朱彝尊（1629—1709）是词人、学者，通经史，能诗词古文。其诗歌工整雅健，与王士禛齐名，时称“南朱北王”。其词称雄于当时词坛，为“浙西词派”的创始者。著有《经义考》、《日下旧闻》、《曝书亭集》等，编有《词综》、《明诗综》等。所辑成的《词综》是中国词学的重要选本。

三十一、汤三俊轶闻

目光如电幕中宾，远佐三边更入秦。
倚马千言草露布，南阳救此一方民。

汤三俊，字俊民，号伯衡，为诸生（明清时期经考试录取而进入府、州、县各级学校学习的生员，有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统称诸生）。其居所名“贮真斋”，在西肠圩，今已不知其具体方位。

三俊貌甚丰伟，目光如电，腰大十围，“有才气，通世务，知武略”。三俊的同乡钱可在唐王（建藩国于河南南阳）手下作幕僚，崇祯六年（1633）秋，钱可至京师访三俊，极言唐王礼贤下士，邀他赴南阳一游。三俊未允，但钱可将三俊的文章进呈给唐王后，唐王十分赏识，随即聘三俊为其第六子的老师。

第二年，三俊入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的陈奇瑜帐下为幕僚，“参军谋，书檄奏”。此时，陈奇瑜正奉命讨伐流寇（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三俊曾为唐王、陈奇瑜“倚马作露布（布告、通告之类文书），连篇立就，使南阳被寇之民得复稍安。”后死于进军陕西三原的途中。

三俊著有《贮真斋集》，并有诗集刻本行世。

三俊之长子名孙陟，字辅嗣，诸生，少受庭训，好读书，博览经史，与胞弟孙咸、嫡弟豹处有三凤之目。

三十二、一门俊士

淳社铮铮大雅扶，草间偷活誓非夫。
一门俊士填沟壑，赢得哀歌溢路衢。

王上寿（字公邵，号调之），明末时诸生。上寿“性慷慨，尚气节”，先是与吴昌时、杨维斗等共入“匡社”，后又合于“复社”。当时复社频频集会，声动朝野，上寿奋然曰：“讲学而动辄千人，祸将及矣。”于是归而自结“淳社”于里中，一时同社者皆铮铮奇士。

乙酉（1645）清兵至盛泽，上寿“闭户不出，巾服如故，身被七刃，竟与族子臣良（字尔谏）、族孙湜（字其祉）同遇害”。臣良与湜皆诸生，有文誉，“同时名辈争为诗歌哀之”。

复社是明末清初时江南地区的进步政治社团。明万历（1573—1620）后期，政治腐败，士大夫为改良政治，纷纷结社，著名的有几社、应社、匡社等。天启（1621—1627）中，东林党遭魏忠贤阉党镇压，江南地区各派政治势力重新组合。崇祯元年（1628），张溥、孙淳等联合几社、闻社、南社、匡社等结成复社，主张“蠲逋租，举废籍，撤中使，止内操”，影响极大。清兵南下后，许多复社成员组织和参与抗清斗争。

三十三、周灿

疆臣风骨自嶙峋，暮夜何能竿牍陈。
恸哭丧明为国故，青山诗卷老遗民。

周灿，字光甫，是周用的五世孙，家居谢天港（今胜天村）。

周灿是崇祯四年（1631）进士，曾任浙江宣化、会稽知县，崇祯十六年（1643）擢升为浙江道御史，巡按江西。入境后，下属官吏都派差役迎接，某县令还贿以金钱。周灿大怒，留住他的差役不准回去，吓得县令畏罪挂印而逃。

此时正值明清易代之际。北京被李自成起义军占领后，福王在南京建立南明小朝廷，周灿多次上疏，为国分忧。

南明政权覆灭后，他回到故乡隐居，成为复社的骨干，“与同邑高蹈者结诗社，相唱和，以追悼国事，恸哭丧明”。他的好友殳丹生赠诗云：“画里青山长独往，愁中诗卷不须开。”

周灿的诗文绘事笔意疏远，有姜白石之风。著有《西巡政略》、《泽畔吟》等。

周灿有一首《盛泽》诗流传至今：“吴越分歧处，青林接远村。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尚利民风薄，多金商贾尊。人家勤织作，机杼彻晨昏。”诗中对盛泽的地貌、民风以及丝绸生产与贸易都有准确的描述，对故乡的经济文化特色作了很好的概括。虽然他受封建意识的局限，对盛泽人的逐利和尊商不以为然，但以今天的眼光审视，这种民风其实并无不妥。

“竿牍”指书札，这里特指奏疏。

三十四、朱明德轶闻

高隐烂溪处士星，超然物表自亭亭。
一编广宋遗民录，留与后人作典型。

朱明德，字不远，烂溪柏字圩（今坝里村）人。

明德博学广闻，研究经义颇有声望，然身逢明末乱世，难有作为。入清后，隐居于烂溪之滨，教授学生。明德“教授有方，无不进之于义理”，“弟子著录者数百人”。

明清易代之时，隐遁者甚多，常有人因语言文字而惹祸，而明德“内介外和，不为岸异，故患难不及”。后潜心学道，调养得精神健旺，至老不衰。

明德之诗和蔼中自具傲骨，著有《天地间集》，清同治《盛湖志》中存有书目。所辑《广宋遗民录》原为程克勤所作，明德采辑旧闻，增录至四百余人。著名思想家、学者顾炎武为之作序，称其书“当沧海横流之日，能存正气于天下”。

三十五、贞白楼

修竹千竿贞白楼，隐居差免贰臣羞。
庭中惟爱陶潜菊，自是高人逸士俦。

钮棨，字荪如（森如），号易庵，东汲港（今龙桥村一带）人，诸生。

钮棨生于明末，博学嗜古，不屑于时艺。入清后改号溪干野叟，隐居不出，筑贞白楼（今已废）于盛湖之滨，“栽竹种菊，赋诗饮酒，绝意人世”。其诗词气骨高傲，寄兴高远，著有《贞白楼诗集》。

钮棨与同邑潘、吴二子相友善，他们“留心明史，各撰歌行以志明一代之事，幸而高隐于乡下，不为时人所知，未与史难。”

钮琇《觚剩》中记载：“余族兄易庵先生，名棨，与先君同受知于黎博庵副使”，“今易庵年已八十有二，无子以继其传。手抄《贞白楼诗》寄余，若冀余之传之者，存其一二，亦可以见兴象之恬、襟怀之峻矣。”

三十六、折芦庵诗僧

折芦古刹小村边，中有诗僧自在眠。
明社已墟尘梦破，名心销尽爱逃禅。

折芦庵在老字圩下姚村（下姚即下窑，今前跃村），今废。

折芦庵四面环水，前有荷花池，池外有芦，故名为“折芦”。“庵之基仅如弹丸，而宛在水中。环池修木间，错蔬圃畦列，与桑麻交影，茭芦间，每风晨月夕雨旭推移，水禽林鸟时至相嬗，池光野色互为宾主，水际丛篁屏抱水外”。

江浩，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年少时颇具才名，所交往者皆当时名士。明亡后，削发为僧，住盛泽折芦庵，改名弘觉，字梦破。宏觉曾居于苏州横山之麓，题名曰“蝶庵”，每当“风月间野，命酒薄醉，登山眺咏”。著有《蝶庵集》。

宏觉的同门牧云和尚，常熟人，俗姓张，明末时，在常熟虞山兴福寺出家，先后辗转于无锡古南寺、镇江鹤林寺、宁波天童寺，晚年休静于折芦庵。牧云“精禅行，通儒书，与士大夫游，所作诗文颇有士风”，著有《懒斋刖集》，入《四库存目》。

三十七、徐铮轶闻

避寇踉跄袖册趋，刀光寒处捍头颅。
谁知帖括能延命，莫笑书生作计迂。

徐铮，字頫烟，画家徐溶之父。

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八月，清兵攻克松江，后一路纵肆淫掠，于十月十三日进入盛泽镇，盛泽惨遭兵祸（世称乙酉兵灾）。

清兵进入盛泽时，徐铮袖藏制艺（制艺指八股文，这里泛指书籍）数百篇，踉跄而逃。逃亡路上遭遇清兵，兵举刀砍徐铮，徐铮举袖来挡，随即倒地晕绝。待徐铮苏醒后，发现袖中的书籍都已断裂，而身体却完好无损。经此一劫，徐铮遂绝意功名，“韬晦以终”。

徐铮之子徐溶，自号“白洋山人”，画家，工山水，先后师从常熟王翚和娄东（太仓）王原祁，极受老师们的器重。王原祁曾请徐溶比较两家优劣，徐溶回答：“先生与王翚老师，就如李白与杜甫，李白天才卓越，人不易学，杜甫诗律精细，学不易到，故而两家都不能偏废。”徐溶的诗“亦秀韵”。

徐溶之子徐椿，字宝龄，“仰承庭训，亦善绘事”。

三十八、孝子张天章

舍身救父血流腥，问询年华未及丁。
不独凶顽怜孝子，天心感汝锡遐龄。

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进盛泽时，镇民遇害者众多。有一位十四岁少年名张天章，字在斋，因父病在床需服侍，未走。清兵入其家，欲伤害其父，天章以身体遮挡，护卫其父，被砍数刀，血流如注，仍忍痛不肯避让。天章的孝心感动了清兵，怜而退出。后天章活至八十余岁，无疾而终。

国人历来重孝道。天章虽年少，却能面对凶顽无所畏惧，最终感动凶手，死里逃生。所谓孝心可感天地矣。

由于张天章是被清兵伤害，故而其孝行未受清廷旌表，至民国时期，经地方公议，张天章入祀观音弄的乡贤祠，受镇民祭祀。

“未及丁”,指男孩子。古时称能担任赋役的成年男子为丁。

“锡”，即“赐”；“遐龄”即“高龄”，长寿的意思。

三十九、殉难池

胡尘满地逞干戈，谁与同心保岁寒。
幸有一池清净水，洗侬碧血静无澜。

王烈妇殉难池在法轮禅院旁。

法轮禅院在昇明桥北堍（旧时之山西会馆东侧，现为镇中心小学），俗名地藏庵，明天启七年（1627）僧贞元建。

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进入盛泽后，妇女遭受的灾难尤为惨烈。

王之相之妻徐氏，仓猝间来不及躲避，清兵欲加侮辱。徐氏抱住庭院中的树干不放，清兵竟砍断她一条手臂，她随即跃入池中自尽。此池后称王烈妇殉难池，池堙塞已久。

沈仲蘅之妻徐氏藏于屋壁中，被清兵搜出，强行拖走，经过白漾时投水自尽。清兵将她从水中拉出，驱令上船，她破口大骂，最终被杀死。

诸生沈承鸣之妻张氏，被清兵捕去。她浑身上下的衣服用针线严密缝住，清兵强解其衣，她夺刀自刎，死时年仅二十一岁。

种种惨状罄竹难书，但是清朝时编写的《盛湖志》对于乙酉兵灾不敢详细记载，只见于其余杂录。

四十、凌巷

寻芳凌巷逐香尘，风雅居然学士邻。
谁把明珠聘莺燕，个中大有坠楼人。

凌巷，旧名北书房，在斜桥之北，与卜梦熊、卜舜年的石林西墅、绿晓斋相近。明末名妓张轻云、宋如姬、梁道钊并集于此。

明代中叶后，随着盛泽丝绸业的兴起，丝绸贸易迅速繁荣，各地客商携带重金纷纷来此“贩缯”（古代的丝织品统称为缯），绸商“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经济繁华的同时，带来声伎风流之盛，盛泽的绮艳华靡遂直追南京秦淮河。

斜桥之北，绮疏曲栏密集，歌妓如花如云，梁道钊、张轻云、宋如姬则是其中之花魁。她们或通典籍，或擅诗词，或工书画，或精音律，“道钊淹通典籍，墨妙二王，轻云诗词笔扎并擅其长，如姬聪慧姿色冠于一时”，时常在风清月朗、花香林幽之时雅集，“诸姬鼓琴吹箫，吟诗作字以为乐”。

她们大多清雅脱俗，有清高傲然的个性，追慕气节，因此，在清顺治二年（1645）“松江兵屠掠盛泽”时，“又皆殉节御侮，不负所主，奇女子也”。

四十一、徐佛轶闻

徐娘妩媚擅歌场，兰质琴心秋怨长。
夫婿戏呼欢喜佛，竟缘语谶礼空王。

明末的盛泽，“绮疏曲栏，歌姬并集”，凌巷之外，还有终慕桥（又名百嘉桥）北堍的归家院（今新民厂之地）。

徐佛，原名翾，字云翾，小字阿佛，原籍嘉兴，后随母迁居盛泽归家院。她的一生，处于明末清初的乱世，柳如是为其弟子。

徐佛“性敏慧，能琴，工诗，善画兰”，声名极著，常与四方名士相唱酬，却“心厌秾华”。曾有一士与她有约，竟未果，故作《怨诗》五首。其第四首云：“锦簟孤栖灯炮青，薰笼斜倚漏三更。西风欲破人愁寂，吹入芭蕉作雨声。”此诗最为选家所赏。

徐佛后来嫁给了烂溪周金甫（周灿之弟），周爱其妩媚，戏呼为“欢喜佛”。夫死后，她随即削发入空门，“竟缘语谶礼空王”。

“谶”：迷信的人指将来要应验的预言、预兆。

“空王”：佛的别称。

四十二、名姝柳如是

身为名妓亦名姝，若论襟怀女丈夫。
一自知音并鸾凤，绛云艳说殉蘼芜。

柳如是本姓杨，名爱，小字蘼芜；后改姓柳，名是，字如是，自号河东君。祖籍嘉兴，生于吴江，幼年时卖到盛泽归家院名妓徐佛家中为养女。

柳如是以词翰与清操名重于世。她才思敏捷，才气横溢，诗词书画，无不精通，传世之作有《尺牍》、《戊寅草》、《湖上草》、《柳如是诗》等。陈寅恪称她为“侠女名姝”，赞叹备至。

当时，东林党领袖、诗坛“江左三大家”之一的虞山钱谦益（号牧斋）名重天下，柳如是深慕钱的学识和才华，表示“吾非才如钱学士虞山者不嫁”，钱闻此言大为感动，也说：“吾非能诗如柳者不娶。”柳二十四岁时与钱结合，钱对柳“礼同正嫡”，不惜挥霍万金为她建造“绛云楼”，两人“日夕相对，读书论诗，考异订讹，题花咏柳，殆无虚日”。

清兵入关后，钱谦益任南京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次年（1645）五月清兵南下，柳如是劝钱投水殉节，“宜取义全大节”，钱不听，柳奋身欲沉池水中，被钱拉住。钱降清后，奉召入京，柳拒不随夫北上。后来钱因参与反清复明运动被捕，患病卧床的柳如是却奋然跃起，甘愿以“犯人妇”身份随夫到南京。她还资助姚志卓起事，响应郑成功取南都，坚持抗清，始终如一。钱谦益死后，柳如是因家难自缢以殉。

归家院之地现为新民丝织厂。

四十三、明月藕花共一楼

明月藕花共一楼，岂知人世有穷愁。
清才例得享清福；伉俪联吟到白头。

吴统持，字巨手，嘉兴人，诸生。有经世之才，颇具声名，惜乎身处明末之时，只得“苟全性命于乱世”，隐居读书，明哲保身。因遭乱家破，转徙无定，与其妻项珮迁居于盛泽。虽“糠粃不饱”，却依然“处之泊然，与珮赋诗唱和”。著有《明月楼集》。

吴统持之妻项珮，字吹聆，“喜读书，工诗，善画”。以“贵族令淑（德行善美），遭难流离”，但“讽咏自若”，可谓“安贫乐道，白首相庄者”。所作《和统持卍字百韵》，一时传诵，朱彝尊将之采入《明诗综》。山阴（今绍兴）王端淑评价项珮曰：“鸳水（指嘉兴）为人文薮（人才聚集的地方），珮具贤淑之姿，聪敏之质，为诗高老不减三唐（指初唐、盛唐和晚唐）”。著有《藕花楼集》。

身处乱世，却能安贫乐道，以诗书自娱，伉俪各有著作行世，实属难得。可谓“明月藕花共一楼”矣。

四十四、一门风雅

两鬟亦以道人名，风雅一门端属卿。
夫婿天才真烂漫，诗成高唱鬼神惊。

殳丹生，字山夫，嘉善人，诸生。原名京，字彤宝，入清后改名。曾迁居屯村与震泽，后移居盛泽。丹生“天才烂漫”，性豪放，好饮酒，擅长诗与古文，“作诗如风雨驰骤，顷刻立就”，而格律严谨，诗名遍于江浙。著有《贯斋集》。

其妻陆观莲，字少君，号两鬟道人，“工诗”，著有《殳氏闺隐遗集》。虽家境困顿，“草屋萧萧，烟火时绝”，但“惟与丹生唱和。每比舍闻欢笑声，则观莲诗成。丹生击节而歌，林鸟栖宿皆惊起焉”。

其子名讷，字安世，“工诗及书”，颇具才名，“然性憨直，不谐于俗”。其女名默，字季斋，小字墨姑，“生而奇慧，九岁能诗”，习小楷，画人物、花卉，“凡刺绣刀尺，无不入妙”。

殳丹生一门风雅，堪比分湖叶氏午梦堂。

“鬟”，是头发美的意思。

四十五、汤尹娴轶闻

援琴弦绝梦偏灵，才德无双死亦馨。
诀别拼为同命鸟，不堪卒读旧碑铭。

汤尹娴，字洽君，为诸生汤三俊之女，计僧来之妻。尹娴“善鼓琴、洞箫、诗歌、填词、画花卉翎毛”，皆其父所教。“又善天文、历律、测晷、开方、立方、筹算、皇极统韵、诸葛鼓音、射覆之学”，则是其舅陈肃庵所教。计僧来之弟计东幼年时，即“从尹娴学观星纬，指示历历”。

尹娴之妹名吉娴，字渭君，“亦工诗，善箫及鼓琴，与姊齐名”。

明崇祯十三年（1640），计僧来死。临死前，僧来执尹娴之手说：“我在梦中与你一起弹琴，弦绝（弦断），怕是凶兆。我死后，你要照顾好儿子。”尹娴流泪说：“我在，必不负君。只怕我的命也不久了。”僧来死后，尹娴就开始绝食，待安葬了僧来后，“呕血数升”而死，“年二十五”。计东为尹娴作墓志铭。

《皇极统韵》是一部音韵学著作，作者是秀水（今嘉兴）陈藎谟。

射覆，是古代的一种游戏。

四十六、张小姑抗婚

居处无郎张小姑，守贞庵里佛灯孤。
饶他雀鼠速吾讼，羞刺鸳鸯上绣繻。

张小姑，是一村女，自幼喜爱读书，“通文义，工刺绣”。

幼时，小姑许配给邻居吴大年之子长官。后来吴家因大年亡故，家道中落。小姑之父死后，其母林氏及其兄对小姑的婚事顿生悔意，遂另受南麻富室吴姓之聘，并定下婚期。此时小姑年十六，得知此讯后坚决不愿另嫁，于是向教其认字的老师哭诉，商定躲避至湖滨的亲戚家，并设法告知吴长官家。

小姑失踪后，她的母兄大怒，将吴长官家告至官府。吴长官年仅十五岁，懦弱，不敢与小姑母兄争，官府竟将小姑断归南麻富室吴姓。

小姑虽无可奈何，但“终不能夺其志”，于是削发为尼。未几，吴长官亦故。里绅礼部侍郎吴家麒为其出家之庵题匾：“守贞。”

“女子从一而终”和“削发为尼”虽不应提倡，但张小姑对母兄嫌贫爱富的反抗，还是很令人同情和钦佩。

“雀鼠速吾讼”：比喻强暴欺凌弱小所引起的争讼。

“繻”：彩色的丝绸。

四十七、秀才浜

数家临水秀才浜，王沈风流又孰赓。
但觉比邻鹅鸭闹，市嚣不复杂书声。

“浜”是江南一带的方言，指断头的小河。李翊的《俗呼小录》上说：“绝潢断港谓之浜”。

秀才浜在盛泽老镇区的中心，舜湖中路之南，北斗弄与南仲家弄之间。舜湖中路原来是一条市河，市河中段（南仲家弄东侧）有一湾绿水向南延伸数十米后，再转而向东，到北斗弄为止，形成为浜。此浜早在数十年前就已堙塞。

昔年，“王九苞与又白、师硕父子，沈稚明与侄白卿、又新兄弟居此”。因王、沈两家都“颇有文誉”，故而名为“秀才浜”。

到沈秋凡先生生活的那个年代，秀才浜一带已成为平民聚居之地，“市嚣不复杂书声”，因此他要生发“王沈风流又孰赓”的慨叹了。

“赓”是继续的意思。

四十八、秀园

西肠仲氏读书堂，石磴孤峰昔擅场。
脚下花园已乌有，只余古弄号潇湘。

秀园，即仲家花园，明诸生仲鸣岐所筑，初建于西肠圩姚家坝底。园中的“小潇湘阁”，是他隐居著书之处，著有《小潇湘集》四卷行世。后圮毁。

后来，仲鸣岐的六世孙仲季甫又在废址之东侧（今花园街一带）重建秀园，园中有“池塘、竹树、石磴、孤峰，宛有山林之致”。池边筑水阁一座，仍名“小潇湘”，“命诸子仲孺璋、孺范弟兄辈读书其中”，里中名流也常在小潇湘阁讲学论文，故秀园名重一时。

清代沈承休的《秀园》诗云：“一丸尘市内，乃有小潇湘。勺水吞云梦，孤峰秀辟疆。竹疏迎晓日，蕉展送斜阳。鸡犬桃源物，绮纨步障长。桥空人不渡，洞锁世常忘。好客联诗句，长歌未厌狂。”

清乾隆时秀园已废，曾参与编撰清乾隆《盛湖志》的仲周霖幼年时“犹见园林景象”，后只有池南墙上尚存“小潇湘”三字。

秀园圮毁后，园中的“南廊下”成为街坊，初名秀园坊，后改名为花园街，而盛泽老百姓则习惯称之为“花园脚下”。花园街南侧的“潇湘弄”之名，即源于“小潇湘阁”。

直至今天，花园街依然是盛泽的繁华商业区。

四十九、西园

东园载酒醉西园，地僻曾无车马喧。
吟得香山绿野句，葭潭韵事可重温。

西园在大氏圩（今永和村）的绿葭潭，为处士仲沈所筑。今已废。

仲沈，字文涛，“少孤，事母尽孝，生养死葬独立肩任”。康熙十三年（1674）“水灾民饥”，仲沈“捐资赈济，全活甚众”，巡抚马佑书匾额“吴民戴德”以旌表其德行。

仲沈喜读书而甘于淡泊，因市廛之地喧嚣纷扰，不利子弟静心读书，故“于绿葭潭置一别墅，筑园其中，延名师以为肄业之所”，名为西园。

西园落成后，里中文人雅士常来此赋诗唱和，留下诸多诗篇。

计大章作《西园落成》诗一首，“得香山绿野三十韵”：“西园欣落成，碧潭映衡门。开荒筑场圃，绕屋列长垣。垣中浚方池，溶溶水潺湲。引流灌蔬果，花草随时繁。亭榭既幽敞，楼阁又掀骞。洞庭落照里，竹树罗远邨。四顾周大泽，风涛相驱奔。枌荫足流憩，烟萝可手扪。向夕揽宿莽，露坐依云根。地僻自奇旷，心逸忘哗喧。良辰成雅集，翰墨自翩翻。”

仲楷也有《春日游西园》诗：“二月春光好，新晴唤往还。梅香惊扑鼻，酒熟共酡颜。兴到盘飧尽，狂嫌诗句悭。坐来不觉晚，落日半衔山。”

五十、归鸿骧

洪武年间进士归，弃官肇此卜栖依。
曾偕七姓蝉嫣盛，苗裔而今俱式微。

据《盛湖志》记载：“盛泽诸姓，惟许、仲、归、吴、王、沈、汤、卜八姓为久”，故而盛泽人称此八姓为“老八姓”。归鸿骧，是盛泽归姓的始祖。

归鸿骧，字凤硕，明洪武三十年（1397）进士，“少负才名，律身清谨”。建文帝的老师方孝孺对其诗文十分欣赏，“器重之”，授吉水县知县，鸿骧请辞“以归养”，后又任其为“起居舍人”，“亦不就”。虽然“家贫，俯仰不给”，却“视之晏然(意为心态安宁)”，在家乡教授经文。建文二年（1400），任掌诰敕起居注展书官。

建文帝即位后，实施削藩措施，燕王朱棣起兵反抗，挥师南下，1402年攻破京城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即位，史称“靖难之变”。靖难后，方孝孺被诛十族，归鸿骧则隐居于盛泽，其子孙世代繁衍于盛湖之滨。

盛泽“老八姓”中，其他几姓都代有名人，而归姓却后人不多，“苗裔而今俱式微”。

“蝉嫣”意为连绵不绝，“式微”则是衰落的意思。

五十一、无患木

无患古木影扶苏，闻说能将鬼魅驱。
一串牟尼生树顶，直堪唤作会元珠。

昇明桥北堍有一寺院名法轮禅院（旧时之山西会馆东侧，现为镇中心小学），俗名地藏庵。其斋堂前有一古树，名无患木。今已毁。

传说，明会元曹勳未得功名时曾在法轮寺中读书，此树为曹勳所植。曹勳，字允大，嘉善人，崇祯元年（1628）会元（科举制度中各省举人到京会考，称会试，会试第一名为会元），官至礼部侍郎。

无患木，又名拾栌木、桓木、卢鬼木、黄目树等。旧时，民间认为此树能“镇鬼祛邪”，“鬼魅畏之”。据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续集·支植下》记载：“无患木，烧之极香，辟恶气……世人竞取此木为器，用却鬼，因曰‘无患木’。”

无患木的根、韧皮、嫩枝叶、果肉、种仁均有药用，其种子呈球形，直径约十四毫米，外表黑色、光滑，可作佛珠。

五十二、计东

蹭蹬功名赋远游，文章学术自千秋。
溪阳松柏谁凭吊，幸有裔孙画笔道。

计东，字甫草，号改亭，明代末年生于盛泽，十五岁时补为诸生，声誉日起。清兵入关，明室衰微，计东著《筹南五论》，以此谒见南明大学士史可法，可法视为奇才。明亡后，他闭门苦读，于顺治十四年（1657）考中举人。顺治十八年（1661）因江南奏销案（清廷将上年奏销有未完钱粮的江南四府一县的官绅士子全部黜革，史称“奏销案”）被黜。

计东曾云游四方，从京师北走宣云，南历漳洺，东至济兖，纵览山川胜景，广交各地名士。他“胸罗今古，才压俊英”，与长洲（今苏州）汪琬研“欧曾之文”，与睢州汤斌讲“程朱之学”。他性格豪爽，长于交游，曾与太仓吴伟业、昆山徐乾学、嘉兴朱彝尊、杭州陆圻等许多名士结成“十郡大社”，数百条游艇在嘉兴南湖集会三天，传为文坛盛事。

计东外表放浪不羁，内心却中正严谨。他至顺德（今河北巨鹿）缅怀归震川，访求遗址不可得，竟在他官署旁的废圃中长跪流涕。同邑友人吴兆骞流放关外，他百般照应，并将爱女许配兆骞之子。兆骞被赦还后，还代他抵偿朝廷的一半罚金。

计东长子计准早卒，他忧伤成疾，忧郁而死，终年五十二岁。一年后，开博学鸿儒科，大学士王熙推荐计东，派人到吴江寻访，而他已魂归黄泉。

计东著有《改亭集》，入《四库存目》，名入《清代七百名人传》。计东之墓在烂溪，本乡计二田有《溪阳谒墓图》，“一时名流题咏甚众”。

“蹭蹬”意为遭遇挫折。

五十三、思子亭

茅塔村边思子亭，亭碑磨灭草青青。
女贞同穴虽非古，鸳冢双埋骨亦馨。

思子亭在茅塔村。清朝举人计东因其长子早殇，思念甚深，乃筑亭纪念，名思子亭。今已废。

计东之长子计准，字念祖，聪慧过人，号称“神童”。三岁读《毛诗》，五岁就从师学习，好学不倦，常常半日读书，半日静思，“年十五补吴江诸生”，可惜十六岁便夭折。计东伤心不已，“集士大夫诔（哀悼的文章）之，既又为之谥（给予死者的称号），又刻其遗文”，四年后，又筑思子亭于所居之旁，但他终因忧伤成疾，忧郁而死。

计准之聘妻宋氏，当时年仅十三岁，后“因有求婚于其家者，闻之，遂不食死”，与计准合葬。

长洲（今苏州）汪琬为之作《计氏思子亭记》，当时及后人赋诗、作文为之惋惜慨叹者众多。

五十四、丹青妙手

杉亭笔底化云烟，豹处毫端涌瀑泉。
若把两贤配孟硕，一般俱是画中仙。

徐溶、汤豹处和卜舜年都是盛泽历史上颇有造诣的画家。

“杉亭笔底化云烟”是指徐溶。徐溶，字杉亭，自号白洋山人，清康(熙)雍(正)时人。初画山水，泛学无宗，后师从常熟王翚，画风大变，笔墨苍秀，水墨小幅及浅绛尤妙，“萧疏闲冷直逼元人”。曾作《竹溪高逸图》，并与王翚等合作《岁寒三友图》。

汤豹处，初名孙振，字雨七，明末清初人。“好吟咏，善鼓琴，画尤入神”。他认为古今画家“惟于林峦楼阁花鸟上力求精工”，至于“写无形为有形、无声为有声，则不能也”，于是独创新意，作各种绘水的作品，“假形百物，变态无穷”。他的绘水之作被称为“旷世仙笔”。

卜舜年（1587—1620），字孟硕，明万历年间诗人、画家。卜舜年的画极负盛名，很受董其昌的好评。别人说他“当月明之夜，往往兀坐树下想象烟林，达晓不寐，故其运笔磅礴淋漓，仿佛有仙气”。他“画落月于丛树藤萝之中，光芒四映，对之爽气拂襟”。

三人都是丹青妙手，“一般俱是画中仙”。

五十五、睐娘与香木城

玉轴锦韬香木城，画奴管领最分明。
如何错点鸳鸯谱，天壤王郎恨不平。

香木城是明末盛泽画家汤豹处的藏书楼。楼中，有十个香木制成的大书架，环成城墙一般，故称香木城。每个书架有上百卷书画，各以镂金牌为记，其中“锦韬玉轴为最品”。

汤豹处之女名睐娘，“性聪慧，善记诵”，只要父亲说出画家与作品之名，睐娘就能指出在何架何卷中，故而父亲十分宠爱，呼她为“画奴”，令她掌管镂金牌，照看香木城。

乙酉（1645）清兵进盛泽，睐娘带着香木城中的精品，随父母到北麻钮村避难，价值连城的香木城被清兵焚毁。三年后，父亲回盛泽修葺房舍，睐娘则居于乡下姑母家。

睐娘的姑母倩娘与潘生私通，为睐娘所厌恶。姑母怀恨在心，便瞒着睐娘到她父母处说亲，将睐娘许配给潘生。洞房花烛夜，睐娘见新郎竟是潘生，大呼“姑母误我”，痛哭不已。睐娘屡遭潘生鞭笞，愤不欲生，将平生所著《愁盐》一卷及所画花鸟粉本付之一炬，留下遗书，自缢于庭，年仅二十四岁。

沈南一作《香木城歌》痛悼香木城及睐娘。

“天壤王郎”意为“天地间竟有这种人”。天壤，指天地之间；王郎，指晋朝的王凝之。晋朝的才女谢道韫嫁给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由于她的才学比王凝之高，故而叹息：“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这是谢道韫轻视其丈夫王凝之的话，后来比喻对丈夫的不满。

五十六、拾锦塘

桃柳成荫拾锦塘，波桥卧水亦生香。
鸳湖词客留芳躅，西爽轩中题景忙。

昔年，盛湖（西白漾）东南侧的关帝庙前有一条曲尺状的石砌长堤，堤上有一座单孔石拱桥，过桥后，堤折向东，与碧霞行宫相连。堤旁遍植桃柳，所谓“间枝杨柳间枝桃”，有杭州西湖苏堤、白堤之趣，名为拾锦塘。

石拱桥下是一湾绿水，水中荷花亭亭玉立，轻风徐来，水波漫开阵阵清香，故将此桥称作香波桥。

清代著名文学家朱彝尊（号竹垞）寓居关帝庙西侧的西爽轩时，有感于旧日“盛湖八景”大多与当境不合，于是更定为“盛湖十景”：重湖烟雨、白洋夜月、葭潭流泉、红梨晚渡、石门遗筑、龙庵借读、白马晨钟、香波夕照、西湾渔舍、文起朝霞，其中“香波夕照”，即指香波桥与拾锦塘。

“鸳湖词客”即朱彝尊，嘉兴人。嘉兴的南湖与西南湖合称鸳鸯湖，朱为著名词人，曾作《鸳鸯湖棹歌》。

“芳躅”指前贤的踪迹。

五十七、朱逢源轶闻

轻縠徐波见水心，宸翰七字赐题吟。
天颜有喜称诗好，尺鲤龙门宠遇深。

朱逢源，字荇村，三家村人，嘉兴籍诸生。“崇尚古学，从秀水朱彝尊游。好风雅，精鉴赏，收藏甚富。四方名士来游，款留无倦。”

清康熙帝一生六次南巡。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第五次南巡的回京途中，朱逢源曾“于八坼（吴江八坼）舟次（康熙帝的船上）献诗赋，面试赋得《轻縠徐波见水心》七律一首”。

诗的题目《轻縠徐波见水心》是康熙帝的“御制诗句”。康熙帝夸奖朱逢源的诗作得好，命他赴南京参加召试，皇帝“钦取第七名”，但因仅“拔用前五名，未得官”。

“宸翰”意为帝王的墨迹。宸，是深邃的房屋，又指北极星所在，后引申为帝王的代称。翰，是长而坚硬的羽毛，借指毛笔和文字、书信等。

“召试”，指皇帝召来面试。是封建时代选拔官吏的一种特殊方式。

“尺鲤龙门”指“鲤鱼跳龙门”。古代传说黄河鲤鱼跳过龙门（晋陕大峡谷最窄处的龙门，今称禹门口），就会变成龙。后以“鲤鱼跳龙门”比喻中举、升官等飞黄腾达之事。

五十八、行行且止亭

暑月施茶古驿亭，行行且止旅踪停。
关山不少穷途客，谁似瑶光眼独青。

行行且止亭在圆明寺前，东旸桥西堍。每到炎夏暑月，亭内施茶，为过往的行人提供免费的茶水，以休息消暑，名为“行行且止”。今已废。

康熙年间（1662—1722），有一位名叫毕钺的山东人漂泊行乞至此，在亭壁上书写了唐朝才子、文学家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滕王阁序》在描写了南昌藤王阁的美丽风光和宴会的极尽欢愉后，兴尽悲来，抒发了诗人对命运的感慨：关山难以逾越，有谁同情迷路的游子？偶然萍水相逢，人人都是异乡的来客。

盛泽的士人仲瑶光见此对联后十分惊异，立刻将毕钺邀至家中作客，两人赋诗唱和，盘桓“累月”后，仲瑶光才厚赠盘川送毕钺上路。

钱云有《行行且止亭》诗：“烟路东西亘野田，云帆南北走通川。寺门客过津亭去，孰问清冷圯下泉。”

五十九、仲有余寻父

航海梯山路万程，寻亲万里不知名。
天教团聚归琼岛，子孝果然妇亦贞。

仲有余，其先祖本盛泽人。清康熙年间（1662—1722），有余的曾祖在广东某官府作幕僚，后死于广东。有余之父仲渊如在广东娶妻赵氏，生下两子名有余、有孝，后渊如与其父先后回到故里盛泽，与妻儿失去联系。

乾隆九年（1744）秋，有余二十二岁，刚刚娶妻，居于琼山县（今海南琼山）牛马口，奉母亲之命，带着曾祖的遗骨回江苏归葬并寻找父亲的下落。有余之母不知道仲渊如的老家是盛泽，只知地名之音“似石”，故而有余航海到江苏后“先至石门，继至金泽”，“转辗访寻，备尝艰苦”。后来听说盛泽“有仲姓族居”，于是到盛泽寻访，最终找到父亲，但父子已“相逢不相识”。有余告诉父亲“奉母命来寻找父亲回去团聚”，此时他“囊中余钱（仅）十七文”。

仲有余寻父的故事传遍盛泽，“母贞子孝，感动闾里”，人们将仲有余比作明朝的吴江孝子吴璋，里人徐继稚作长诗《赠仲孝子有余》颂扬其孝心。乡亲们纷纷“争先助装”，资助有余父子回琼山合家团聚。

六十、集寿老民

百首迎銮花样新，书生遭际值南巡。
九重绣物承恩赉，集寿从兹号老民。

徐继稚，字惠南，监生，清乾隆（1736—1795）时人。好读书，“性喜吟咏”，著有《南邨诗稿》。

清乾隆帝先后六次南巡。乾隆二十七年（1762）第三次南巡时，徐继稚搜寻唐、宋、元、明各朝诗人的诗句，集成《迎銮词》百首，每首中有一“寿”字，在皇帝的“行在”献给乾隆帝。乾隆帝对徐继稚花样新鲜的一百首《迎銮词》大加赞赏，“恩赉”绣物（荷包两对）及一“福”字。徐继稚归家后，将书斋改名为“集寿斋”，厅堂匾额名“膺福”，并自号“集寿老民”。

清乾隆《盛湖志》中记载了徐继稚的诗《赠仲孝子有余》，清同治《盛湖志》存有徐继稚的《集寿斋体孝》、《续二十四孝》、《医方集验》以及他与龚昇唱和的诗集《望舒吟》等书目，《中国医籍通考》第二卷亦载有他的《医方集验》。

“迎銮”指迎接皇帝的车驾，“九重”在这里专指帝王，“恩赉”是恩赐的意思，“行在”指皇帝巡行所到之地。

六十一、汪文柏

半湖菱芡近如何，千匹澄江练正拖。
不是柯亭诗思好，夜灯秋雨为谁多。

汪文柏，字柯亭，安徽休宁人，附贡生，“工诗，善画墨兰”。

文柏曾任北城兵马司指挥，“居官颇著，循声（官声循良）三载”，辞任归乡后“筑别墅于盛湖，与邑人潘耒、徐釚、黄容为吟社友”，赋诗唱和。著有《杜韩集韵》、《柯庭余习》等。

他的别墅在西肠圩，名屐砚斋，收藏甚富。因购得一古端砚，形如屐（鞋），故将书斋取名为屐砚斋，并请四方名士为之题咏。

他的诗作以《盛湖》诗最为著名：“矮屋环湫市，洄流界叠塍。夜灯千匹练，秋雨半湖菱。击榜吴娃捷，评珠贾客能。辛勤终岁力，犹未足催征。”其中“夜灯千匹练，秋雨半湖菱”一联历来评价甚高，被诗友赞为绝唱。秀水朱彝尊以为“非仅开宋元之窔奥，直欲造唐人之堂室”；长洲沈德潜也认为：“非亲诣其地，不知其妙”。

“窔奥”，比喻深邃、高深的境界。

“练”，指素色的丝绸。

六十二、释力成轶闻

三年面壁柏庵僧，苦行参禅得上乘。
放下屠刀便成佛，菊来梅去死生澄。

释力成，俗姓朱，盛泽人，“以屠（杀猪宰羊）为业”。二十九岁时“弃家学佛”，在山家坝（今永和村）的庆寿庵剃发为僧。师父永在为他起法名“力成”，取“屠刀出头”之义。

力成目不识丁，出家后仅作“担水、舂米之役”，故而苦行三年，一无所成。后来，永在教以“僧家坐七法”，命他“诣嘉禾（今浙江嘉兴）天宁寺坐参禅理”。二十四天后，他“豁然开悟，诵经如夙习，兼通吟咏，清彻可诵，历主天宁、灵隐诸方丈说法，皆超上乘”。后来力成退居于东肠圩的柏子庵（今南新桥东南，已废），每天口中“喃喃如颠”达数年之久。

清乾隆丁丑（1757）仲冬朔（农历十一月初一），力成忽悬示“五五归期”，人们“莫晓其意”。至二十五日，他召来故人一一告别，“焚香沐浴，衣袈裟，趺坐（坐禅入定的姿势）禅榻，说偈（佛经中的唱词）曰：“来时菊花黄，去时腊梅吐。终身未了事，全仗檀那（施主）补。”偈毕身亡，享年六十六岁。其骨塔在庵之西。

力成诞辰在九月，故而偈中有“来时菊花黄”之语；“去时腊梅吐”指逝于仲冬；所谓“五五归期”，则是二十五日辞世。

“释”指和尚，佛教出家人自称“释子”。

“僧家坐七法”指僧人坐姿的七个要点，亦称“七支禅定坐法”。

六十三、诗人之家“春晖堂”

棹歌一曲宋蓝岑，越艳吴姬点拍吟。
试向新杭寻旧宅，春晖寂寂挂榆林。

宋景和，字蓝岑（兰城），号金庭，新杭市（今群铁村）人，岁贡生，曾任崇明（今上海崇明）、丹徒（今江苏镇江）两县的县学教谕。所居宅在新杭里，门前有两株古榆树。

宋景和年少时就擅长诗词，并得到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的指导。他曾模仿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作《闻川棹歌》一百首，“和者甚众”。他评论诗道，主张“自汉魏至元明，当穷探博讨，熔铸古今，以成一家言”。著有《疃浮山人稿》。

景和之妻戴素蟾，字月卿，又字柔斋，别号魏塘内史，嘉善人，“夙娴文史，颇工吟咏”。子名承璒，字执诸，号坡湖，国子生，“幼禀庭训，雅嗜吟咏，厌弃帖括，专力韵语，诗笔娟秀，克肖家学”；孙名方吉，字盈子，号星砚，桐乡籍诸生。有四女，长名贞琇，字孟娴，次名贞珮，字仲衡，三名贞球，字叔谐，四名贞琬，字季美，“皆能诗”。

景和常与妻子、子女“更唱迭酬”，成诗七百余首，一时广为传诵。闲暇时，戴素蟾还教侍女彩云、瑞云以吴越方言唱《闻川棹歌》，“以供庭闱笑乐”。他家的“春晖堂”常有“远近名流过访，觞咏留连”，成为文人雅集之所。

明清时，每年（或二三年）从各府、州、县学中选送生员入国子监就读，如此录用的人称“岁贡生”。“教谕”是“县学”（封建时代一县的最高教育机关）的学官，掌管文庙祭祀和教育所属生员。

六十四、史善长轶闻

书记翩翩史赤霞，归来诗句满征车。
才人自得江山助，秋树遗编成一家。

史善长，字诵芬（仲文），号赤霞，谢天港（今胜天村）人，清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以诗名于时，足迹半天下”。

善长之诗，风格曾有“数变”，“少年所作，明丽豪宕；后遭遇困顿，则幽忧悱恻；及游秦（陕西）陇（甘肃），复变而为铿锵激楚，有北地遗风；既从军楚中（湖南、湖北），则感事抒词极慷慨激昂之致”。著有《秋树读书楼诗集》十六卷。

一代文宗、著作家阮元（谥文达）称其诗：“如云峰霞壁、天展画图、锦漪文涟、自成绮组；至于围城纪实、幕府谈兵诸什，锵锵激楚，昔人从军出塞等篇，不能专美于前。”王昶评论他的诗：“体裁本自杜少陵（杜甫），而练词琢句得之谢康乐（谢灵运）、鲍明远（鲍照）者居多。”

当时的湖广总督毕沅、刑部右侍郎王昶、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姜晟都因“爱其才”而争相聘善长为幕宾。他在湖广总督毕沅幕府的时间最久。此时，因白莲教起义，湖广地区军情危急，善长在军中“戎马倥偬，飞书草檄”，出力颇多，毕沅“屡欲保其功，坚辞不就”，“后以病酒卒于家”。

六十五、鸾影遗稿

锦瑟年华未嫁时，温郎才调系芳思。
饶他遗稿颜鸾影，怎抵悼亡百首诗。

吴鹤侣，是“诸生史善长聘妻”，未嫁而亡。

鹤侣从小学诗，“年十一二，学诗所作不下数百首”。缔姻后，亲属中有人得知史善长家贫，不免为她惋惜忧叹，但她从不介意。后来善长补为诸生，有了名气，亲朋们纷纷来道贺，但她“亦无改容”。惟有别人称赞善长的诗赋写得好，她才偷偷欢喜，“俯首凝睇，若阴志于心”。

选定结婚吉日后，鹤侣对出嫁的妆奁、“衣襦簪珥”一概不问，只是每天“录诗成帙（册），藏箧（书箱）中”，准备婚后与善长探讨、请教。临嫁前，鹤侣因病而亡，她在病榻前将所著诗文“尽焚之”。她对劝阻的人说：“身已作幻泡露电，焉用此语言文字重惑来者？”死时，她才二十三岁。

吴鹤侣死后，史善长将她“焚余”的七十余首诗编成《鸾影遗稿》，并为之作序。后来善长的继室亡故后，善长又赋悼亡诗百首，亦存于集中。

六十六、话雨楼王氏

好古谁如话雨楼，墙东三世擅风流。
而今金石飘零尽，问有遗书几卷留。

王楠，字任堂，号勺山，话雨楼主人，清乾隆（1736—1795）时处士。

话雨楼在敦仁里，为王楠之父王濂始创。乾隆初年，王濂延聘文史学家、书画家“秀水（嘉兴）张庚馆话雨楼，王楠从之学”，因此王楠具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和鉴别古代金石文字、书画文物的能力。王楠博学嗜古，“搜周秦以下金石文字至数千种”，著有《金石考》和《话雨楼诗抄》。

王楠的长子王鲲（约1760—1835）字瀛之，号旭楼，监生，勤于著述，“考先世所藏金石文字”著《话雨楼金石目录》，另著有《松陵见闻录》、《养真精舍诗抄》、编有《盛湖诗萃》。

王鲲之子王致望（约1785—1850），字渭徵，号少吕，例贡生，编有《盛湖续诗萃》和《舜湖纪略》。

王氏祖孙三代钟情于收藏和著述，话雨楼为收藏金石书画之处，“藏弆（收藏）之富甲于邑中，文献多赖以存”。王氏广结文缘，先后有十余位书画、金石大家寓居于话雨楼，一时名满江南。可惜三代之后逐渐式微，“而今金石飘零尽，问有遗书几卷留”。

六十七、沈烜轶闻

君写观音侬写经，簪花妙格副丹青。
玉台韵事称双绝，留得当年片石馨。

沈烜，字树棠，号琛厓，监生，捐职“州吏目”。

沈烜“工文翰，善篆隶，并画山水、花卉、人物”，书法与绘画俱有造诣。他出游当湖（即柘湖，浙江平湖的别称）时，人们争相“乞其笔墨”，平湖的名画家钱天树精于鉴古，见其画亦叹赏不已。仁和（今浙江杭州）画家钱杜在盛泽作客时，沈烜与他日夕“论究画理，所得益深”。沈烜为人朴实温雅，与人相交有真意，惟有对书画极其认真，从不随便为人作画。著有《停云馆诗抄》。

沈烜之妻叶璚华，字秋霞，分湖（今吴江汾湖）池亭人，是才女叶小鸾的六世侄孙女，“工诗，善小楷”，著有《小疏香阁稿》。长子名曰寿，字延之，号笠君，“克承家学，工绘事，有仿元明诸家山水花卉小册，用意幽深，力追古法”，著有《绿意盦诗稿》。次子名曰富（1808—1858）字沃子，号南一，清代文学家。

沈烜曾仿吴道子笔法画观音像，璚华书写《心经》于画上，并“勒之石”，被时人称誉为“双绝”。

沈烜的居所名“停云读画楼”，收藏名人书画甚富。

“玉台”指砚台；“州吏目”是州的行政长官知州的属官，从九品。

六十八、停云读画楼

宾鸿阁上萃名流，茗饮停云更有楼。
桐叶萱花蔬落尽，需园遗稿自千秋。

停云读画楼，在西肠圩新街（今舜新南路北段），清代吏目沈烜（号琛厓）的故居，有宾鸿阁、古鲸琴馆，萱花、桐叶掩映窗户，景致极佳。今已废。

沈烜儒雅好客，故停云读画楼内一时名流雅集，多有题咏。杭州名画家钱杜作《停云读画楼图》，篆刻名家钱松作《停云读画楼图为沈琛厓作》诗：“先生读画如读书，小楼幽绝如山居。先生读书如读画，终日孤情寄云外。柴门春画长不关，吟声时出空翠间。红泥火炉蟹眼活，白竹卧榻苍烟环。春云昨夜压湖水，万绿槎枒拂天起。帆影遥飞几砚前，岚光暗落襟怀里。我买乌篷八尺船，看云闲过舜湖边。携云便就山楼坐，挥手松风谭画禅。”沈烜之妻叶璚华也曾作《停云楼送春》诗：“小楼镇日下帘衣，约束瓶花未许飞。多事侍儿窗网拓，不留春住放春归。”

沈烜之子沈曰富（字沃子，号南一）常邀集同人在停云读画楼饮茗赋词，所作诗词载于《红梨社诗抄》。后又筑需园，自号需翁。他的遗稿刊印后，书版就收藏于园中。

“蘥”与“零”音、义相同，“蘥落”即零落的意思。

六十九、话雨楼寓贤

论书论画复论诗，话雨寓贤盛一时。
文字缘兼金石契，数传泽斩大堪疑。

话雨楼主人王濂、王楠、王鲲、王致望祖孙四代好交文友，先后有十余位书画、金石大家寓居于话雨楼，其中居住时间最长的达十年。

戴瀚，字巨川，号雪村，上元（南京）人，雍正元年（1723）榜眼，“寓盛湖有年，与王濂成至契”，著有《雪村诗稿》。

张庚（1685—1760），字浦山，秀水（今浙江嘉兴）人，“精鉴赏，擅书画，尤长诗词古文”，著有《浦山论画》、《国朝画徵录》，评骘（评定）书画“不肯轻下一字”。

金农（1687—1763），字寿门，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著有《冬心先生集》。金农寓居话雨楼达十年之久，“王楠所藏碑帖署签及题跋多出其手”。

鲍楷，字端人，歙县（今安徽黄山市）人，画家，“工花草山水，疏朗秀润，得古人意”。

诸葛祚，字永年，安徽芜湖人，“工诗善画，精于篆刻”，并能镌铜章。

张燕昌（1738—1814），号芑堂，浙江海盐人，擅长金石篆刻，“尤精飞白”，著有《飞白书》、《石鼓文考释》、《芑堂印存》。

他们与主人王氏诗词唱和，鉴赏文物，切磋交流，结下深厚友谊，一时传为佳话。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然话雨楼未及五世即已衰败，“可慨也”。

七十、钱杜轶闻

松壶三载滞游踪，画笔突过文五峰。
来往衙斋无俗客，弦诗颂酒自春容。

钱杜（1764—1845），字叔美（初名榆，字叔枚），号松壶，仁和（今浙江杭州）人，监生。

钱杜是福建藩司（布政使）钱琦第七子，“性旷逸不羁，好远游，不事家室，如闲云野鹤来去倏然”，足迹“几遍天下”。

他的诗、书、画俱有造诣。“诗宗岑（参）、韦（应物），书摹褚（遂良）、虞（世南）”，尤其是他的画“笔类文五峰（明代画家，文徵明的侄子），而秀冶过之”。其山水“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幽秀细笔，尤得力于文徵明；间为金碧山水，尤妍雅绝俗”；人物、仕女“靡不精雅”；花卉“法恽寿平，画梅师赵孟坚，幽冷疏散，可与金农、罗聘并驾。”

嘉庆十四年（1809），钱杜的嗣子（以近支兄弟之子过继）钱廷烺来盛泽任县丞三年（吴江县丞衙门设在盛泽），钱杜“同居衙斋”，常“与诸文人诗酒往还，得其画幅者颇多”，所作诗画都署名“松壶画赘”。

后人评论他的诗“妙于画”。清同治《盛湖志》载有钱杜的诗《月夜听秋圆为王少吕（致望）作》：“秋风吹满林，梧竹泻清响。碧云净如水，帘卷山月上。荒蛩何处吟，疏篱开十丈。奚童抱古琴，知君结清赏。天籁落空中，幽怀绝尘想。”

七十一、张孝子坊

稚年纯孝迈群伦，冒刃蹈波不顾身。
祠宇荒凉谁过问，只余绰楔照湖滨。

张孝子坊在大饱圩东白漾北岸（今舜湖东路东白漾大桥之北，老盛泽中学门前），今已废。

孝子张维馨，字德明，盛泽人。十二岁时，月黑之夜有盗贼入宅，欲伤其父，维馨虽年幼，却冒险以身“蔽其父”，终于感动盗贼，放过了他们父子。有一次，他父亲“坠于急流”，他又跳入急流，救出了父亲。父亲卧病在床，他朝夕侍奉汤药，竟然“衣不解带者终岁”。父亲亡故后，他在墓侧痛不欲生，哀号之声感动路人。

雍正八年（1730），朝廷旌表张维馨的孝行，为他立了牌坊，后来，其子张又彬又在牌坊后建祠，共两进，阔九间，“兼擅园林之胜”。但是，才过了三四十年，祠宇竟“尽售他姓，木主毁弃无存，可慨也”。

清同治《盛湖志》载有《张孝子坊》诗一首：“白洋（东白漾）湖水汤汤碧，湖干绰楔高千尺。孝子为谁字德明，稚年纯孝吾宗式。时惟月黑风萧萧，绿林夜展妖旗白。入门如雪闪刀光，阿父在堂惊夺魄。儿知有父不知身，以身捍父锋刃逼。竟教罗刹现菩提，遂使庭帷安衽席。一朝湖海迫饥驱，恶浪掀天父舟溺。奋然跃水抱出之，河伯潜逃鲛女匿。寻常色养尤婉愉，孺慕终身情罔极。此间过者宜肃钦，直是中流一柱石。”

“绰楔”指官署所立的牌坊。

七十二、红梨诗社

社结红梨岁一期，积诗成帙兴淋漓。
里中古迹与遗俗，都化骚坛绝妙词。

红梨诗社是清道光年间（1821—1850）盛泽的文人骚客自发结成的诗社，社长为周梦台。

周梦台，字叔斗，号柳初，谢天港（今胜天村）人，诸生，是明末浙江道御史周灿的六世孙。他的书法“宗苏长公（苏东坡），姿态秀逸，颇名于时”，“间为篆隶，古雅有致”；他的诗文“戛戛独造，不蹈近人蹊径”，著有《茶瓜轩诗稿》。

当时，周梦台与陈希恕等人常在沈烜家的停云读画楼饮茗赋词，沈烜之子曰寿、曰富兄弟“皆好诗”，于是“共倡红梨（诗）社，推叔斗为社长”。诗社设在圆明寺附近的西庵，与红梨渡相近，故名为“红梨”。

诗社成立后，诸同人或每月一聚会，或一月两聚会，“咏里中古迹及残年新乐府”，“积一年，得诗若干”，由分湖郭频伽作序，结集成《红梨社诗抄》。

今有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红梨社诗抄》（陈希恕辑）行世。

“帙”是“册”的意思；“骚”指“离骚”，“骚坛”即诗坛。

七十三、仲湘轶闻

嗜友无如仲氏湘，箧中诗卷尽琳琅。
编成留爪悲蘦落，风雨名山枉断肠。

仲湘，字壬甫，号子湘（又号兰修），诸生。

仲湘幼读诗书，有才气，“弱冠时，诗文已传播人口”。他“循分洁己，不慕干进”，“其用力尤在于诗，不专尚一家，能屏去浮华，力趋正轨”。晚年，将一生诗稿收录成册，名为《宜雅堂诗录》。

仲湘性好交游，虽然“家甚贫”，却“爱友若性命”，平时“惟与平湖顾广誉、同邑陈寿熊、沈曰富辈切磋学行”，“乐亲贤才，敦气谊，交游遍大江南北，而于桑梓之情尤厚”。他“以发潜阐幽为己任”，着意收集“诸故旧”的诗作，编辑成《留爪集》。待印书的雕版完工时，正好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咸丰元年，即1851年），江南一带战乱频起，仲湘也因“侘傺”而死。

《留爪集》所辑皆“邑人诗”，“人自为卷，得数十家”，为后人保留下许多前贤的作品。“嗜友无如仲氏湘”，仲湘功不可没。

“蘦落”即零落；“不慕干进”是不谋求仕途的意思；“侘傺”指因失意而精神恍惚。

七十四、李筠轶闻

陇西一朵女贞花，移向咏楼吐异葩。
多谢两雄文笔健，写侬志节语无夸。

李筠，字冰壶，新杭市人。“性端谨，好读书，喜闻忠孝节烈事”。曾购得刘子政《烈女传》，“从兄弟讲解，忘倦”。

李筠自幼许配于秀水（今浙江嘉兴）诸生沈堉之子沈维铦为妻。十七岁时，未婚夫死，李筠“闻讣，饮泣不食数日夜”，对父母说：“儿无他求，生死愿归于沈。”从此，她“服常缟素，笑不露齿”。父母亡故时，幼妹才十岁，她每天教幼妹认字读书，“历九年”。咸丰元年（1851），沈堉夫妇“感其诚，以妇礼迎归”，李筠抱“木主”成婚。到沈家后，她“事舅姑（公婆）尽孝，姑病，不入己室”。

自维铦夭亡后，李筠“叠遭亲丧”，日益憔悴，于咸丰四年（1854）三月抑郁而死，年仅二十九岁。朝廷予以旌表。

李筠死后，其弟李龄寿（字君锡，号匏斋）及维铦之弟沈景修（字蒙叔，号蒙庐）“皆有诗文纪其事”。

“陇”，古时同“垄”，指土埂。“女贞”，树名，耐低温，古人因其“负霜葱翠，振柯凌风”，故以其象征女子的贞节。

七十五、沈曰富

南一觥觥德不孤，切磋道义半鸿儒。
文章亦学桐城派，换羽移宫蹊径殊。

沈曰富（1808—1858）字沃之，号南一，清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赴京“会试不第，遂淡于仕进”，在家研习经学，与同邑陈寿熊相友善。

曰富之父沈烜，“工文擅画”，母叶秋霞，“能诗善书”。曰富自幼得母教诲，十六岁即能作古今体诗。“平湖方坰来盛湖，以陆清献（清代理学第一人）之学倡导后进”，曰富拜方坰为师，学业大有长进。此时，震泽张履在句容任训导（文教之官），平湖顾广誉执教于里中，两人“皆以精性理、深经术有名于世”，他“执弟子礼”向两位求教。娄县（今上海松江）姚椿是桐城派大师姚鼐的弟子、著名散文家，曰富又“受业于姚椿，得桐城派真传”。

曰富“治学以程（程颢、程颐）、朱（朱熹）为主，兼综汉、宋，为文本桐城（派）义法，细致慎密，语言质朴，诗词多磊落不平之气”，其诗文“深得近人柳亚子推重”。曰富所居书斋名为“受恒受渐斋”，著有《受恒受渐斋诗文集》十六卷以及《当湖弟子传》、《夏峰弟子传》等多种。

曰富“事母孝，每饭必共案（桌）”，与兄弟相处，“各视其性情而和协之”。五十一岁时，曰富得急病身亡。

“觥觥”意为刚直；“换羽移宫”比喻内容有所变更，“羽”与“宫”是古代乐曲中的音调名。

七十六、郑氏昆仲

二郑翩翩经世才，澄生年少亦良哉。
遭时不偶多悲慨，寿不中身遽已催。

郑恭燮，字孟调，又字理卿。其弟郑恭和，字仲协，又字寅卿。兄弟同为诸生。

郑氏昆仲年少好学，与仲元熹（字澄生）相友善，三人都是“能读书可成就者”。当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占领盛泽之时，三人“朝夕慷慨论时事，讲求经世有用之学”。恭燮评论《周官》（古代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著作，儒家主要经典之一）一书，并着手编著《职官考》，但未能完稿。恭和曾“拟为畿辅（京都附近地区）屯田策”，议论西北水利开垦事十分详尽。元熹爱研究西方的火器，后又喜儒家“性理之书”。

郑氏昆仲“以诗文负重名于乡邑”，但都未满三十岁就“盛年夭逝”，令人惋惜。

恭燮之子郑慈谷，字二贻，号式如，是清末至民国初年的著名士绅，思想开明，热心公益。他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创办了盛泽的第一所学校“郑氏小学”，又联合商界贤者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首创盛泽镇商会，辛亥革命（1911）后吴江光复，他被推举为盛泽司令部长。式如之长子之兰（字咏春）是江苏高等学堂教授，次子之番（字桐荪）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长女郑瑛（字佩宜）是柳亚子夫人。咏春之子郑重是厦门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华东海洋研究所副所长，郑重之子郑兰荪是厦门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可谓一门俊杰。

“昆仲”是对别人兄弟的敬词。

七十七、陈宗元

孤城杀贼类常山，乔梓捐躯战血殷。
抉目东门尸未裹，凛然正气自人间。

陈宗元，字保之，号柳平，谢天港（今胜天村）人，清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历任吏部验封司主事、考功司员外、文选司郎中。

宗元为人“胸怀坦直，和而不流”。在京任职二十年，上至堂官（部的长官，如尚书、侍郎）下至胥吏（官府的办事人员）无不“亲而敬之”。咸丰三年（1853），“京察（对京官的考核制度）一等，简放江西吉安知府”，后又“加道衔”。

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五六万军队攻吉安，城中守兵不到千人，宗元一面“遣使至省垣求援”，一面用计假投降，诱骗太平军进城，趁机杀伤太平军数千人。宗元前后坚守六十五日，虽“城中食尽，杀犬为粮，燃薪代烛，终无懈志”，最后，因“援兵不至”，石达开“以地雷轰裂城数丈”，终于攻破了吉安城。宗元与长子“挥刀巷战，力竭死之”。石达开将宗元父子的首级悬于东门。“甚惨”。

宗元的长子名世济（字既甫），在破城前，他“先已出城送其母与弟登舟，复缒入，侍父不离侧”，直至与父一同战死。

宗元阵亡后，谥号“武烈”，“国史馆立传”，“入祀京师与吉安昭忠祠”，并在原籍“建立专祠”。长子世济入编《殉节传》，次子世梁袭封“云骑尉”。

“乔”与“梓”都是树，古人以“乔梓”比喻父子。

“抉目东门”是成语，指忠臣被杀。

七十八、华阳堂

馆坛孤本阅星霜，曾署华阳顾氏堂。
宝物难邀神物护，也随尘劫付沧桑。

小庙港西侧华阳堂弄内的华阳堂顾氏，原藏有海内孤本《旧馆坛碑》。

《旧馆坛碑》全名为《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此碑保存了道教史上的著名人物许谧的宝贵原始资料，历来为人所珍视。因碑文为南北朝时期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陶弘景所撰，而陶弘景曾隐居于茅山华阳洞，自号“华阳隐居”，故而顾氏因此碑而名其堂为“华阳堂”。

清代篆刻家翁大年（字叔均，吴江人，1760—1842）曾摹刻《旧馆坛碑》双钩一本，并仿《瘗鹤铭考》作《旧馆坛碑考》，称“此碑翁覃溪、钱竹汀诸前辈屡求而未得，在茅山玉晨观，明嘉靖（1522—1566）间毁于火”。他“考证诸家所记载，审定原碑高、广、行、列、字数”，碑文“首行云：‘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弟子华阳隐居丹阳陶弘景谨造’，凡二十四字；又一行云：‘此一行，隐居手自书’，凡八字；文凡一千四百余字。云是弟子孙文韬书。”

《旧馆坛碑》“旧藏稼堂潘氏，后入华阳堂顾氏”，清道光（1821—1850）末，“浙江某司马”在吴地为官，“以五百金购去”，但在“咸丰三年（1853）金陵失陷（太平军攻克南京）”时，毁于战火。

七十九、孙金彪轶闻

缚虎转成纵虎忧，弟昆济恶发难收。
谁为乡里除民害，羡煞英年孙仲谋。

孙金彪，字绍襄，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生，元和（今苏州）人，“以勇侠名闻里中”。

金彪之父孙七，“精于拳技，赌博为生，有枪船四五十艘，常泊于西白漾目澜洲旁”。孙七“屡在乡里行善，故里中不论贫富，对他均有好感”。孙七死时，金彪年仅14岁，已“人武庠为诸生”，群枪船将他奉为船主。金彪“年虽少，独能以兵法部勒其众，刑赏不徇私情”。

朱法大，东舍港人，“亦开赌于盛泽，凶横滋事，无所不为，居处枪炮林立，人莫敢近”。咸丰九年（1859），太平军东进，江苏巡抚徐有壬“恐法大有变，捕之甚急”。法大之弟法二被捕后，法大“抓住仇人沈滚灯，挖去他的腹心，在腹中放进砖石，沉至河中”。此时，太平军将至盛泽，有人“谋请释放法二”，让他带领地方“团练”（乡间的民兵）对抗太平军，于是，法大更加横行无忌。

此时，年仅十七岁的孙金彪已聚众千余人，他于咸丰十年（1860）七月一日，率众“围法大于西市，设计擒杀法大、法二，并戮羽党二十余人”。

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镇压太平军，攻克吴江，金彪投至李的麾下，“授千总”，后又“随张勤果至陕甘，以战功擢记名提督，授陕西汉中镇总兵，赏黄马褂”。

八十、庚申旧事

红粉门牌竭泽渔，罢民犹作乐郊居。
纵教共受鲸鲵戮，水阔尚多漏网鱼。

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东征苏南，建立苏福省，史称“庚申之役”（此年岁次庚申）。

四月，太平军占领嘉兴，盛泽富商王永义“派遣其侄子小王五官及沈枝珊、宋七达子、仲纶（绰号仲瘪嘴）等赴嘉兴犒劳太平军”。太平军“授予小王五官军帅之职，给予令旗、令箭，令其镇守盛泽，以沈枝珊为师帅，协同把守”。七月初二，太平军进入盛泽，建立地方政权，沈枝珊任盛泽乡官，并将盛泽划归绣水县（即秀水，因避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讳，改为“绣水”），直至同治二年（1863）春。

此时，王江泾、双林等丝绸重镇遭受战火的重创，许多绸商、机户来盛泽避难，“户口比平时数倍”。

太平军占领期间，“始则令设门牌，有门牌捐，又有红粉（即火药）捐”。“里人陶云亭为之谋划，开设天章机捐局、公估钱庄，设立关卡，抽厘以筹集军饷”。“庄东甫、徐绩卿以经商为名往返上海，借机探听清兵消息，并购买洋枪火药，接济太平军”。盛泽“实为太平军的心腹要地”。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失败后，“盛泽乡官沈枝珊、监军李广亭被清朝处死，仲纶瘐死狱中”，而陶云亭“独漏网焉”。

八十一、轧杀桥

寰宇方庆兵气销，如何一炬土成焦。
内讧外寇民罹劫，轧杀桥头鬼夜号。

清同治三年（1864），清军收复吴江后又进攻嘉兴的太平军。正月二十四日，湖州的太平军为解嘉兴之围，派兵至南麻、坛丘、四亭子、新塍，准备进攻盛泽、平望，干扰清军的后路，被清军的淮阳太湖水师击退。

二十八日，太平军再至盛泽，包围王江泾的清军后路营盘。此时，盛泽的“分防县丞及驻防炮船皆飏去”，沈枝珊之众也趁机“大掠”，于是纵火焚烧民屋，“盛泽屋宇被焚者十之三”。居民震骇，奔逃藉踏，落水死者数十人”。此后，人们称其地为“轧杀桥”。

“庚申之役”（太平军攻占苏南地区），“江浙各巨镇”中惟有盛泽最早有犒劳太平军之举，因此盛泽的市面未受到严重破坏，“商民苟安”，虽然“中间略有小警”，也因地方的乡官人等从中周旋，故而对绸业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周边地区的许多绸商和富裕的机户纷纷迁居盛泽，使盛泽获得一次意外的发展机遇。但是，此次大火损失甚巨，《盛湖志补》在述及此事时说：“至此亦遭一炬，岂定数难逃欤”。

八十二、愚孝旧闻

割股虽愚孝亦纯，未将混沌凿天真。
于今伦纪多偷薄，至性谁如十五人。

国人历来重“孝”。在封建时代，提倡“百善孝为先”，清代王永彬在《围炉夜话》中解释：“常存仁孝心，则天下凡不可为者皆不忍为，所以孝居百行之先。”

对于如何尽孝，不同时代、不同家庭有着不同的方式。在古人所宣扬的孝行故事中，既有感人至深的孝子贤孙，也有应该摒弃的愚昧陋习。“割股疗亲”就是一种十分愚昧的所谓孝行。

“割股疗亲”之说出自《宋史·选举志一》：“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由于当时对科学的认知低下，以及当局对孝道的不恰当宣扬，古人以为割下自身的股肉来治疗父母的病是最大的孝行，因此历朝历代都有“割股疗亲”的孝子出现。在盛泽的历史上，也曾有“王果、王权、沈钦文、杨寿煦、马承惠、杨庆梁、张坚、王炘、炘妻沈氏、张鉴、王淇、马大锡、马大衔、陈希恕、张宝钟皆以孝割股，凡十五人”，其中“张坚、张鉴孝行于继母、继祖母，其尤难者”这样的记载。

随着现代医学知识的普及，今天已不会再有这样的“愚孝”行为发生，但是“割股虽愚孝亦纯”，他们这种孝行的“至性”，令人钦敬。

八十三、甘旨奉母

甘旨只凭卖饼钱，衣冠肃祭礼无愆。
迟归不敢惊亲卧，露立门前夜悄然。

张经清，字庸伦，父瑞龄早故，家甚贫寒。

经清“目不知诗书”，虽年幼，但每日手提一筐至市中卖“饼饵”，以卖饼所得“养其母沈氏，并抚育弟妹”。经清长大后，家中“生计依旧”。有人劝他娶妻，他说：“等弟弟长大成家，能延续后代，我已很满足了。”后来弟弟夭亡，又有人劝他早日成家，他说：“我母亲年已花甲，从未享过清福，如果娶个媳妇不贤，恐伤母心。”

经清待母十分孝敬，寝食都先想着母亲，每日卖饼得钱，必先买“甘旨”（可口的食品）奉母，而自己只吃粗劣的食物。有一日晚归，他怕吵醒母亲，竟“依依立户外达旦，不敢叩门”。

经清虽然只是个辛勤劳作的“市佣”，却极为懂礼节，一套稍微整齐些的衣衫，长年藏在箱中，只有到了岁末，才穿戴好了祭祀先人，拜其母亲。母亲亡故后，他还是每天买了“甘旨”上供，就像母亲在时一样。

经清虽“笃于孝如此”，却从不张扬，“不令人知”，后来竟因哀伤得病而死。

八十四、清末书家

近代书家宋与金，新斋悬腕亦骎骎。
寒柯后起冠时辈，翰墨场中谁嗣音。

清末，盛泽书法家辈出，金作霖、宋恭敬、计接、沈景修等皆以书法名世。

金作霖，字邦荣，号廿叔，诸生。“学书自褚河南（褚遂良）而趋颜平原（颜真卿），旁涉苏子瞻（苏东坡），其胸中卓荦（超绝）之气尽发之于书。尤善篆刻，仿秦汉遗法”。著有《补蹉跎室稿》。

宋恭敬，字胜吉，号惺甫，是金作霖的弟子。“年十四五，能作擘窠大字，其磅礴郁积不减作霖也”，又“好画梅”，“工填词”。“写梅，辄题词于上，人称三绝”。著有《小壶山馆词稿》。

计接，字汉韦，号新斋，是吴县名书家金祖静的外孙。幼年曾随金祖静学书法，“其书遒劲虚和，深入晋人堂奥（比喻深奥的义理，深远的意境），大小字皆悬肘书之”。

沈景修，字汲民，号蒙叔，晚号寒柯，“书名满江浙”。为咸丰辛酉（1861）拔贡，历任宁波、萧山、分水（今浙江桐庐）、寿昌（今浙江建德）各县教谕。“少时文名籍甚”，其“书法为世所推重，作楷如初唐诸家及魏晋六朝无不肄习，而晚年自信可传者在行书，流布最夥”。著有《蒙庐诗存》、《井华词笺集》等集。

“骎骎”，比喻事业进展很快。

八十五、清末画师

三十年间老画师，王维而后属徐熙。
零缣遗墨谁珍惜，无复丹青妙入时。

王礼（1813—1879），初名秉礼，字秋言，号秋道人、蜗寄生，别署白蕉研主，室名“木瓜楼”、“延秋款冬之室”，清末盛泽画家，久寓上海。他“幼嗜笔墨，从沈石芗学写花鸟，劲秀洒落，笔如刻铁，隽逸之气，令人意爽；人物宗陈洪绶”。中年时，“为人作五色笺巨屏十二幅，绚烂夺目，敷色古厚，得北宋人法”。晚年“益臻神化，名满艺林”，“同治十三年（1874）作梅花喜雀图，现藏日本”，为近代六十画家之一。

徐棫（1841—1915），字克生，盛泽人。“善花卉、翎毛，笔墨劲健，风神灵逸，间作山水，稍嫌清疏”。徐棫“为王礼入室弟子，与徐祥并称‘二徐’”。

王礼与徐棫是清末三十年间活跃于画坛的盛泽名画家，沈秋凡先生对他们的评价很高，将他们比作唐朝的王维和五代时期的徐熙，可惜二人逝后，一时竟无传人，故而慨叹“零缣遗墨谁珍惜，无复丹青妙入时”。

“零缣”意为片段的珍贵文字。

八十六、李龄寿

鲍翁妙笔续松陵，文省于前事转增。
会得龙门合传体，故应气势独崚嶒。

李龄寿，字君锡，号辛垞，又号鲍斋，诸生，盛泽人。

龄寿“自少刻苦为学”，为饱学之士，然而科场不利，“秋闱屡试不售”，于是抛却科举之业，更“肆力于诗古文”。

他与青浦熊其英（字纯叔，一字含斋）、莘塔凌淦（字仲清，号砺生，晚年别号退庵）相友善。当时，凌淦正“欲辑江震两邑（清代的吴江县与震泽县，即今天的吴江市）之文”，龄寿“相与斟酌出入，精心采辑，不足则取诸他氏，搜访略遍。自国朝迄道（光）咸（丰），得文三百余首，名《松陵文录》”。又与熊其英同修《吴江续志》。沈秋凡先生对他的评价极高：“《吴江续志》半出其手，孝友、艺术等传，或合十数人为一传，纯以议论行文，创前志所未有”。

龄寿中年后“专攻医学”，颇有造诣，成为“清末医家”，曾批注凌淦的《退庵医案》，并重校辑《古今医案》，为后人所重视。

他的晚年“遭际多故，才逾五旬，须发皓然，未几即卒”。同人收集他的诗文，编成《鲍斋遗稿》。

八十七、文采风流五百年

文采风流五百年，后贤讵必逊前贤。
井华老去冬花逝，寂寞无人倍黯然。

盛泽虽是弹丸小镇，却有“黉宫（学校）蜚声”的美誉，历史上曾“人文蔚起，科第相望”，先后产生过二十四名进士、七十七名举人。

盛泽“文史之盛，权舆（起始、萌芽）于西村，发皇（发达、兴盛）乎孟硕”。史鉴（1434—1496），人称“西村先生”。他“博览群书，尤长于史，钱谷、水利之学问尤所深究”，时称吴中高士。卜舜年（1587—1620），字孟硕，是盛泽最负盛名的才子，他的著作颇丰，有《绿晓斋集》等行世，对盛泽后人影响极大。

入清后，又有“计甫草氏、史仲文氏、王任堂旭楼、杨辛甫、仲壬甫等风流儒雅先后辉映”。计东，字甫草，曾被史可法视为奇才。他云游四方，广交各地名士，“胸罗今古，才压俊英”，曾与各地名士结成“十郡大社”，传为文坛盛事。史善长，字仲文，“以诗名于时，足迹半天下”。仲湘，字壬甫，“弱冠时，诗文已传播人口”。他收集“诸故旧”的诗作，编辑成《留爪集》。

至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李匏斋、沈蒙庐（即沈景修，著有《井华词笺集》）、施拥百、王冬花诸先生能文章，擅吟咏”，可谓人才辈出。

沈秋凡先生对盛泽的“文采风流五百年”深深怀念，因此发出了“井华老去冬花逝，寂寞无人倍黯然”的叹息。

八十八、汪守愚

蓝田厅事日哦松，大有诗人相过从。
吾爱汪伦才调好，铁梅唱出笔犹龙。

汪守愚，号虎溪，秀水（浙江嘉兴）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由崇明县丞调补吴江县丞，光绪七年（1881）七月任满验看，九月又回任吴江县丞，光绪十年（1884）四月死于任所。他是历任吴江县丞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清乾隆五年（1740），吴江县丞署移置盛泽，先在吴中丞祠，后因“同治三年（1864）毁于兵燹，县丞寄居先蚕祠别院”。

守愚好诗画，公务之余“与里中李匏斋、沈蒙庐、施拥百诸诗人日相唱和”，曾有“《铁梅歌》一首，附见《匏斋遗稿》，颇奇崛可喜”。著有《虎溪诗存》。

清《晚晴簃诗汇》中录有汪守愚的诗《辛酉九日示弟辈》：“多难登临易感伤，天教薄暝黯重阳。雁鸿零落犹成列，鸡犬平安岂待禳。小市祇工桑醑酒，闲官久已枣为粮。折萸试问诸昆弟，犹胜登高各异乡。”任伯年的《钟馗醉游图》上也有他的题诗。

“哦”是吟诵的意思。

“验看”是清代对官员的一种考察制度。凡吏部所选官员，如不引见皇帝，则由特派的王公大臣共同传见，考察其年力是否胜任，称为“验看”。

八十九、徐孝子

嘻嘻出出火焚庐，争说后街孝子徐。
不获裹毡缒母下，呼天同殉惨何如。

徐儒选，字梅邨，居于后街，家贫。“自幼至孝，曲体亲意”。

清光绪十五年（1889）四月初一深夜，徐儒选家的房屋楼下突然起火。儒选之母年已七十四岁，因卧病在床不能下楼。当时，儒选的岳母也住在他家，见烈焰腾腾，催他赶快逃离。儒选说：“我有母，不能出。”让岳母先走。此时，“火及梯，欲断”，他反身上楼，用毡子裹住母亲身体，欲从窗口缒下，可惜火势太猛，未能救出，母子都死于大火中，儒选兄长的女儿也同时被烧死。儒选死时四十三岁。

徐儒选本可逃生，但为了救母，葬身火海。他的孝行，传遍里中。第二年，他受到官府明令旌表。

里中诗人李龄寿作《嘻嘻出出谣为徐孝子作》，颂扬徐孝子的德行。

“嘻嘻出出”为象声词。

九十、陈其荣轶闻

颍川一老比邻居，不恤家贫酷买书。
莱妇龙钟犹出汲，暗修要足式乡闾。

陈其荣，字荛庵，号桂颐，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清同治丁卯（1867）举人。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占领嘉兴，他为避战乱，迁至盛泽阳春弄，与沈秋凡先生比邻而居。

陈其荣“为人耿介，不求闻达”，他“博览群籍”，尤“精于目录之学”，“终岁校勘不辍”。许瑶光任嘉兴知府时，聘请他参与修编《嘉兴府志》，“成经籍一门”。他曾编辑《国朝师儒传学表》，对于“近时诸儒学术源流了如指掌”，又编辑《樗李文系》数十卷，“惜未脱稿”；还几次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为其“校书”。

他嗜书如命，所得酬金几乎都用于购书，而且“所藏皆精本”，但家中时常缺柴少米，其妻六十多岁时，还自己提了壶出门打水。对此，他安之若素，泰然处之，真可谓近世之“暗修之士”也。可惜他死之后，竟然“贫不能举丧，遗书顷刻尽”。

“颍川一老”指陈其荣。因陈氏为颍川名门大族，故“颍川”成为陈氏的重要郡望。颍川为古代郡名，即今河南许昌、漯河一带。

“莱妇”指春秋时楚国老莱子之妻，后作为贤妇的代称；“暗修之士”指暗自修行砥砺之人。

九十一、井砖桥石上的历史

遗迹曾留泰始年，市廛兴废几沧田。
井砖桥石分明在，典午风流已渺然。

据现有的文字资料记载，盛泽地区的开发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孙吴赤乌三年，即公元240年。当时，吴大帝孙权手下的司马领濠寨盛斌在这里建围、作田、屯兵，开始了对盛泽地区的开发。

这段记载也得到实物的验证。

百年前的某年，盛泽大旱。湖水下退后，在西肠圩的湖滩上露出一井，“内皆砖筑，其深不知几许”。有人“取一砖制砚”，发现砖上有“晋泰始五年”几个字。“泰始”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泰始五年是公元269年。

此外，东庙前的庙桥（后称东庙桥）也是晋泰始五年所建，后曾几度重建。当年一块镌刻有文字的桥面石，被移至小庙港平桥上作桥石。上世纪六十年代，东庙桥被拆除，改作钢筋混凝土平桥，名东新桥；至七十年代，市河被填平，东新桥被拆除，当年的市河与两岸的南、北大街合成了今天的舜湖中路。

“市廛”是指商店集中的地方。

“典午”是晋朝的代称。

九十二、终慕桥

北斗坟荒酒莫浇，古津依旧卧虹腰。
众中谁抱蓼莪痛，怕过柏家终慕桥。

终慕桥原建于斜桥河上，位于先蚕祠门前右侧，桥之南连接后街，为“宋孝子柏深山创建（始建年份及元明修建无考）”，“俗呼柏家桥”，乾隆六年重建时改名百嘉桥。震泽倪师孟有碑记载：桥之改名，乃“以俗称柏家桥而误也”。

柏深山是“宋季遗民”，因“承亲未竟之志”而建此桥。“深山以终慕命名，礼所谓思贻父母，令名必果也”。清乾隆时，里人龚昇有诗曰：“吴江孝子宋三人，老柏苍苍独保身”。又曰：“简该孝行著分明，两字桥题终慕名。”并自注：“今改其名，恐孝子旧迹渐至无考”。

孝子柏深山墓“在西肠圩北斗弄南口”，清乾隆（1736—1795）时“墓犹存，垅后竟填平，筑室其上”，后“夷为民居”。

上世纪九十年代，斜桥河之东段填平后筑路，下面铺设涵洞以通水流。终慕桥拆除后，以原桥石按原样移建于目澜洲公园内。

“古津”是渡口的意思；“虹腰”是虹的中部，这里指桥。

“蓼莪”：《蓼莪》是《诗经》中的一首诗，抒发不能终养父母的痛极之情。

九十三、斜桥

小小斜桥跨两圩，流传宋建几曾符？
若非墩圮柱书露，孰辨淳成音误无？

斜桥，为梁式石桥，建于明成化七年（1471），清嘉庆五年（1800）重建。震泽倪师孟（清翰林院编修、《震泽县志》编纂）作有碑记。

斜桥横跨于斜桥河上，桥之东为大适圩，之西为充字圩。桥长14米，宽3.55米，高2.45米，跨度5米。

据原《吴江县志》记载，斜桥建于淳化年间（990—994），因此人们一直以为斜桥是一座宋代古桥，直至清嘉庆五年斜桥重建时，出土了一块桥柱石，柱石上刻有一行字："大明成化七年岁次辛卯八月吉日鼎建，干缘善士张季宗、沈或、沈璚、沈琮，助缘张文宗。"由此才认定斜桥应建于成化七年，而县志上所记载的"淳化"乃是谐音之误。

话雨楼的主人王鲲（约1760—1835）在《松陵见闻录》中认为"是刻周围花纹古拙，字法端整足正"，应该可信，"《邑志》讹为宋淳化也"。王鲲生活的年代正是清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因此他的记述应该是可靠的。

"鼎建"是营建的意思。

九十四、文起阁

朝霞烂抱水东楼，四壁松云动欲浮。
今日重寻文起阁，星移物换不胜愁。

文起阁，在昇明桥东（今已废）。

明代时，昇明桥以东的水面较今天更为宽阔，崇祯十二年（1639）在水中筑分水墩。清康熙三十年（1691）又在墩上建文起阁，高三层，八角状，故俗呼八角亭。文起阁的“壁间旧有王补云（清代吴江知名书画家）绘松梅云石”。道光二十七年（1847）文起阁毁于火，至同治（1862—1874）初“改筑平屋，光绪（1875—1908）中又圮”。

文起阁祀文昌帝君。文昌帝君是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因此历来受到读书人的尊崇，但是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后，因“科举既废，民俗忽视文昌，遂颓毁”，至民国初，仅“剩破屋数间而已”。

清代学者朱彝尊（1629—1709）寓居盛泽时，因旧题“盛湖八景”大多与当境不合，于是更定为“盛湖十景”，其中有“文起朝霞”一景。

清代仲枢的《盛湖怀古》诗中提到了分水墩和文起阁：“麻溪九曲拱前村，南北分流抱水墩。”“阁飞文起崇三级，桥锁昇明聚五流。”诗后有注：“镇南有水九曲，自麻溪来，经前庄村到镇中入白漾（东白漾）。漾东大港泄五路之水（东港、斜桥河、市河、新桥河、东泾桥河）于此，故设桥（昇明桥）、墩（分水墩）为锁。分水墩有高阁三层，名文起阁。”

九十五、迎风庵

迎风庵澈水中边，消夏人来别有天。
快读遗碑张叔未，夕阳西下忘归船。

迎风庵，原名化成庵，在西白漾湖中央的分水墩（俗称风水墩）上，今已废。

江南水乡多湖，过去民众都以船为主要运输工具。因民船大多为小木船，一旦起风，湖中风浪时常危及来往船只，故而大湖中往往筑有土墩，以减少风浪危害。这类土墩称分水墩。

西白漾是镇西郊的大湖，又称盛湖、舜湖，湖面达460余公顷。“舜湖之水发源于东天目，由烂溪东流入湖，湖之西南实当来水之冲。湖以南为往来舟行要路，每风狂雨骤，波浪奔腾，势甚恶，舟远不得泊，遭其厄者屡矣”。

里人陈良才念行船之险，发愿“于来水冲激处筑墩，以分其势，使舟楫得藉以停泊避险捍患御灾”。从嘉庆十八年（1813）起，他募资筑墩，“虑事图功凡十阅岁，而湖墩之基址成”，至道光七年（1827）又在墩上“建屋五楹以奉空王（佛的别称）香火”，名化成庵。同治九年（1870）庵僧“得泉于左”，又“拓建斋堂、水阁”。里人杨秉桂作《化成庵记》，嘉兴张廷济（号叔未，清代书法家）手书，勒石立于庵中。

旧时，镇民视分水墩为消夏胜处，善游泳的少年也常游至墩上玩耍。六十多年前，迎风庵（即化成庵）已夷为平地，1970年西白漾被围垦后，分水墩与周边连成一片，如今已成为东方丝绸市场的一部分。

九十六、小洞庭

千顷湖光小洞庭，两山不见一螺青。
阿侬未得双眉样，何况道场作画屏。

西白漾是镇西郊的大湖，古称盛泽荡，又称盛湖、舜湖，此外，它还有一个别称“小洞庭”。

过去，由于环境少有污染，空气质量优异，因此，站在西白漾湖边能看到太湖的洞庭东、西两山，甚至湖州的道场山，“天晴遥见其峰，恍若屏障”，故有“小洞庭”的雅称。

盛泽的文人雅士对小洞庭有特殊的偏爱，留下了众多赞美的诗篇。

清代仲枢的《盛湖怀古》诗中有两处提及：“道场山并两峰青，湖外天西作画屏。”“洞庭爽气接湖头，东漾西湾尽日游。”并在诗句后作注：“盛泽荡向名小洞庭，湖因洞庭两山而名，岂知道场山未尝不在望中？”春晖堂主人宋景和也在诗中说：“侬借双峰作眉样，孤青不爱道场山。”

然而两山毕竟遥远，不是经常能见到的。清乾隆（1736—1795）时柏子庵的释力成在诗中称：“试立香波桥上望，望中不见两山青。”沈秋凡先生也说“然予登高远眺，确未之见”，故而在此诗中写道：“阿侬未得双眉样，何况道场作画屏。”

“两山不见一螺青”：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望洞庭”中有一句“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九十七、三义士墓

棠梨落尽草芊芊，中有当年义士阡。
行遍东郊无觅处，姓名事迹两茫然。

清乾隆《盛湖志》之《墓域》篇记载："三义士墓在东肠圩东秀桥东堍下，姓名未详"，而《坊巷》篇也载有"尚义坊，在东肠，即三义士墓处"之语，然而前后两《盛湖志》、《盛湖志补》、《盛泽镇志》以及其它史料中对三义士的姓名、事迹都没有只字片语，关于墓的具体位置也语焉不详，因此，这段史料只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

东秀桥"俗称乌新桥，跨东肠、西肠两圩，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建，乾隆二十年（1755）易石"。尚义坊是乾隆年间(1736—1795）盛泽的"三街、五坊、八弄"之一，在东秀桥东堍；至同治年间（1862—1874），盛泽镇区扩大为"十一条街、十三条里、十四条坊和六十五条弄"，尚义坊之名依旧还在。如今的东秀桥东堍，向北至庄基湾，向南直至南新桥统称为乌新桥东岸。

明代里人卜梦熊（1536—1601）曾作《吊三义士墓》诗："步出东林里，垒垒三冢横。愁云松杪结，侠气地维生。一诺千金重，片言九死轻。潸然双泪堕，落日不胜情。"诗中的"一诺千金重，片言九死轻"应该是赞美三义士"重诺轻死"的侠肝义胆，可惜具体所指内容已无从知道。

"阡"指通往坟墓的道路。

九十八、白马泉

三里三泉各一隅，安排调水好分符。
月明白马桥边立，可有如船珠蚌无？

白马泉在圆明寺东侧的白马桥下。

据《盛湖志》记载，盛泽有三泉，“俱在三里内”。

一是白马泉，“月夜波静，泉涌可认”。清代仲枢有《白马泉》诗：“殿阁翬飞亭翼然，圆明香霭盛湖烟。行人小憩停阑饮，白马桥头白马泉。”传说白马桥下“有巨蚌如船，踞泉眼上，蚌移动，则泉始出”。此说过于玄虚，不足为凭。

二是潭泉，“在绿葭潭（今永和村）水中，冬夏清澈”。

三是东迳泉，“在饭字圩（今杨扇村）东瓜坝全真道院（一名沈潜庵，又名澄泉庵）后”，泉水“渟泓莹澈，人争挹之”。清代钱云的《东迳泉》诗对三泉有一评价：“东迳东畔有名泉，三里三泉品第三（白马泉第一，绿葭潭第二，此为第三，在东瓜坝澄泉庵后）。凭酌一瓢清又醒，看人醉梦日酣酣。”

泉是地下水的天然露头，在适宜的地形、地质和水文条件下，地下水流出地表而成泉。在平原水网地区，因为水系发达，泉水常常为地表水所掩盖，一般难以发现。

九十九、普同塔

普同塔畔鬼啾啾，雨晦风潇视鬼楼。
漫道市西多夜景，劝郎莫过骨池头。

普同塔，是早年间的骨塔，“在大适圩，康熙三十九年(1700) 里人管君宜建”。普同塔之西，是明朝名士卜舜年的住宅绿晓庄，当年庄内的卜舜年修仙处名视鬼楼。

过去，由于民间有溺婴的陋俗，加上医疗条件差等原因，初生儿死亡率极高。初生儿死后，“皆投骨塔中”。

据清同治《盛湖志》记载：“普同塔乃骨塔，建石屋三区，分别男女骸骨葬之。”当时共有两处，另一处“在小伏圩，雍正元年（1723）俞衡旦捐置，乾隆十一年（1746）王维镛建”。

“骨池”指骨池庵，“其南，有莲花池”，建于元至元十四年(1277)。初建时，“乡人无葬地者，皆水葬其中”，后改名圆照庵，民国十八年（1929）改建为目澜洲公园。

善举义行历来被视为美德，热心于此者代有其人。可考者除了早期的普同塔外，还有清雍正（1723—1735）初里人毛嘉庆等捐银在僧舍创设施棺所；乾隆（1736—1795）时王楠独资创设婴孩厂，收养许多弃婴；嘉庆五年（1800）郎氏在葡萄街创建同仁堂，办理掩埋、施棺、育婴并施医药、寒衣、月米；嘉庆十一年(1806) 郑昂文在保盛桥北堍创设种善堂，办理掩埋尸骨，设立堂船、夫役、护葬公局等。同治（1862—1874）初绸业公所创立后，更是热心善举，为镇民所称道。

一百、山塘上

山塘一带管弦柔，画舫参差古渡头。
绝似金阊门外路，至今犹说小苏州。

山塘上，原名山塘街，“自庄基湾过东至永福桥（俗称计家木桥）止”。

盛泽居民世代“以绸绫为业”，明代中叶后，丝绸贸易日趋繁盛，“四方商贾辇金至者无虚日”，“入清（代），盛泽丝绸业足以与苏杭媲美”，至清中期已有“日出万绸，衣被天下”之称。

由于经济繁荣，客商云集，因此弹丸之地的盛泽竟有了“绮疏曲栏，歌姬并集”的现象，除了斜桥附近的“凌巷”外，“山塘及昇明桥一带皆画舫停泊处，淡妆浓抹，清歌妙舞，竹肉并奏，日以继夜”，与苏州金阊门外的山塘街相仿，故而人称“小苏州”。

昇明桥之西侧有湖，名东白漾，古称菱叶渡，四周有五路河水注入；桥之东水面开阔，附近有文起阁（八角亭）、法轮禅院（地藏庵）、山西会馆等胜迹，风光极佳。

明代时，“东漾划船”为“盛湖八景”之一。清初里人仲时镕有《东漾划船》诗：“昔传下濑荡轻舠，嫩绿春深烟锁桥。箫管画船移旧色，旌旗壁垒撼遐郊。”并注曰：“今则画舫笙歌，日以继夜，而昇明桥高逾三仞，雪月风花俱自可人，且旌旗壁垒，屹然重镇，门户则淡妆浓抹，不胜慨古伤今也。”

民国之后，管弦渐趋绝迹，山塘上一带聚集了许多染坊，东白漾也成了“出街上”的农船集中的地方。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为了打通舜湖路，湖面被填平大半。

一百零一、绮疏曲阑

南北书房艳迹传，珠帘画栋说当年。
而今一曲春风里，剩有姑胥淌板船。

南书房与北书房“在斜桥以北及归家浜等处，绮疏曲阑，歌姬并集”。

据沈秋凡先生《沈万三秀始末考》记载：“明洪武（1368—1398）初，沈富（万三）于盛泽建南胜坊、北胜坊以兴市廛，设南书房、北书房以处女闾。”自此时起，斜桥一带成了歌姬并集的声色场所。明代中叶后，随着丝绸经济的逐渐繁盛，此风愈烈，以至有“盛湖八景”之一“凌巷寻芳”以及归家院的出现。

至清中叶，凌巷（旧名北书房）一带已“尽为民居”，故而仲枢的《盛湖怀古》诗中有“更寻凌巷无闲地，何处还余旧日芳”之句。

歌姬之类虽历来为士人所轻视，但凌巷中一些“殉节御侮”的名姬又深受士人的赞美。清代诗人仲时镕在《凌巷寻芳》诗中说：“金粉六朝佳句色，阵图两晋笔间花。兴亡节义知谁是，吊古伤今女史嘉。”称赞凌巷名姬“皆殉节御侮，不负所主，铮铮女中奇男子，故志之，以作女史云”。

“姑胥淌板船”：“姑胥”即姑胥山，为吴县的别称；“淌板船”是一种载客的船，这里是指妓船。在百年前的民国初，江南一带的画舫妓船尚未绝迹。

一百零二、山家坝与绿葭潭

坝是山家潭绿葭，风帆沙鸟树槎枒。
遥看野际疑无地，一片菱花接稻花。

山家坝、绿葭潭都是镇区西北的小地名，“在大氏圩”（今永和村）。清同治《盛湖志》记载：“镇北有水蒲浜、绿葭潭、龚家坝、山家坝、向善港，又北出中山桥为谢天港……”

绿葭潭一带“风帆沙鸟树槎枒”，“一片菱花接稻花”，风光旖旎，景色宜人。清诗人仲枢在《夜过绿葭潭》中吟道：“澄潭碧水好延绿，游到更深未拟还。水底青天两桨破，波心明月一篙穿。”

绿葭潭水中有一泉，名为潭泉，“冬夏清澈”。

元至元中（1264—1294），僧本厚在附近建庆寿庵，明成化二十年（1484）僧圆证又增建了西云楼，清初又先后建聚德堂、山门、杂室。东有伴竹轩，西有斗雪轩，南有可怡轩，“楼后洞庭两山隐隐拱其北，盛湖（西白漾）、梨荡（红梨湖）环其东，竹树阴森，蒲柳列植，芳洲曲渚，禽鱼翔泳，风帆烟云，朝暮献状。”

清初，处士仲泷“于绿葭潭置一别墅，筑园其中”，名为西园。西园落成后，里中文人雅士常来此赋诗唱和，留下诸多诗篇。计大章的《西园落成》诗描述四周的景色是“洞庭落照里，竹树罗远邨。四顾周大泽，风涛相驱奔。枌荫足流憩，烟萝可手扪。向夕揽宿莽，露坐依云根。地僻自奇旷，心逸忘哗喧。”

一百零三、前姚与下姚

前姚桥接下姚桥，桥畔渔娃弄画桡。
最是中秋明月夜，家家载酒又吹箫。

前姚桥即福海桥，俗称前窑桥，“跨老字、饭字两圩，明永乐三年（1405）道士徐某建，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里人仲锦昼重建，今桥为民国九年（1920）建”。

下姚桥，又称下窑桥、后窑桥，“在少字圩，明永乐五年(1407）道士徐某建”。

前姚、下姚，又名前窑、下窑，为古时村名，在镇东郊，今为前跃村。两个村名的由来与沈万三有关。沈秋凡先生的《沈万三秀始末考》记载：明洪武（1368—1398）初，沈万三在“前窑、下窑二村又置碗窑处”。

相传沈万三因“通番”（海外贸易）而致富，他在盛泽收购丝绸，又建碗窑烧制陶瓷，运销海外。他的碗窑虽然早已销声匿迹，却留下了一串小地名。如今的前跃村，即早年间的前窑（前姚）村，村里还有前窑、下窑、下窑港等地名。

据《舜湖纪略》记载，过去每当“中秋之夕，居人泛舟会饮于此，竹肉并奏，往往彻晓而罢。今久无此俗”。

“渔娃”指渔家姑娘。

“画桡”，桡即船桨，亦指小船，画桡指画舫。

一百零四、画师桥

小姑居近画师桥，淡淡春山不待描。
偶向来可楼下过，妒她颜色百般娇。

画师桥在程林村（今兴桥村），跨丰字、饭字两圩。

盛泽东郊一带，湖荡众多，河港密布，旧时石桥极多，仅程林村附近就有闸桥、程林桥、张家桥、佛婆桥等多座。

旧时之桥名大多较为俗套，却寄托着百姓的祈望，如永安桥（俗称西庙桥）、太平桥、万福桥、万寿桥、永福桥（俗称计家木桥）、吉祥桥、如意桥、向善桥（俗称乌桥），也有一些桥名与历史上的某些文人雅士有关，如侍郎桥、画师桥。

盛泽自发祥以来，“民齿声文过昔，黉宫蜚声”，丹青妙手更是代有才人。明代卜梦熊、卜舜年父子及徐佛、柳如是母女都善画，王礼与徐桢是清末三十年间著名画师，画师桥之名即来自于此。

“春山”：代指美女的眉毛。春山本指春日的山色，古人常将美女的眉毛比作春山。北宋词人周邦彦有名句：“眉共春山共秀”。

“来可楼”：清代里人王鲲有诗句：“来可楼中花似绮”。

一百零五、菱叶渡

菱叶渡头菱花开，采菱女伴踏歌来。
劝郎莫似西漾水，东去滔滔头不回。

菱叶渡即东白漾，位于老镇区之东。菱叶渡面积极小，形似一片菱叶，早年间“产菱颇盛”。古代未建桥时，这里是一渡口。

盛泽老镇区的地貌为“一河挑二湖”，东有菱叶渡，西有盛湖（俗称西白漾），两湖之间横贯着一条市河。有人把它比作一条扁担挑起两只箩筐，也有人形象地比作一杆秤，市河是秤杆，湖大而水浅的盛湖是秤盘，湖小却水深的菱叶渡则是秤砣，市河上的石桥就是秤杆上的秤星。“镇地西高而东下，故西荡（西白漾）之水皆流入市河，以东白漾为尾闾”。

菱叶渡的地形极为特殊，它“西受市河水，南受东秀桥、东泾桥水，西北受柏家桥水，东北汇带福桥水，昔人称其形势为‘五聚’,东流入于大港”。民间传说明初奇人刘伯温发现这里的风水乃‘五龙取水’之势,若不加以毁损,将来必出真龙天子来争朱氏天下，于是他下令在菱叶渡之北端建庙镇住龙首，免生异端。

菱叶渡一带风光旖旎，“东漾划船”为明代“盛湖八景”之一。张世芳的《菱渡渔歌》唱道：“水粼粼，烟渺渺，采菱渡口香风绕。瓜皮艇子疾于梭，双桨划破秋湖晓。不知城市闹，只解水云宽，青菱采罢钓鱼去，目澜洲外芦花寒。”

至清末，菱叶渡四周已十分繁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湖面填平了大半，建起了东白漾大桥，接通了舜湖路。

一百零六、桥梁与坊巷

郎来伴妾五桥行，妾去永安又一程。
南北胜兼南北仲，教侬坊巷记分明。

明代“盛湖八景”中有一景名为“五桥晴市”。

庙桥（即东庙桥）建于晋泰始五年（269），龄嘉桥建于唐开元八年（720），登春桥建于宋雍熙二年（985），善嘉桥建于唐开元二年（714），开源桥（即观音桥）建于明崇祯五年（1632）。此五座桥梁跨于市河（上世纪七十年代填平后，与两侧南、北大街合为盛泽大街，即今舜湖中路）之上，自东向西以次而立，市河两岸则是盛泽最繁华的商业区，故而名曰“五桥晴市”。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又在开源桥与善嘉桥之间建成永安桥（俗称西庙桥，原有木桥，此年改建为石桥）。

明洪武（1368—1398）初，“沈富（万三）于盛泽建南胜坊、北胜坊以兴市廛”。南胜坊在“西肠圩南浜（即红木浜）处”，北胜坊在“充字圩斜桥处”。至清末，此两坊地名尚在。

盛泽的弄（有的称里，北方则称巷子）众多，并有多条姐妹弄，如仲家弄就有南仲家弄、北仲家弄两条，此外还有东、西杨家弄，南、北分金弄，南、北财神弄，南、北观音弄，大、小殷家弄和大、小爆竹弄，而淘沙弄的姐妹最多，有南、中、北三条。

一百零七、白龙桥

郎驻三桥波浪深，妾家居近烂溪阴。
白龙迎得珠还去，行云漫存南北心。

盛泽“镇西之水自烂溪来”。

烂溪与麻溪皆源出东天目山。“烂溪之水分播为三，一自东汲港，一自白龙港，一自计家港，并东流入盛泽荡（西白漾）；麻溪之水自郎中荡、东、西舍港入荡，是两溪之水并会盛泽湖（西白漾）入市，其来源远而长矣”。诸港中数白龙港最大。

白龙桥，在龙桥村白龙港上，“跨南心、北心两圩，为石拱桥，三孔”。“清乾隆九年（1744）僧秀岩、里人钮美尊、李俊先创建，邑人范灿作记。光绪二年（1876）重建，移过于西。”宣统元年（1909）“里人王紫封、李璞山等多人捐建，钮文乾作记，碑记今存”。白龙桥之南“有宝珠庵桥，庵南有迎龙桥，同时修复，费银万四千两有奇”。

白龙桥东侧有一副广为传颂的桥联：“风送万机声，莫道众擎犹易举；晴翻千尺浪，好从饮水更思源”，只用短短二十四个字，就把绸都盛况勾勒了出来。白龙桥是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桥墩曾在多年前被轮船撞坏，为了免遭覆辙，在白龙港南侧另挖一港，让往来船只绕出白龙桥航行。

“三桥”和“白龙迎得珠还去”都是指白龙桥、宝珠庵桥和迎龙桥。

“南北心”指南心圩和北心圩。

一百零八、澄溪桥

飞虹高跨岸东西，越角吴根送马蹄。
重建不须僧断臂，行人安稳渡澄溪。

澄溪桥在镇东，“去镇五里，去秀水（今嘉兴）王江泾一里”，“跨厌字（今群铁村）、糠字（今兴桥村）两圩”，桥“跨溪约二十丈，邑中自垂虹外，无逾此者”。

澄溪桥下之大港“为盛泽、王江泾之孔道”，向家荡之水浩浩荡荡由此流入浙江境内，河面宽阔，水流湍急。“清康熙（1662—1722）间，僧定三断臂募建，河阔水激，屡修屡圮”。“民国二年（1913），钮文乾等筹改涵洞环桥，未竣而文乾卒”，后经“绸业诸君继之”，终于建成。

澄溪桥地处江浙两省交界，既有“越角吴根”的特殊地理位置，又有宏伟秀逸的石桥雄姿，故而历来为文人骚客所激赏，留下诸多诗篇。明代李敕禧有诗曰：“路自前窑过，长桥横白波。两傍郁古庙，中道对森萝。闻店吴江尽，临溪越水多。往来舟似织，唱晚悉渔歌。”明朝诗人蒋之翘作《澄溪桥》诗：“溪水流潺湲，人渡溪梁上。两岸垂杨烟，寥寥采菱唱。”清朝诗人王明福则作和韵诗：“澄溪水泠泠，渔梁跨溪上。何处来酒船，清讴竞和唱。”

1949年国民党军队败退时，澄溪桥被炸断，今已废。

一百零九、庚申亭

烟光绕树钓鱼矶，问莺垂虹是耶非。
试向庚申亭子望，片帆小艇去如飞。

庚申亭即沉瓦桥亭，又名知止亭，在沉瓦桥西堍。

沉瓦桥，俗称陈马桥（今误作沉目桥），在老镇区西南角，“跨往字、西肠两圩（今红洲村）”。

根据古时天干地支与方位的对应关系，西方为庚申。因沉瓦桥亭在镇之西，“属庚申方，又建于庚申年（初建之年无考）”，故名为庚申亭。庚申亭之名十分典雅，颇具文化气息，南麻学者、文学家钮琇（字玉樵，？—1704）在《觚剩》中说：“长安有子午谷，润州有丁卯桥，吴兴有癸辛里，我邑亦有庚申亭，其名绝雅，可与问莺、垂虹并传。”

沉瓦桥跨于盛溪河上，河水自麻溪来，向北直通西白漾。百年之前，这里烟光绕树，鱼戏浅水，游艇如飞，还是一派村野风光；近三十年中，随着镇区的扩大，沉瓦桥一带已渐成民居。1980年桥址向南移约二百米，改建为钢筋混凝土平桥，以利车辆通行，桥长24.5米，宽3.3米。原桥已拆除。

一百一十、绸市

黄家溪畔暮鸦啼，茅塔村中野草萋。
莫是盛衰关地运，繁华不到市廛西。

明代，盛泽的手工丝织业迅速兴起。清乾隆《吴江县志》上说：“成（化）弘（治）（1465—1505）以后，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在新杭（今群铁村）、黄溪（今黄家溪村）和盛泽镇区先后形成了三个绸市。

盛泽有句老话，叫“先有黄家溪，后有盛泽镇”。据说早在盛泽成镇之前，黄家溪就已有了绸市，到了清初，“街巷数十，溪跨五桥”，呈现了“烟火千家两岸回”的盛况。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占苏南、浙江，战火中“黄溪、新杭两市全毁”，重又蜕变为普通的村落。

相传茅塔村也曾出现过绸市，但不久便衰败。

盛泽绸市出现于明代中叶。乾隆《吴江县志》称：“嘉靖（1522—1566）间……以绫绸为业，始称为市”，清顺治四年（1647）建镇制，至乾隆（1736—1795）年间，“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盖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

明末清初，绸市交易集中于市河两岸，以中段善嘉桥一带（今东方广场）最为密集，清中叶后，繁华地段日渐东移，“镇中市面惟东大街（北大街东段，又称北长庆坊，即今舜湖中路东段）、花园街一带最繁华，登春桥以西亦日形冷落矣”。

一百十一、庄面

贩缯晴趁市河趋，市日曾传寅亥俱。
南徙新庄缘底事，壬申一炬为丛驱。

据《盛泽镇志》记载，宋朝初年，盛泽形成了贸易集市“寅亥市”，至明嘉靖（1522—1566）时，“锦绫为市”。

明末清初，绸市交易集中于市河两岸，以中段善嘉桥一带（今东方广场）最为密集，称庄面（后世称旧庄或老庄面）。乾隆十七年（1752）农历三月十三日，“桥南新街口失火，逾善嘉桥延烧至北岸，毁庐五百余家。稍后，盛泽绸业界集资在西肠圩南端（今潇湘弄以南）建新庄”。

庄面为一封闭型建筑，“四周筑围墙，北设一门，东西各有两门作通径，庄内系一式的砖木结构矮房，被南北通衢一条、东西夹道两条所分割。每间店面均一隔为二，分别由绸行及领户（领投）租赁使用；绸行朝南，领户面北”。

光绪二十三年（1897）“培元公所出资在新庄之南增建市廛一埭，称南庄”，清末，“徽商集资在庄面东南建徽州庄”，此外，“庄面周围的庄面一弄、庄面二弄及庄横头一带也有类似的市房，为绸行、领户的营业之所。丝行、筘店、梭子店、机料店大多群集于庄面外围”。

庄面是盛泽绸市的缩影，是盛泽地区经济活动的心脏。

“壬申一炬为丛驱”，指1752年（壬申年）的大火迫使庄面南徙。“丛驱”语出“为丛驱雀”。

一百十二、会馆

栋宇沉沉会馆多，承平商货百千罗。
自从旷劫重生后，鲁殿灵光余几何？

盛泽以绸绫著称，“富商巨贾数千里辇金至者摩肩连袂，以故会馆极多”。

清顺治（1644—1661）年间，南京绸商在西白漾畔的关帝庙内建金陵会馆；康熙十六年（1677）山东济宁商人在目澜洲西北侧建任城会馆（又名济宁会馆，济宁在秦朝名任城县）；康熙四十九年（1710）山西商人在昇明桥北堍建山西会馆；乾隆元年（1736）安徽宁国府旌德县商人先在西荡口建会馆，后“因地隘水冲，正欲卜地重建”，又于嘉庆十四年（1809）联合徽州府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等六县商人在璇葭浜（今朝阳路底）建徽宁会馆；乾隆三十二年（1767）宁波、绍兴商人在海角湾建宁绍会馆（又称静安公祠，在今目澜丝织厂内）；嘉庆（1796—1820）时山东济南府商人又在斜桥河边建济东会馆。

此外，还有一类手工业行会型的会馆，如乾隆年间（1736—1795）染红诸坊所建的华阳会馆（今华阳街西口）和练坊、轴坊所建的绍兴会馆（附设于西庙内，始建年份无考）。

近代以来，由于“上海开埠”，加上军阀混战，“重以兵燹，商旅不来”，因此会馆“日就倾圮”；虽然济东会馆在民国十三年（1924）得以重修，然而“鲁殿灵光余几何”？就整体而言，会馆已风光不再，保存的仅一济东会馆，徽宁会馆则移建至目澜洲公园内。直至改革开放后，会馆才再度兴起，现已有闽南会馆和温州会馆先后建成。

“承平”意为太平。

一百十三、绍兴人

美利天然岁比登，居民筋力百无能。
饶他越客反为主，赢得人称小绍兴。

几百年来，盛泽始终是以移民为主体的城镇，其中绍兴人最具特色。

绍兴移民之最早记载见于明弘治《吴江志》：“每岁秋获之后，水田中多遗穗及鱼虾之类，绍兴人辄来养鸭，以千百为群，吴人呼为鸭客。”

明代中叶，随着盛泽丝织业的兴起，许多本地农民“妻络夫织”，成为织绸专业户（俗称机户），无心于耕耘，于是绍兴移民为之代耕或租赁，继而买田，成为地主。清末，“绍兴移民林三九、高念三等置田产达千亩以上”；民国年间，镇郊杨扇、东港、盛虹一带的绍兴籍农民众多，“几于反客为主矣”。

本地人善于织绸，精于经商，大多“恃机织为生，怠于作苦”，故而练坊、染坊、轴坊（踹坊）等劳动强度大的丝绸后整理行业，都由绍兴人承担。绍兴籍人士“团体甚坚，动辄把持垄断”，过去练、染、轴三坊的行规，只绍兴籍子弟为徒，排斥本地人。《盛泽镇志》记载：“浙江绍兴的练染技术发展较早，明末清初，绍籍人陆续迁居盛泽，操持此业，世称绍帮，促进了手工染整业的发展。”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移居盛泽的绍兴人几乎占全镇人口四分之一，在一些近郊村落，绍兴方言盛行，可称一奇。

一百十四、县丞署

县丞建置溯乾隆，管领五圩署在东。
一自官裁廨废后，数椽遗屋改明农。

盛泽自明代中叶起，由于丝绸织造业的兴起而日渐繁荣。明嘉靖（1522—1566）时“锦绫为市”，清顺治四年（1647）建镇制，“镇区由东肠、西肠、充字、大适、大饱五圩组成”。至乾隆年间（1736—1795），“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盖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

由于经济地位的上升，吴江县丞署于乾隆五年（1740）移驻盛泽。清代的县丞为正八品官，是“县令之辅佐，地位仅次于县令”，县丞之下设书办1名。

县丞署移驻盛泽之初，“僦（租赁）民舍以居”，乾隆七年（1742）“奉文改吴公书院（吴中丞祠）为署，凡二十余间（支用藩库正项银四百二十有奇）”。

吴公书院在镇东大饱圩（今盛泽镇中心小学），是为纪念江苏巡抚吴存礼而设。康熙五十年（1711）以后，地方豪绅借普济堂名义，私自向绸商征税，绸商上告后，江苏巡抚吴存礼饬令禁止，商民感而集资建书院，供奉吴公长生禄位，以报答他的德政。

咸丰十年（1860）七月至同治二年（1863）春，太平军进驻盛泽，建立地方政权，设乡官，县丞署“毁于兵燹”。同治二年（1863）后，恢复县丞署，“县丞寄居先蚕祠别院”，光绪二十六年（1900）丝绸业商人筹资重建县丞署。

宣统二年（1910）盛泽实行自治，建市自治公所和董事会。县丞废除后，县丞署改为农会事务所。

一百十五、慈善业

社仓积粟备年饥，义冢披荆掩露骴。
同是一般慈善业，更推余惠及婴儿。

社仓，是古代为防荒年而在乡社设置的粮仓，荒年时，将仓粮借贷给缺粮之人。清代的社仓名为民办，有民选的社长，实际上政府的干预、监督较多。社仓积谷，以民间捐纳为主，朝廷议定奖励办法，或免差役，或奖匾额，或赐顶戴，也有官府拨给谷本。

盛泽的社仓在大饱圩山西会馆殿庭之东（今盛泽中心小学）。清乾隆六年（1741）“里绅王楠等捐谷五百石，汪涵光、殷宜鎒复捐建廒屋”为社仓，公举王楠为社长。后又于光绪四年(1878) 重建，“凡廒屋十间，筹房门楼上下六间”。

社仓之外，民间的慈善义举颇多，如建普同塔（骨塔）、义冢，设施棺局、育婴堂，施米、施药、施寒衣等。

义冢是旧时收埋无主尸骸的墓地，由慈善机构或行善之人出资置地，以薄木棺材收殓无主尸骸。

盛泽的义冢有多处。“管君宜等设普同塔，徽（安徽）人设义冢于洞真宫侧（今兴桥村），绍兴人设义冢海角湾种福庵前”，乾隆（1736—1795）时县丞熊晋“捐设义冢于饭字圩东南，近向家荡”。民国初年，“义冢一在小伏圩，商人义冢亦在焉；一在饭字圩；皆由种善堂管理，兼办育婴”。

种善堂在保盛桥北堍，种善堂弄南口；东侧为育婴堂。

“骴”是肉未烂尽的骸骨。

一百十六、吴绫

吴绫自古夙称良，荡北浜南最擅场。
云锦翻新名目夥，梯航远输达遐方。

吴绫为古代丝绸之名。明正德《姑苏志》载："绫，诸县皆有之，而吴江为盛，唐时充贡，谓之吴绫。"至清末，"郡属惟吴江有之"。

盛泽所产丝绸，品种繁多，"或花、或素、或长、或短、或重、或轻，各有定式，而价之低、昂随之"。丝绸之名，则"往往以其所产地为称，如溪绫、荡北、浜南之类"。

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占江南，江浙一带众多丝绸重镇毁于战火，绸商、机户纷纷迁居盛泽，盛泽丝绸业由此获得快速发展，至光绪（1875—1908）年间，产量已居国内首位。所产丝绸花样翻新，"奇巧日增，不可殚记。凡邑中所产，皆聚于盛泽镇，天下衣被多赖之。富商大贾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连袂，如一都会焉"。

盛泽所产丝绸，远销海内外。元代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游历到此，记述了将绸缎运至省中出卖的情况。康熙《吴江县志》称："绫罗纱绸出盛泽，奔走衣被遍天下。"清乾隆《盛湖志》记载："绸、绫、罗、纱、绢不一其名，京省外国悉来市易。"并认为盛泽的丝织业已可与苏、杭相媲美："四海九州之绸帛皆来取……苏杭皆设局（织造衙门），天下之衣被资之盛泽小镇，何亦与之并峙而称也。"

近代上海开埠后，盛泽丝绸"行销外洋"，声名远播，近三十年来更是销往世界各大洲，"梯航远输达遐（远）方"。

一百十七、丝织女

姊自治丝妹挽花，双双娇女鬟盘鸦。
他年嫁作商人妇，组织工夫早到家。

盛泽一带，居民多以丝绸为业，植桑、育蚕、缫丝、织绸，以机为田，以梭为耒，夫织妻络，父业子承，世代相传。清同治《盛湖志》记载："近镇四五十里间，居民尽逐绸绫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童稚挽花，女红……日夕治丝，故女儿自十岁以外皆早暮拮据（拮据的原意是指鸟衔草筑巢，肢体劳累），以糊其口。"

旧时盛泽的女子，大多从小就学会采桑、养蚕、缫丝、掉丝（络丝）、打结，助父母一臂之力。挽花是织造丝绸花纹的一种提花工艺，早期的提花织机上方有一花楼，挽花的人在花楼上按花纹样稿用手控制经线的起落。早年间，女童挽花极为普遍。

在盛泽，留下了许多描述丝织女治丝织绸的诗句。史在柱的《黄溪竹枝词》："阿蛮小小已多姿，十岁能牵机上丝。漫揭轻裙上楼去，试看侬撷好花枝。"把挽花女童上机劳作时的轻盈姿态和自信神态描绘得活灵活现；还有汤三俊的"灯火小窗人夜作，鬖鬖鬓影络丝娘"，王明福的"小姑工织缣，知住新杭处"，赵基的"含辛更有饲蚕娘，辘轳声转轮回肠。大妇燃釜中妇理，小妇倦深嗔不起"，等等，不一而足。

1929年西湖博览会的总报告书中评述："盛泽自丫角稚鬟，以至白头老妇，无不手纺织之具，日以治丝为事，故其鉴别原料、手术精熟之功无与伦比，而织成之绸更觉光致匀净，大有美人细意、熨帖轻暖适宜之慨。"

一百十八、绸贱伤民

贫妇生涯靡有他，低头夜织不停梭。
新丝价贵生绡贱，蹙损双蛾奈若何。

盛泽居民多以丝绸为业，故而丝绸业的兴衰，关系到镇民的生计。清乾隆《盛湖志》称："镇之丰歉，固视乎田之荒熟，尤视乎商客之盛衰。盖机户仰食于绸行，绸行仰食于商客，而开张店肆者，即胥仰食于此焉。倘或商客稀少，机户利薄，则怨咨者多矣。"乾隆《吴江县志》中也提到："丝之丰歉，绫绸价之低、昂，即小民有岁无岁之分也。"

明（洪）熙宣（德）（1425—1435）间，邑民"渐逐机丝线纬之利"，当时"绸绫价每两值银八九分，丝每两值银二三分，业此者渐致饶富，于是相沿成俗"，盛泽也随之进入繁荣时期。

民国五、六年（1916—1917）间，由于袁世凯称帝引发了护国战争，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并随即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因"时而革命，时而帝制，屡次发生战事"，来盛泽采购丝绸的客商骤减，丝绸业遭受严重打击。

因为"新丝价贵生绡贱"，而多数机户的生计又完全依赖织绸，因此绸贱伤民，"绸货因之停滞而机户苦矣"。

"生绡"是未漂煮过的丝织品，这里泛指丝绸。

"蹙损双蛾"意为眉头紧皱，形容忧伤之甚。

一百十九、领投

领户分居繁有徙，市湫屋矮路盘纡。
日收生绢千万匹，半入申江半入吴。

领投，又称领头，意为“领人投行”，是丝绸买卖间的中介人。领业是盛泽特有的历史现象，故有“第三百六十一行”之称。

早期的领投，纯属导卖，计利不论多寡；至清中叶，领业已发展成一个独立行业，与绸业、丝业并称盛泽经济的三大支柱，清末时，领业已达千人。其开业经营者称为领户，通常由数人合伙组成。领户大多集中在庄面，“列屋而居，鳞次栉比，密若蜂窠”。

盛泽的农村几乎家家织绸，按照当地的传统交易模式，机户们把织成的绸匹委托载船人上街交给领投，经过领投初验和分类集中后再转售给绸行。领投在收到货款后，扣除佣金，将货款和载船人的力资付清，并且出具信用担保，使机户能从丝行赊回原料用丝。如果绸行不全部付现，领投还常常先垫支一部分绸款。绸行和机户无直接关系，双方通过领投才完成丝绸交易的过程，因此领投是盛泽丝绸交易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领投多数经营绸缎，名为绸领投；少数经营绢类的称绢领投，经营生丝的称丝领投。

清末时，盛泽的领业成立了同业组织，名汇锦公所，“先租房于潇湘弄，民国六年（1917）在姚家坝购计家厅经修葺为正式公所”。

上世纪三十年代，由于日寇入侵，绸市萧条，领业每况愈下，民国三十五年（1946）领户仅存30户。至1955年，因绸业进入计划体制，领投功能消失而随之绝迹。

一百二十、香云纱

舶来纱品赛罗绫，男妇风行价日增。
争似阿侬机织好，香云衫子宝光腾。

纱是一种经纬稀薄的丝织物。清乾隆《苏州府志》记载："纱，出盛泽"，是盛泽的主打产品之一，清代至民国初盛销朝鲜（历史上曾称高丽），被称作高丽纱，用作礼服。

民国初，香云纱脱颖而出，成为盛泽"纱类织物中之大宗品种"。

香云纱俗称莨纱，是全真丝提花绞纱织物。织成的白坯纱绸经练熟后，水洗，晒干，然后用薯莨（一种广东特有的植物）的汁水（含有丰富的胶质）反复浸、晒数十次，再用珠三角地区特有的富含多种矿物质的河泥覆盖于绸面。香云纱经此处理后，成为别具一格的丝质拷胶衣料，绸面呈黑色，背面呈棕红色，富有光泽，织物防水性强，且容易散发水分，适宜制作夏季衣衫，具有穿着滑爽、凉快、除菌、驱虫、对皮肤有保健作用等特点。香云纱的后整理加工主要在广东南海、顺德、番禺一带。

香云纱制成的衣衫俗称拷皮衫，价格昂贵，过去被称为软黄金，只有大户人家才能享用。由于穿着走路会"沙沙"作响，因此最初称"响云纱"，后来才叫香云纱。香云纱染整工艺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清末，国外进口的丝光洋纱颇受爱时髦的摩登人士所青睐，价格日增，而本地生产的香云纱主要行销广东，并出口南洋。

"舶来"意为进口。

一百二十一、弄堂

闾巷短长七十三，市东郑里又新参。
门千户万疑无路，机杼声声入耳酣。

盛泽的弄堂极多，过去有“七十二条半”弄堂的说法。在清同治《盛湖志》上，记录了65条弄、7条里的名字，“闾巷短长七十三”，指的就是“七十二条半”弄堂。随着镇区的扩大和街貌的变迁，盛泽的弄堂日益增多，时至今日，已远不止此数。

“市东郑里又新参”指的是“七十二条半”之外的新开弄。

民国四年（1915）农历二月二十二日，盛泽因马灯会而发生大火灾，灾后，家住长庆坊（今舜湖中路东段）的郑慈谷主动让出自家宅基，辟为茂林里（郑氏开设郑茂林绸行），镇民俗称新开弄。

盛泽的弄名极为有趣。有的以行业为名，如盐店弄、爆竹弄、竹行弄、茶馆弄、当房弄等；盛泽以丝绸兴镇，因此与丝绸有关的弄名尤其多，如运经弄、染坊弄、踩坊弄、筘店弄、梭子弄、庄面一弄、庄面二弄等；有的以姓氏为名，如卜家弄为先贤卜舜年故居所在，仲家弄住着盛泽“老八姓”之一的仲氏家族；有的与风景名胜有关，如潇湘弄就因明末仲氏秀园中的小潇湘阁而得名；还有一些堪称姐妹的弄，如东、西杨家弄，南、北分金弄，仲家弄，观音弄，大、小殷家弄等。

民国初，许多小绸厂开设在街头巷尾，处处可闻“机杼声声”。

一百二十二、电灯公司

欧式楼台傍水滨，岿然俯视九衢尘。
夕阳西下光明放，篝火休劳燃蜡频。

盛泽的首家电厂创建于民国四年（1915），至农历年底（1916年2月初）发电，厂址在西荡口（今为仲英广场）。因为当时仅供电灯照明，所以镇民称之电灯公司。

电灯公司的建筑式样为欧式红砖楼房，楼的南侧跨街而立，东西两头有砖砌拱券，颇为洋气。当时为镇中最高建筑物，“岿然俯视九衢尘”，站在屋顶平台，可览全镇。

电灯公司建成后，镇民雀跃欢呼，镇上士绅富商、殷实人家纷纷安装电灯，全镇共装电灯800余盏。开业之初，每晚5时至12时发电，届时，电灯大放光明，“篝火休劳燃蜡频”，为许多人带来了方便，并逐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因经营不善，电灯公司于民国七年（1918）春停办，后由郑慈谷、沈之万、仲少梅等人在登春桥南堍集资继办，建复新电灯公司。后来工厂迁至保盛桥南堍，易名复新电厂，增添了设备，改装交流电，并从民国十九年（1930）起向丝绸工厂供电，开始了电力织造丝绸的历史。民国二十三年（1934）工厂卖给苏州电气公司，易名为苏州电气厂盛泽分厂事务所。

随着电灯的普及，尤其是电力织造的推广，丝绸生产迅速发展，推动了盛泽经济的繁荣。

一百二十三、疏浚市河

殷法弃灰漫道严，河干堆垛实堪嫌。
自从疏浚施人力，几曲川流镜启奁。

清宣统二年（1910）盛泽“实行自治，建市自治公所和董事会”，至“民国五年（1916）袁世凯称帝，取消自治，市自治公所改为市办事处，由县知事委任助理员主持市政；民国十二年（1923）市董事会和市公所相继恢复；民国十六年（1927）改市公所为市行政局”。

清末民初时期，政局纷乱，盛泽地方政权相对弱势，市政管理缺乏有效措施，许多市政公益事务皆由商会出面组织与实施。光绪三十二年（1906）郑慈谷、张庆镛等发起成立盛泽商会，在“统管邑中商务”的同时，热心参与镇中公益事业。

其时，“市河年久淤塞，旱则病秽，潦则苦溢”，两岸居民苦不堪言。民国二年（1913）“由郑慈谷发起，联合商界汪鞠如、陈辰生等筹款，大加疏浚，费银万余元”。市河经疏浚后“几曲川流镜启奁”，镇民“饮和食德”，无不盛赞商界之德政。

然而当时镇民的卫生意识极其薄弱，向市河中“倾弃垃圾之风仍莫革也”，市容依然不容乐观。

“殷法弃灰”语出《韩非子·内储说上》，指殷商时代对乱扔垃圾者定刑。

“镜启奁”，形容疏浚后的市河水清如镜。

一百二十四、渔业争端

妾家居傍水云隈，不见鱼虾上市来。
道是外湖新筑斮，旧时渔艇尽驱回。

这是发生在百年前的一起渔业争端诉讼案。

盛泽素称水乡，城乡湖荡密布，河港纵横，鱼、虾、蟹、蚌等各类水产资源丰富，镇民的菜肴也大多以湖鲜为主。

民国之初，某绍兴籍人士设立渔业公司，承租了镇郊的湖荡，经营鱼类养殖。“旋将四周十余荡悉行插斮，把持不准渔船阑入，购鱼苗蓄其中”，待鱼养大后，用船运至上海销售，“一时市上鱼虾为之断绝”。

此事关系到镇民的菜篮子，因此一时舆情哗然，于是推举镇中士绅出面向当局提起诉讼；但是，该渔业公司早就此事“禀部立案”，因此一时难以决断，经数年交涉后才得以解决，将各荡鱼斮尽行拔去。

“斮”，指插在河港湖荡水中的竹栅栏，用来阻挡鱼、虾、螃蟹，以便捕捉。

一百二十五、长庆坊火灾

何人不道看灯来，讵料春灯是祸胎。
挈妹携儿欢喜出，无端痛哭舆尸回。

百年前，盛泽最繁华的商业区是长庆坊，即今舜湖中路东段，当时中间有市河，河之南、北两侧，东至东庙桥，西至龄嘉桥为南、北长庆坊。

民国四年（1915）4月6日（农历二月二十二日）夜，是旧俗出马灯会的日子。天刚擦黑，四乡村民就进镇观灯，把长庆坊挤得水泄不通，“妇孺列坐店铺几满，乡民犹续续来”。谁知乐极生悲，大祸骤降。北长庆坊街边的协康祥布店突然起火，“火烈街狭，市河犹窄”，顷刻间大火越过市河，延烧南、北两条大街，“赤燄四射不可乡迩（接近），沿烧至龄嘉桥以西始熄，繁盛市廛瞬成煨烬，丧失资财亿万计”。

观灯的男女在狭窄的街巷中左冲右突，乱作一团，“莠民乘机劫夺，衢路挤塞，藉踏焚压死者约八十余人，妇稚尤居多数，受伤者不可胜计。诚未有之浩劫也”。

郑慈谷先生（1867—1919）字二贻，号式如，是郑恭燮之子，清末民初盛泽著名士绅，世居长庆坊。火灾中，郑先生毅然开门接纳逃人，让许多人从他家后门逃出，得以脱险。灾后，先生又主动让出自家宅基，辟为茂林里（俗称新开弄）。

长庆坊大火是盛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大火灾。灾后，当局严令禁止马灯会，并勒石嵌于东庙围墙中。

一百二十六、灾后重建

市廛湫隘火为媒，曲突徙薪亦善哉。
灾后柏梁更压胜，飞甍高栋出尘埃。

民国四年（1915）4月6日（农历二月二十二日）夜，因马灯会酿成长庆坊火灾，损失惨重。

痛定思痛，地方士绅“为防患未然”，议决设立市政公所，凡长庆坊地段市河两侧“下岸（俗称下滩）地基悉由公所盖造出租，而归其地租于业主；拆去沿河挑径，放宽街面，屋不盖楼，以洋铅代瓦；上岸（俗称上滩）各巨肆亦筑坚墙、石库门，多辟后户（即后门）。郑君（郑慈谷）更舍地开一新弄（茂林里，俗称新开弄），通敦仁里”。

这些灾后重建的具体措施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不失为曲突徙薪之举，也颇受镇民的拥护与好评。重建后，长庆坊“较前益形华整也”。

“市廛湫隘”，指街道狭窄，店铺低矮。湫，意为低洼；隘，意为狭窄。

“曲突徙薪”，成语，意为烟囱必须弯曲，柴草必须搬开，比喻事先采取措施，防止危险发生。“突”是烟囱，“徙”意为搬开，“薪”是柴草。

“柏梁”指汉代未央宫柏梁台，毁于火灾。

“压胜”指用符咒等法除邪祈吉。

“飞甍”指飞檐，亦借指高楼。

一百二十七、沉船旧闻

水从天目势猖披，舟入寨湖易履危。
寄语榜人须仔细，收帆要趁顺风时。

寨湖，即西白漾，面积为460余公顷（1公顷为15亩），烟波浩渺，风大浪高。

西白漾之水源于浙江北界东天目山，“由烂溪东流入湖，湖之西南实当来水之冲。湖以南为往来舟行要路，每风狂雨骤，波浪奔腾，势甚恶，舟远不得泊，遭其厄者屡矣”。

民国初的一个冬天，某村一民船载男女老幼共27人张帆而行，途经西白漾时不幸“触冰沉没”，船中乘客“仅三人踏冰至分水墩，得庆更生”，其余24人全部溺水而亡。沉船之情状惨不忍睹。

1969年3月，在“以粮为纲”的号召下，当时的盛泽镇与盛泽人民公社（盛泽乡）、坛丘人民公社（坛丘乡）三家联合组织职工、干部、农民实施“围垦西白漾”工程，至1970年春完成，共用工428005工，围垦湖面315.3公顷，得地275.3公顷。围垦后的土地，由三家使用。1988年盛泽镇与盛泽乡合并为盛泽镇，2000年坛丘并入盛泽镇，自此后，围垦地全部归属盛泽镇。

1986年10月11日，东方丝绸市场在西白漾围垦地上成立，昔日荒芜的土地成为繁华的商区。

“榜人”即船夫。

一百二十八、东西两书院

松陵笠泽各东西，多少儿童上学齐。
教育已更新气象，莫将书院旧名提。

清代，盛泽有东、西两所书院。松陵学舍，俗称盛湖西书院；笠泽书院，即肄业公所，俗称盛湖东书院。

松陵学舍在北观音弄（今为盛泽实验小学），清乾隆八年（1743）“里人姚仲英、殷宜鐄等39人及济宁、济南、平阳等许多商人共筹集白银上千两建，于乾隆九年（1744）落成，是年7月（苏州）知府雅尔哈善为之作记”。

肄业公所（后为太平街小学，今已废），“在大适圩太平街（今舜湖东路），创办于同治八年（1869）冬。知府李铭皖、知县黎庶昌先后给示勒碑”。

戊戌维新后，学校教育兴起。光绪二十七年（1901）里人郑慈谷在自家大厅世泽堂（今新开弄）创办盛泽第一所学校——郑氏小学，沈秋凡先生曾任该校教师。

光绪二十九年（1903）郑慈谷、张嘉桐、洪鹗三人创办盛湖公学，校址在盛湖东书院。民国二年（1913）改名为吴江县第三高等小学（简称“三高”），民国六年（1917）与盛湖女校交换校址，迁至思古浜思古庵（今新民丝织厂），抗战胜利（1945）后改名思古浜小学。

光绪三十三年（1907），里人简书勋创办明德小学，以盛湖西书院为校舍，后改名观音弄小学，现为盛泽实验小学。

郑氏小学与盛湖公学的创办，标志着盛泽教育迈进了新的历史时期。

一百二十九、洋学堂

生男但祝善经商，识字无多亦不妨。
愧煞十年兴教育，学堂犹复冠称洋。

盛泽人善经商，早年间之民风亦以商为尊。明末周灿有诗云："尚利民风薄，多金商贾尊"，虽似有贬意，却切中要害。

商家男孩大多略通文墨，至近代，往往读了几年私塾或初等小学（四年），就被家长送出去学生意（当学徒），满师后即经商。

民国初，学校教育刚刚兴起，人们称新式学校为洋学堂。有些商人对新式教育尚未接受，宁可送子弟入旧式私塾。"据民国十四年（1925）五月盛泽区教育会调查，仅镇南就有私塾十余所，学生少则六七人，多则四五十人不等，教材有共和新国文、四书、幼尺牍、三字经、千字文等，亦有间用国语者"。随着学校教育的逐渐普及，至新中国成立之初，私塾绝迹。

民国之初，盛泽的小学有十余所，如吴江县第三高等小学、盛湖女校（太平桥小学）、明德小学（观音弄小学）、私立盛泽绸业小学（绸业公所内，绸业界人士于1912年集资兴办）、淘沙弄小学（1915年由南区小学与敬业小学合并而成）、北区小学(1912年创办，即仲家弄小学)、里安桥培蒙小学（1911年创办）、北王村新民小学（1910年创办）、早字圩励志小学（1911年创办）、溪南村小学（1913年创办）等，多数为私立。

一百三十、瞎子算命

报君知道手三弦，摸索丁东过宅边。
唤进门来无一事，弹弹晦气问流年。

旧时，算命的盲人或弹着三弦，或敲打着竹片、铁片、小锣，让人闻知，以招徕生意。此类发出响声的物件名为“报君知”。

从前，给人算命的以男性瞎子居多。瞎子没法参加劳动，眼前又少了形形色色事物的干扰，因而较为心静，更能记忆与思考，有的就以算命为业维持生计。

瞎子算命，往往是让问命之人报出出生的年、月、日、时，然后根据生辰算出干支八字，再依据生辰干支中的五行相生相克的情况，得出一生大运、小运、流年吉凶、利弊顺逆和贫富、贵贱、寿夭、疾病、灾难、关节等推算，还会指导逢凶化吉的办法。算命的瞎子大多懂得一点心理学，说话往往留有余地，随机应变，以讨取问命人的欢心与信任。

俗话说“穷算命，富烧香”。从前的人不懂科学，都很迷信。穷人把生计艰难归结于命苦，为了早日摆脱苦命，便求助于算命的瞎子；富人把前途归结于菩萨保佑，为了常交好运，便求助于菩萨。

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与认识的提高，人们懂得了以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去追求幸福，但算命之人仍未绝迹。

一百三十一、“念佛偈”

俚词入耳便分明，音节中含佛号声。
环听豆棚瓜架下，王祥唱罢又方卿。

“念佛偈”，民间又称“念佛句”、“念佛齣”，系民间佛曲，它与宣卷一样，脱胎于早期的宣讲佛法，属吴歌的一个支脉。这种流传于东太湖一带的民间说唱形式，主要演唱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

清末时，每至养蚕时节，为人织绸的雇工暂时歇业，为了生计，便两人搭档，手持小木鱼，到各村坊演唱“念佛偈”，一边宣唱佛号，一边演唱《王祥卧冰》、《珍珠塔》之类故事。早年间，农村的文化生活极其枯燥，因此，像“念佛偈”这样简单的演唱形式，也会受到农村妇女的欢迎。

经过长期的发展，“念佛偈”原有的宗教色彩逐渐淡薄，演唱者引入民间故事、戏曲的内容和山歌之类的民间小调，使情节更为丰富、曲折，曲调更加优美、动听。

近几十年中，由于文艺样式更具多样性，以及群众艺术欣赏习惯的改变，“念佛偈”逐渐衰落。为了保护“念佛偈”这种演唱形式，有关部门已将它列入吴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方卿”是《珍珠塔》故事中的男主角。

一百三十二、时医“飞邀”

时医声价剧堪憎，同闬往来舆亦乘。
日落崦嵫迟未到，飞邀还索重金增。

清末民初，西医尚未普及，镇民得病，都请悬壶行医的中医治疗。

当时，稍有名气的医生已身价颇高，“稍时髦者，出门必乘轿，至必傍晚；若遇急症求早至，须另加重金，名曰‘飞邀’”。

早年间，中医师大多各自在家设诊所，或在中药店“坐堂”。约在民国十三年（1924）之前创设的民益中医院，是盛泽最早的中医院。当时，盛泽的中医界实力较强，于民国十一年（1922）发起成立了吴江县的第一个医界同人组织——盛泽医学研究会，后又成立盛泽区中医协会，并创办了《盛泽医药报》；民国二十三年（1934）由盛泽区中医协会会员倡议成立吴江县中医公会。

西医流入盛泽大约在民国初，民国十年（1921）由凌作民创设的盛泽医院是盛泽第一家医院。

“闬”，意为里巷之门，“同闬”指相近之处。

“崦嵫”，山名，即甘肃天水的齐寿山，古时常用来指日没的地方。

一百三十三、“扑克”西来

时闻僻巷打牌声，扑克西来又盛行。
刘毅绕床豪气尽，阿谁戏语问输赢。

古时候，打牌是一种娱乐方式，《红楼梦》中就有关于贾母、薛姨妈、王熙凤等人打牌的描述，但是，打牌也常常被人利用来进行赌博，如麻将与牌九。

牌九的历史十分悠久，据说北宋宣和二年（1120）民间就出现一种名为“骨牌”的游戏，宋高宗（1127—1162）时传入宫中后迅速在全国流行，民间称为“牌九”。

关于麻将的由来，说法很多。有说源于江苏太仓的“护粮牌”，有说源于“叶子格戏”、“马吊牌”、“水浒传牌”，也有说源于郑和下西洋，还有说源于最古老的娱乐游戏——产生于殷纣王之前的博戏。

鸦片战争（1840）后，随着西方势力的入侵，扑克传入我国，成为时髦的娱乐游戏，并成为输赢更大的赌博工具；清末民初传入盛泽后，“时闻僻巷打牌声，扑克西来又盛行”，直至今天，依然是人们的主要游戏之一。但也有人认为扑克最早出现于中国，是元代马可·波罗带至欧洲，又经改造后再传入中国。

“刘毅绕床豪气尽”，语出唐代孙元晏的诗《晋·刘毅》：“绕床堪壮喝卢声”。清李修行的小说《如此京华》中有“刘毅绕床豪气尽，分司人座美人回，行乐洵多才。”之句。

一百三十四、天然美

香闺无复束双缠，纤步休夸贴地莲。
淡扫娥眉屏脂粉，一般颜色自天然。

缠足即裹脚，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一种陋习。在缠足的时代，女孩子从四五岁起便开始裹脚，用一条狭长的布将脚紧紧缠住，使脚畸形变小，直至骨骼定型。旧时将女子的小脚形容为“三寸金莲”，并以此为美，认为女子的小脚踩出的脚印像一朵莲花。

关于缠足的由来，众说纷纭。有说源于隋炀帝时的民女吴月娘，有说源于南唐李后主令宫嫔窅娘（一说睿娘）“以帛缠足，令纤小作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缠足之风历经千年，令妇女承受极大的伤残与痛苦。

清末，政治腐败，体制僵化，朝廷丧权辱国，由此唤醒了国民的现代文明意识，社会精英们纷纷呼吁“放足”，朝廷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颁发诏书劝戒缠足；辛亥革命（1911）后，民国政府也把废除缠足列为“扫除积弊”的重要工作。经过种种意识形态的强化，人们对缠足的态度逐渐改变，于是“天足”盛行，缠足陋习终于走向消亡。

在废除缠足的同时，妇女浓妆的习俗也逐渐淡化，“淡扫娥眉屏脂粉，一般颜色自天然”，以天然为美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

“束双缠”即指女子的缠足。

一百三十五、时髦女郎

短袖窄衣别样娇，巧梳新髻压双翘。
渠侬自有如花貌，不向春风斗舞腰。

封建时代，女子的服饰有严格的规定。据《大清会典》和《大清通礼》记载，妇女的日常衣饰受法律的限制，尤其是奴仆、优伶、皂隶等不得使用丝绢绫罗等高档衣料；凡后妃命妇，服用凤冠霞帔，平民妇女仅婚嫁和入殓时可“借穿”此类服饰，平时以披风、袄裙为礼服；满族妇女的主要装束为旗袍，窄而瘦长，外面加坎肩。

汉族妇女的发式，在清中期模仿满族宫女，以高髻为时尚，以后又流行过平髻、圆髻、如意髻等样式；至清末，曾时尚梳辫。

乾隆（1736—1795）以后，由于通商口岸开始有商品的交流，新衣料、新花样逐渐出现，两广和苏杭一带成为“时式新装”的发源地。

至清末，由于制度的约束逐步宽松，加之上海租界内西方服饰的影响，盛泽一些时髦女郎的服饰与发式日渐花样翻新，“衣饰竞尚短窄，玉臂双露，酥胸紧束；最流行之新髻有燕尾蚨蝶、三星双龙、螺旋高丽、倒垂鸳鸯等”。女子走路也不再如风摆杨柳，“健步如男子，不尚婀娜之致”。

“渠侬”，方言，意为她。

一百三十六、时尚饰物

花插襟边珠缀怀，指环臂钏制尤佳。
如云鬓发偏宜素，贱却金梁耀月钗。

古代女子都留长发，并特别注重头发的样式和发髻上插戴的首饰，尤其是宫中的后妃，把对镜梳妆看作是每天最重要的功课，往往会花费很长时间来梳理长发和插戴金银珠宝镶制的首饰。《清宫词》称："服饰宫妆总别裁，明珠约指制尤佳。舶来钻石连城璧，贱却金梁耀月钗。"

宫中的风尚也影响到民间，富贵人家的内眷常常是发髻光亮、满头珠翠，即使是普通民女，也喜欢在发髻上插朵花，以此为美。旧时，有一种专门给人梳头的女子，每天清晨上门为富家奶奶梳妆，称为"梳头娘"。

至清末民初，风尚渐变，发髻"尚雅素，花朵珠球皆缀衣襟，金戒、金钏尤盛行，无复满头珠翠矣"。

"金戒"即金戒指，"金钏"即金手镯。另有一种套在上臂的环形饰物，名"臂钏"，初唐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中就有戴臂钏的女子形象。

"鬓发"意为稠美的黑发。

一百三十七、“文明”婚礼

结婚雅尚半文明，新乐声搀旧乐声。
不御红巾羞莫掩，金边蓝镜护双睛。

清代，盛泽的婚俗礼仪最为繁杂。据同治《盛湖志》记载，有“文定、允谢、行盘、回盘、催妆、运妆、待嫁、发迎”八个环节。

迎娶之日，新郎穿明朝状元服，蟒袍玉带，帽插花翅；新娘为命妇服饰，凤冠霞帔。新娘的花轿“至门饰，童女燃灯向舆，谓之迎龙；妇出舆，先行遥空参拜祖祠;后，婿与妇牵彩交拜，谓之结亲；继设馔于堂前，列绛炬，婿与妇并南向坐，谓之结花烛；既毕，归房行合卺礼，两童子执烛前导，谓之迎花烛；此时又有坐床、撒帐、换宝、结缘等文。是夜，婿与妇拜见舅姑，舅姑坐受，谓之受拜堂，并见旁尊戚属，谓之见礼；舅姑以妇谒于祖祠，谓之上花幡。至是而婚礼成矣”。

至清末，上海租界之“文明”婚礼习俗传入。光绪三十二年(1906) 10月19日，柳亚子与郑佩宜在盛泽郑氏老宅举行“文明”婚礼，新娘不盖方巾，不戴首饰，婚礼上废跪拜而代之以鞠躬。这在传统风俗盛行的盛泽，无疑是一件开风气之先的破天荒之举，镇民争相观看，一时传为美谈。

人民国后，“旧婚礼既废，民间无所适从，于是迎娶有用军乐队杂以鼓吹，一部仍鸣锣喝道者。男子幅巾便衣，间或着礼服，女子红衫绯裙，梳东洋髻，或装小头面，戴蓝色眼镜。结婚仪式极简略，草草数分钟，事毕矣”。

一百三十八、闹新房

争说三朝礼数疏，闹房积习未能除。
翻衾搜枕真亡赖，引得新人踧踖如。

闹新房的习俗各处皆有，各处皆不同。

盛泽有句俗谚“三朝无老少，太公可以在床上豁虎跳”，尤其是新婚之夕，“无论行辈之长幼与亲朋之远近”皆可不拘礼节，入洞房“闹房”，“牵帷披帐，翻衾搜枕，一唱百和，欢声雷动”。

闹新房的初衷是为了增添新婚的欢乐与热闹气氛，然而闹新房的方式也有文野之分。

旧时之书香门第、诗礼人家，闹房时文雅含蓄，以吟诗作对、猜谜行令考问新婚夫妇的才情。闹房前，新房门紧闭，闹房者要高唱闹房诗，直到守门人满意才开门。入房后，还要取预先摆设在床上的物件，结合物件内容唱赞诗，逐件取完后才能看新人，并要求新郎新娘表演戏谑性的节目，以博取皆大欢喜。

普通人家及市井商人之类，闹房则以俗为主，有的无非要敲出新娘的私房钱请客，或多要喜果喜糖，甚至自己动手掀马桶盖，拆棉被，翻箱倒柜搜寻，有的甚至会说粗话，搞恶作剧，强令新人表演粗俗节目。遇到此类闹法，主人也得耐着性子笑脸敷衍，靠喜娘随机应变，周旋调停，有的甚至因此而生嫌隙。

“亡赖”，意为顽皮狡猾；“踧踖”，指恭敬而不安的样子。

一百三十九、毛脚女婿

素帷啜泣女娇娃，耳畔私闻卫玠夸。
小妹偷窥毛脚婿，嗔伊调侃脸生霞。

按盛泽之旧俗，男女缔结婚约后，如女方父母逝世，未婚夫须吉服登门，然后更换素服吊奠岳父母，俗称“毛脚女婿”。

百年之前的民国初年，男女交往受到传统礼仪的诸多限制，即使缔结了婚约之后，男女双方仍不能公开见面。“毛脚女婿”上门吊唁，未婚妻只能在素帷后啜泣，而姐妹们也只能偷窥一眼。

时至今日，在江苏、浙江、上海一带，人们把初次上门的准女婿称之“毛脚女婿”。虽然未婚夫妇之间的交往已无限制，但“毛脚女婿”依然恪守着一些约定俗成的定规：逢年过节，“毛脚女婿”要携带礼品拜望未来的岳父母；女家有事，“毛脚女婿”们理所当然要去帮忙；在女家，“毛脚女婿”不敢毛手毛脚，往往循规蹈矩，唯恐得罪了未来的岳父母。

“卫玠”，是晋朝著名的玄学家，清谈名士，也是个有名的美男子。据《晋书》记载，卫玠上街，“观之者倾都”，民间有“看杀卫玠”之语。卫玠在这里代指“毛脚女婿”。

一百四十、敲猪头

吴俗由来囿一隅，命求星算病求巫。
猪头敲到几何桌，大嚼还添酒数壶。

清末时期，盛泽农村地区的许多乡民崇尚迷信活动，烧香请神，算命测字，求助菩萨、神道的保佑来改善自己的命运，依赖巫师、道士的作法驱邪来消除病痛。

乡民一旦得病，或请算命先生星算问病，或请巫师、道士鸣锣奏曲，作法请神，并以猪头为祭神的供品，“有多至十余桌者”，俗称“敲猪头”，亦称“献菩萨”。祭祀完毕，亲朋、乡邻聚而宴饮，须臾而尽。此俗堪称陋习。

旧时还有一种名为“提香炉”的恶俗。少数愚昧的乡民，或家有亲人重病，或自己体弱多病，于是求助菩萨或诸神保佑，并许愿以“提香炉”的形式还愿，以表示诚意。一旦亲人病情康复，或自己身体转而强健，许愿之人便借出庙会之际，用百脚黄铜丝排钩穿过小臂的表皮，下面悬挂铜锡香炉，一路行走，以示还愿。俗称“提香炉”。为了防止皮肤破裂，一旁有人给他小臂上喷水，还愿之人脸上还要显示轻松的笑容，以表示心诚。今日听来，实在让人心寒。

“囿一隅”，意为局限于偏僻一角。

一百四十一、十庙烧香

女流百事与神谋，十庙香烧心愿酬。
绀宇琳宫随处是，一般消受美人头。

在古代，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知识贫乏，人们将许多不能解释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归之于鬼神的作用，认为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峦湖海都各有其神，并臆造了各路神灵，广建庙宇，虔诚祭祀，以祈福纳吉，消灾弥祸。

旧时，盛泽城乡庙宇极多，既有佛教的寺院、道教的宫观，也有诸多神庙与祠堂。佛教寺院有始建于宋代的圆明寺、奇云庵、善庆庵、古龙庵、北胜庵、中明庵，始建于元代的圆照庵、庆寿庵、惠明庵，明代以后寺院遍布镇乡。道教宫观有建于宋代的洞真宫（在今兴桥村）；城隍庙有东、西两座，一在东白漾北岸，一在圆明寺桥东之杨家浜底；华阳真逸祠在华阳街，祀梁代陶宏景；其它如小宸洲、明真道院、全真道院、三元堂、碧霞行宫等均与道教有关。其它的神庙、祠堂有路头堂，在北浜，祀行神；火神堂在东白漾北岸，祀祝融；文起阁在昇明桥东，祀文昌之神，俗称八角亭；大王庙祀宋处士谢绪，刘猛将军庙祀元指挥刘承忠，两庙都在目澜洲之西北；此外尚有二老太庙、关帝庙、东岳庙、圣堂等。据《盛泽镇志》记载，至1945年全镇尚有祠、庙、庵、堂、寺、观137处。如今，几乎都已消失。

旧时之凡夫俗子，尤其是农村妇女，无论婚姻还是疾病，都祈祷于神佛，每逢初一、十五，热衷于十庙烧香。

“绀宇”，是佛寺之别称；“琳宫”，为道观之美称。

一百四十二、慈渡庵

婵娟结社礼观音，慈渡大悲愿力深。
毕竟鸳鸯宜集福，揭来何处结同心。

慈渡庵，亦称慈度庵，为尼姑庵，在昇明桥之南饭字圩，清康熙（1662—1722）时尼师（比丘尼，俗称尼姑）尚义所建。

尚义俗姓李，本是新塍一位渔夫的女儿。“女性慈仁，童稚即喜放生”，常常趁父母不注意时，将其父所捕之鱼投水放生，虽“遭捶挞无数，终不止”。“既长，为择配，终不肯就婚”，后离家出走，“遁去投旁近尼庵削发，挽之不回”。此后，尚义“锐意修持，勤身作务，行难行之行，忍难忍之苦”，在饭字圩“得地数弓，结茅数把”，建慈渡庵，“持诵焚修，无间寒暑”。

清初学者、邑人潘耒因尚义“师志行有可嘉者”，乃破例为之作《慈渡庵记》。

旧时，盛泽一地尼庵颇多，但是地方志中“例不载女庵”，故而对尼庵的情况，后人知之不多。大悲庵在西白漾畔关帝庙北侧，姚家坝之南。慈渡、大悲、集福、同心都是清末民初时期盛泽的尼庵名，今俱已废。

民国后，民风渐变，一些年少尼姑“多私遁还俗”，故而沈秋凡先生在诗中戏言“毕竟鸳鸯宜集福，揭来何处结同心。”

“揭”，是离去的意思。

一百四十三、观音堂

乞灵土木亦何因，偏有无穷求福人。
菩萨也遭堕溷劫，谁从苦海渡迷津。

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的简称，在梵文佛经中称为“阿缚卢枳帝湿伐逻”，中文佛经译为“观世音”或“观自在”，唐朝时，因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称“观音”。

在佛教中，观世音是慈悲与智慧的象征，是大乘佛教慈悲救世精神的最深刻诠释，具有无量的智慧和神通，大慈大悲，普救人间疾苦，因此是中国老百姓最崇奉的菩萨，拥有的信徒最多，影响最大。

盛泽的佛教寺院中，观音堂最多。清代，花园街南侧的潇湘弄口有观音堂，此外，大适圩的万福庵，俗称灵观音堂，带福桥侧的普济庵，俗称东观音堂，其它各佛寺中也大多有观音殿(堂)。

据说潇湘弄口的观音堂“向称灵验，香火颇盛”。某年，“市街失火，观音坠入圊（茅厕）中，后经修复，遂不复灵”。火灾中，连观音也难以自保，又“谁从苦海渡迷津”？

“溷”，指茅厕。

一百四十四、永庆庵

永庆庵亦号茶亭，艳说金身大士灵。
泥得夫君同下拜，明年好祝抱宁馨。

永庆庵在姚家坝底（今太古广场南侧），建置无考，今已废。相传庵内“观音大士甚著灵验，焚香顶礼者络绎不绝”。

永庆庵俗称“茶亭”。“因中元节赛会，舁诸神献茶于此，故亦称茶亭”。

中元节在农历七月十五，是旧时祭祀祖先的三大鬼节之一。中元节赛会是盛泽特有的民间习俗，自明崇祯年间（1628—1644）起始兴此俗。

中元节赛会由盛泽的绸行、领投、染练坊等行业募资，是绸商们争奇斗富的场所。自农历七月十三至十六，由长幡宝盖的仪仗队，唢呐齐鸣笙箫并奏的民乐队，东庙、西庙请出的观音、韦陀塑像，荡湖船、灯船、采莲船、龙船、荡秋千及掮阁、抬阁等组成的队伍沿全镇主要街道游行，万人空巷争相观赏。掮阁与抬阁是赛会上的最大亮点，由活泼俊俏的男女孩童身穿各色绸缎戏装，手戴手镯、戒指，头插金珠首饰，在阁上扮演戏文。

游行队伍行至姚家坝时，要暂停歇息，永庆庵僧众与信徒向队伍中的菩萨塑像献茶。茶亭之名由此而来，庵旁之弄亦名茶亭弄。

“宁馨”，意为美好的孩子。

一百四十五、五楼十阁

五楼十阁步非遥，杯茗同倾兴自饶。
晨夕过从无个事，赌经恶谑座中嚣。

旧时，盛泽茶馆密集，民国初年有“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之说。

盛泽的茶馆业历史悠久，登仁楼茶园开设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松园、步瀛轩、万泉楼开设于道光年间（1821—1850)，第一园、荷园、登椿园、龙凤园、第一春开设于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开设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得意楼与同羽春设施考究、规模宏大，远近闻名。

镇民嗜茶成习，“晨夕麇集茶馆”，并各有一定之所，俗称“孵”茶馆。

茶馆是个小社会，三教九流、士农工商无不在此聚集。旧时，丝行、绸行、领投三业每天庄面“落庄”后，都会聚集茶馆交流商情，洽谈生意；读书人在这里会客交友、海侃神聊；近郊机户、农民上街，也以茶馆为落脚之处，“聆市面”，聊家常；江湖郎中和算命先生在这里等生意，闹纠纷的在这里摆开阵势“吃讲茶”；此外，有的茶馆还聚赌抽头，以招徕顾客。

茶馆往往还附设“老虎灶”和“清水盆汤”，一些稍有规模的茶馆还在下午、晚上兼营书场。

近年中，老式茶馆逐渐消失，让位于环境优雅、消费昂贵的新式茶楼。

一百四十六、莲花池与莲子兜

妾住莲花池上头，往来南北莲子兜。
莲子有心秋正苦，莲花颜色好难留。

莲花池是盛泽的胜迹，莲子兜则是近郊的小地名。

莲花池有两处，分别在目澜洲和折芦庵。

目澜洲原为骨池庵，后改名圆照庵，因庵之“四面皆水，波澜在目，故又名目澜洲”。据清乾隆《盛湖志》记载：“骨池庵在盛泽荡中，附西肠圩，元至元十四年（1277）僧善莹建。庵南首莲花池，乡人无葬地，皆水葬其中，故名。”

折芦庵在老字圩下姚村（下姚即下窑，今前跃村），今废。清乾隆《盛湖志》记载：“折芦庵在老字圩水中，前有荷花池，池外有芦。”这里风景十分秀美，“环池修木间，错蔬圃畦列，与桑麻交影，茭芦间，每风晨月夕雨旭推移，水禽林鸟时至相嬗，池光野色互为宾主，水际丛篁屏抱水外”。

此外，还有南、北两处莲子兜，分别在老字圩和异字圩（今前跃村）。

一百四十七、养正社

梨园古调渐沦亡，养正社兴音绕梁。
此是商余消遣地，何须识曲问周郎。

发源于苏州昆山的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许多地方剧种都受到过昆曲艺术的哺育与滋养。由于昆曲过于讲求格调高雅，以致“阳春白雪，和者甚寡”，至清末，“昆曲已如广陵散”，渐趋低谷，但依然受到高雅人士的青睐。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泽绸业公所在北大街登椿桥堍建新所，并更名为培元公所，一些喜爱昆曲的绸业界人士在公所内成立昆曲曲社，名为养正社，取“培养正始”之意。养正社常会集曲友拍曲，称为“同期”，会前折柬相邀，会上各唱擅长之曲，并醵资聚餐，尽兴而散。

盛泽丝绸业居各业之冠，收入丰裕，且其交易集中在上午，下午二时后即已“下庄”落市，从业人员有较多余暇，于是在聚会品茗之处“撅笛度曲，研习昆腔”，自娱娱人。

养正社之前，丝业界票友已在丝业公所（先蚕祠）内“辟室度曲，延笛师研习昆腔，是为盛泽曲社之先声”。养正社之后，又先后有怡然社、红梨曲社、己巳社、吴歈集等曲社相继成立，活动频频。盛泽沦陷后，活动停止。

“何须识曲问周郎”：相传三国时东吴将领周瑜不仅精通军事，又善音律，江东向来有“曲有误，周郎顾”之语；唐朝湛贲有诗句“识曲遇周郎，知音荷宗伯。”

一百四十八、大钟圩黄雀

黄雀高飞萃大钟，郎来弹雀挟弓从。
门前有个南镜荡，照见郎心与妾容。

黄雀，别名黄鸟、金雀、芦花黄雀，为雀科金翅雀属鸟类。雄鸟的头顶与颏部呈黑色，翼斑和尾基两侧呈鲜黄色；雌鸟头顶与颏部无黑色，有浓重的灰绿色斑纹；下体暗淡黄，有浅黑色斑纹；雄鸟飞翔时可显示出鲜黄的翼斑。黄雀身长约12公分，体重约10—14克，寿命在11年左右。

黄雀羽色鲜丽，姿态优美，歌声婉转动听，每年歌唱时间长达八个月，又易于驯养，是有名的笼鸟，尤其北京地区饲养黄雀极多。

黄雀分布于欧亚大陆及北非地区，生活于山林、丘陵及平原地带，以多种植物果实、种子与少量昆虫为食，在我国的东北、华北、江淮、华南、西南等广大地区都有成群的黄雀栖息。

盛泽北郊的大钟圩毛家庄（今胜天村）一带，盛产黄雀，为盛泽特产之一。清同治《盛湖志》物产篇记载：“黄雀出毛家庄，最肥嫩。”如今，由于环境的变化，黄雀已不常见。

大钟圩之南有一湖，名南镜荡，1970年在“围湖造田”运动中被围垦，2002年又将其中一部分改造为镜湖公园，但水面仅剩200亩左右。

一百四十九、圩名谣

饱莫欢欣饥莫愁，足蒸背炙几曾休。
东邻牛大还嫌小，哪及西邻有五牛。

江南地区河港纵横，把土地分隔为许多小块，这些小块的土地俗称“圩”。

由于这里的地势低洼，农业生产的抗旱排涝工作难度极大。在长期的实践中，当地农民创造了构筑圩田的有效方法，即在圩的四周，沿河港筑起防水的堤，涝时将田内积水向堤外排出，旱时从堤外取水灌田，以此保持长年高产。

由于圩田水利的重要地位，民间逐步形成了修筑和管理圩堤（俗称圩岸）和圩田的组织“乡圩”。这种江南农村最基层的社会组织，与江南所特有的圩田、圩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清同治《盛湖志》记载了盛泽地区100多个圩的名称，如老镇区由充字圩、西肠圩、东肠圩、大适圩、大饱圩等五个圩组成；四郊有饭字圩、少圩、老字圩、异字圩、烹字圩、小适圩、大钟圩、南宵圩、大低圩、南草圩、往字圩、膳字圩、小口圩、丰字圩等。

沈秋凡先生的这首“圩名谣”，以风趣调侃的口吻提及近郊的饱字圩、饥字圩、大牛圩、小牛圩、五牛圩，其中饱字圩、饥字圩在东北郊，大牛圩、小牛圩、五牛圩在西北郊。

一百五十、挑脚秆

脚秆勤挑圩懒修，高田戽水低田收。
不逢霪雨由天幸，莫怪惰农亦有秋。

江南地区的农田大多是地势低洼的圩田，依靠四周的圩堤（俗称圩岸）来抗旱防涝，因此圩堤对于农田的收成至关重要。旧时的圩堤都是就地取土堆积而成，牢度较差，在河水的长年冲刷下，圩堤常常出现塌陷，因此各村的圩堤几乎每年都须整修。

由于农作物的生长需要适时灌溉，加上旱涝灾害频繁，因此，旧时的圩堤上经常出现或以水车、或以戽斗戽水灌田或排涝的景象。宋朝范成大的《夏日田园杂兴》诗中有“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垅翻江逆上沟”之句，陆游的《村舍》诗中也说“山高正对烧畬火，溪近时闻戽水声。”

一些懒于戽水的农夫，有意在自己的农田中“将田泥挖低，以便他田之水浸入”，名曰“挑脚秆”。如果不是霪雨连绵，那么投机取巧的“挑脚秆”者或许能得逞，所谓“不逢霪雨由天幸，莫怪惰农亦有秋”，但是一旦“偶遇水潦，则泛滥成泽田，禾尽漂没矣”。

“戽水”意为汲水；“戽斗”是旧时取水灌田的农具，形状像斗，两边有绳，由两人拉绳牵斗取水。

一百五十一、九曲

东西流灌似羊肠，水绕麻溪绿到庄。
今岁多收十斛麦，小姑好作嫁衣裳。

盛泽之上游来水，主要是烂溪与麻溪（又名清溪）。

烂溪源自江浙边境的东天目山。“烂溪之水分播为三，一自东汲港，一自白龙桥港，一自计家港，并东流入盛泽荡（西白漾）；麻溪之水自郎中荡、东、西舍港入荡（西白漾）”，至此，“两溪之水并会盛泽湖（西白漾）入市，其来源远而长矣”。

麻溪之水也源自东天目，“受南麻漾水东流，过烂溪……复由茅塔北流，分播为两，逶迤屈曲，一自乌新桥，一自东泾桥出口”。此路水，至茅塔村后向北流，之后河道忽左忽右，“东西流灌”，呈九曲羊肠之状，故里人称之为“九曲”，随后又分成两路，一路为新桥河，经永清桥（南新桥）、东秀桥（乌新桥）入东白漾；另一路为东泾桥河，经东泾桥、计家木桥也入东白漾。

据清乾隆《盛湖志》记载，里中前辈仲枢的《盛湖怀古》诗中有“麻溪九曲拱前村”之句，附注说“镇南有水九曲，自麻溪来，经前庄村（今红洲村）到镇中入白漾（即东白漾）”。

江南农村的富庶，得益于充沛的水源和纵横交错的河流灌溉，有了水的恩赐，才能期望“今岁多收十斛麦，小姑好作嫁衣裳”。

一百五十二、轮船

数声汽笛碧波澄，估客往还兴倍增。
一纸新闻争快睹，不愁隔宿易生憎。

盛泽地处水乡，历史上交通运输一直以水路为主，以舟代车。“水路交通工具历来以木船为主，至清末始有轮船通行”。

据《盛泽镇志》交通运输篇记载：“清代绸业公所成立后，备庄船专事运绸；早期庄船用手摇，晚清改由小火轮拖带。”在宣统元年（1909）重建的白龙桥上有一桥联：“式廓旧规模，有客来游歌利涉；蔚成新气象，行轮无阻便通商。”可见当时已有轮船通行。

关于轮船客运，《盛泽镇志》上说：“民国元年（1912）客轮通行，苏州新记轮船局的新顺大、大新两艘客轮每天往返于苏州、盛泽间；二十年后，又有通源轮船局的飞云、致公两艘客轮每天在盛泽、嘉兴间往返，利杭轮船局的利兴轮通航于盛泽、同里间。”但沈秋凡先生在此诗的原注中明确记述“小汽船每日往返嘉兴两次，沪上报纸因得当日寄到”，因此嘉兴班轮船的开通时间应该早于1918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盛泽有七班客轮分别通航于盛泽至嘉兴、同里、震泽、南浔、湖州、苏州、上海之间。

新中国成立之初，轮船仍为客运主要工具，除了盛苏（盛泽到苏州）、盛嘉（盛泽到嘉兴）、盛申（盛泽到上海）等客班轮船外，苏杭班也曾在盛泽停靠。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县内通航点增加，盛泽可通航至桃源、坛丘、南麻等地。1980年后，因镇乡公路通车，水上客运萧条，至1986年轮船客运全部停顿。

一百五十三、时鲜蔬菜

春盘苜蓿不须愁，潭韭初肥野菜稠。
最是村童音节好，声声并入马兰头。

苜蓿的品种极多，其中有一种黄花苜蓿，又名金花菜，其嫩茎叶是早春时节的优质蔬菜，江浙地区的人极喜食用，称其为“草头”。另有一种紫花苜蓿，则是优良牧草，被称作“牧草之王”。

韭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丛生，叶片为肉质，细长、扁平、柔软，其嫩叶可作为蔬菜食用，俗称韭菜。尤其是经隔绝光线软化栽培的韭菜，颜色浅黄，嫩而味美，称“韭黄”或“韭芽”。盛泽西郊绿葭潭（今永和村）一带的韭菜最为有名，清乾隆《盛湖志》记载：“韭，出绿葭潭，名小庞山。”

在平望的溪港，有一条穿村而过的小溪。传说春秋时越国伐吴，一支越军正驻扎在此小溪边吃炒熟的韭菜，突然接到进军的命令，兵士们纷纷将吃剩的韭菜倒入溪水中，启程出发。从此，小溪得名“韭溪”，由此可见韭菜的食用历史有多悠久。

荠菜是盛泽人极为喜爱的食用野菜，马兰头也是一种野生的蔬菜，“冬春间随地有之，取其嫩者，或炒鸡片及肉丝，或瀹熟拌以麻油，味最佳”。“挑马兰头掘野菜”是农村孩童最普遍的简单劳作，将掘到的野菜卖给镇民，可换得零花钱。“每当清晨，村童三五成群，高声唤卖，音节类山歌，颇扰清梦。”

一百五十四、水乡美味

千里莼羹未下豉，香闻锦带及春时。
如何洛下思归客，偏向秋风动朵颐。

菰菜、莼羹与鲈鱼脍是水乡吴江最负盛名的美味。《晋书·张翰传》载：“因见秋风起，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

菰菜，即茭白，是我国特有的水生蔬菜。它的种子叫菰米，也叫雕胡，是古代所说的“六谷”之一。有些菰菜因感染上黑粉菌而不抽穗，且茎部不断膨大，逐渐形成纺锤形的肉质茎，白如玉，嫩如笋，称之茭白，其味极为鲜美。杜甫对它有“秋菰为黑穗，精凿成白粲”、“滑忆雕胡饭，香闻锦带羹”的赞誉。

莼羹，是用莼菜烹制的羹。据《晋书·陆机传》记载，陆机到王济家赴宴，王济指着羊酪问：“江南有这样的美味吗？”陆机回答：“千里莼羹，未下盐豉”，认为莼羹之味美远胜于羊酪。

西晋文学家张翰的《秋风歌》：“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更是让吴江的鲈鱼名扬天下，吴江也由此而得名“鲈乡”。吴江的鲈鱼“长仅数寸，状微似鳜而色白，有黑点，巨口细鳞”，两腮盖之侧各有一斑，外观极似腮，故又名“四腮鲈”。

关于张翰的“莼鲈之思”，历来争议极多。沈秋凡先生也质疑：“莼菜产自太湖，以春暮生，入夏数日而尽，八九月间亦有之，然远不逮也。”故而在诗中问道：“如何洛下思归客，偏向秋风动朵颐。”

一百五十五、湖鲜

北通莺脰又分湖，紫蟹银鱼味绝殊。
何似入春乡味好，燕来新笋菜花鲈。

银鱼是著名的淡水鱼，长约数厘米，因体形细长、娇嫩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太湖银鱼与松江（即吴江）鲈鱼、长江鲥鱼、黄河鲤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鱼。盛泽北面的平望莺脰湖盛产一种金睛银鱼，通体色白无鳞，两眼金色，实属罕见。而盛泽西白漾与红梨湖（桥北荡）之间的寺桥港（圆明寺桥下）中所产银鱼，其味可与金睛银鱼媲美。清同治《盛湖志》载："银鱼，出寺桥港急流中，与莺脰湖埒。"

紫须蟹是分湖的特产，因两须色紫而得名。紫须蟹最明显的标志是两只螯（俗称钳）一大一小。明弘治《吴江志》记载："分湖蟹，亦名紫须蟹，大小钳，味甘，鲜美殊绝。"传说吴越争霸时，伍子胥在分湖筑点将台，操练备战，天神令虾兵蟹将助战，蟹将力战，伤了一钳，于是成了大小钳。盛泽烂溪所产青壳蟹，壳薄而味甘，一点也不逊色。清同治《盛湖志》载："蟹，肥大而鲜，自烂溪来，名溪蟹，味极佳。得自簖上者尤魁硕。"

燕来笋是指春天燕子来时出土的嫩笋，亦即春笋，其味甘淡，营养丰富，是烹饪美味佳肴时必不可少的蔬菜。文徵明的春游诗中有"野饭初烧燕来笋，山僧争荐雨前茶"之语。

菜花鲈，即土鲋鱼，也叫鲈鳢鱼、塘鳢鱼。《盛湖志补》物产篇记载："吐哺鱼，一名土鲋，好伏水底附土，而行状似松江之鲈。春间菜花开时，逐队出游。庖人煮莼菜，加土哺作羹，价廉味俊。非其时则不佳也。"

银鱼、蟹和菜花鲈都是盛泽最美味的湖鲜。

一百五十六、青壳螺蛳青口蚬

鱼羹鲑菜足庖厨，渔妇高呼又满衢。
青壳螺同青口蚬，一春风味在梅湖。

俗话说“正月螺蛳二月蚬”。早春时节，江南水乡最早应市的美食是并不起眼的螺蛳和蚬子。此时的螺蛳和蚬子肉质肥嫩而无子，味极鲜美，加上价格低廉，可谓上帝恩赐于穷人的佳肴。

盛泽人惯以酱水炒螺蛳。先一日买来螺蛳养在清水中，待其排净污物，再剪去螺尾。烹炒时，添加适量的酱水和葱姜料酒，故而未等开锅已满屋飘香，令人胃口大开。蚬子的吃法大致有两种，或以韭菜、雪里蕻炒蚬肉，或以清水煮汤，味俱佳。尤以蚬子汤为最，色如乳，形如扇，香清淡，味鲜洁，占尽色香味形四绝。

江南地区湖荡港汊密布，所产螺蛳、蚬子极多。盛泽镇东的嘉兴王江泾境内有一大湖，名梅家荡，又称梅湖，因水质清澄，湖底少淤泥，所产螺、蚬壳呈青色，所谓青壳螺蛳、青口蚬，为上品。早年间，镇东小庙港一带，每日清晨聚集众多贩妇，口呼“剪好螺蛳，梅家荡蚬子！”招揽主顾，声声不绝于耳。

“鲑菜”，是古时对鱼类菜肴的总称。杜甫的《王竟携酒》诗云：“自愧无鲑菜，空烦卸马鞍。”

“庖厨”，指厨房或厨师。

一百五十七、薹心菜

南山一顷采盈筐，开遍芸薹风送香。
却恨年来同苦馑，菜根难咬豆萁荒。

芸薹，即油菜，俗称薹心菜，原产中国。芸薹的栽培历史十分悠久，在西安的半坡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芸薹的菜籽，距今已6000多年。

芸薹是一种优质的低脂肪蔬菜，有降低血脂的作用，且含有大量胡萝卜素和多种维生素，含钙量又极高，有助于增强肌体免疫能力，再加上质地脆嫩，味道鲜美，故而极受人们的青睐。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中就有“薹心菜甲桃花里，未到天明棹入城”之语。

芸薹一般秋季种植，第二年初抽薹为薹心菜，所谓“冬种而春生，摘苔蕊食之”；既可摘薹心鲜食，也可腌制后食用或晒成干菜。

芸薹的籽可榨油，是旧时江南一带主要的食用油。

芸薹还有散血、消肿的药用价值。传说古代吴江有一姑娘名芸香，不幸身患疖疮，久治不愈。一天，梦见一片油菜花十分诱人，梦醒后，她下地采摘芸薹炒而食之，一身疖疮随之痊愈。此后，以芸薹治疖疮、乳痈一类病患的方法就在民间传开。唐代名医孙思邈也曾记述：贞观七年，他额角肿痛，目不能开，“遂取芸薹叶捣敷，随手即消，其验如神”。

旧时，芸薹十分价廉，但在民国初年，盛泽连年“冬苦寒，而春苦旱，菜价升至五六十钱，豆价升至六十余钱而亦难得”，故而沈秋凡先生在诗中慨叹“却恨年来同苦馑，菜根难咬豆萁荒”。

一百五十八、黄花鱼

石首鱼来三月天，埠头日日到冰鲜。
如何蒲绿榴红后，冯铗空弹食客筵。

黄花鱼，又名黄鱼，因鱼头中有两颗坚硬的鱼脑石，故又称石首鱼。

旧时，黄花鱼在每年三四月未开雷前开始大量上市，价格十分便宜，虽贩夫走卒、贫苦之家，也都买来尝鲜。到雷声一起，黄花鱼沉入海底，捕捞不易，鱼价也随之增高。

黄花鱼是端午节的时新佳味。汪琬有诗曰："三吴五月炎蒸出，楝树著雨花扶疏。此时黄鱼最称美，风味殊胜长桥鲈。"旧时风俗，五月初五端午节要吃"五黄"，即黄鱼、黄瓜、黄豆、蛋黄和雄黄酒。古人以为黄色可以解毒制煞，虽属迷信，但黄鱼、黄豆和蛋黄都富含营养，黄瓜和雄黄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故而吃"五黄"也应该算是按时令保健养生的习俗。

到民国初年，每年春末夏初时，以冰块保鲜的黄花鱼已大批运到，而到了端午节家家想吃黄花鱼时，反而难见此鱼，故而沈秋凡先生慨叹："如何蒲绿榴红后，冯铗空弹食客筵"。

舟山渔场曾以盛产黄花鱼而闻名，但由于捕捞过度，到上世纪末，黄花鱼资源已近于枯竭。近年来，由于渔业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产量已有所恢复。

"蒲绿榴红"：指端午时节。

"冯铗空弹"：冯谖为孟尝君门客，曾弹铗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原意是怀才不遇之人希望得到应有待遇，这里借指无鱼。

一百五十九、河蚌

小庙港中水菜船，拌烹酱腊味酿鲜。
阿侬剖得珠盈颗，带水论斤也值钱。

河蚌为软体动物，分布于亚洲、欧洲、北美和北非等地区。

大部分河蚌都能在体内自然形成珍珠，有些种类可用于人工淡水育珠。河蚌之肉可食用，也可作为鱼类、禽类的天然饵料和饲料。

蚌肉，俗称水菜，出于溪荡之中的河蚌往往能剖得珍珠，“小者时有，大者间出”，不以为奇。

旧时，盛泽附近的湖荡中河蚌极多，农船在罱河泥时，常能罱得河蚌。渔民捕得河蚌后，都将渔船停靠在镇东小庙港一带叫卖。由于河蚌含水分极多，出售时又带水称重，故而购回家复秤时，往往“十不得五”。

水菜烧酱肉是盛泽的传统菜肴。盛泽的人家都会在腊月里腌制酱肉，春节过后，待河蚌上市，家家买来蚌肉，用酱肉烹之。蚌肉有特殊的鲜味，酱肉香嫩肥美，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风味独特，堪称美味。

食用河蚌应在冬后至清明前为宜，此外，因河蚌肉硬味寒，故而脾胃虚弱之人，以及小孩、老人都不宜多吃。

一百六十、酱肉

腊猪得酱晾风前，鱼鸭编绳庭共悬。
笋党船来好烹煮，应夸味胜肉鲜鲜。

盛泽旧俗，每至腊月，家家都要腌制酱肉。按家境状况，或多或少买来猪肉，洗净晾干后“敷以椒盐，渍酱油中”，用红酱油把肉浸透。几天后，肉色渐渐泛红，把肉捞出，挂在太阳下暴晒，直到水分彻底晒干，肉色深红近黑才收起。晒得越透，吃时越香。

盛泽人过年是不能没有酱蹄子（盛泽人所说的蹄子，其实是肘子）的，故而腌制酱肉时必定有酱蹄子。一般在酱肉时还会同时酱上鸡，酱鸡一样是盛泽人喜爱的特色佳肴。

不少人家还自制风鱼、风肉、风鸡鸭，即把鱼、肉、鸡、鸭腌制后挂在屋檐下让风吹干，吃起来别有风味。

家家屋檐下悬以鸡鸭鱼肉，可谓盛泽腊月里的一大景观。

到初春二三月间，春笋上市，笋船成群而至，邑人称之“笋党”。以笋烹煮酱肉，其香味极为独特，远胜于鲜肉之味。

“肉鲜鲜”，盛泽土话称生猪肉为“鲜鲜肉”。

一百六十一、杜瓜

瓜船到埠口生馋，郎去买瓜价莫嫌。
侬爱家乡风味好，客瓜哪比杜瓜甜。

每到夏日，味甜汁多的瓜类是人们首选的解暑果品，在旧时，盛泽最常见的瓜是西瓜和香瓜。

西瓜原产于非洲，因由西域传入中国，故称之西瓜。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记载："西瓜，种出西域，故之名。"1980年在江苏扬州西郊的汉墓随葬品中发现了西瓜籽，说明西瓜在中国已有悠久的栽培历史。西瓜不仅味美，还有清热解毒、解烦渴、利小便、解酒毒等功效。

香瓜，又称甜瓜，因清香袭人、味甘甜而得名。香瓜的原产地也在非洲，大概与西瓜同时传入中国，也有消暑热、解烦渴、利小便的功效。香瓜的皮色大多为金黄，称之"黄金瓜"，另有一种皮色青绿，果肉为淡绿色，名字也十分形象，叫"青皮绿肉瓜"，肉质松脆，其味更甜更香，且瓜皮更薄，极受老年人的青睐。

外地所产的瓜俗称"客瓜"，本地所产的瓜俗称"杜瓜"。旧时，盛泽的瓜大多由外地瓜农运来，夏日里，东、西白漾的河埠上时常停满了瓜船。外地的"客瓜"个大且价廉，但不少人还是爱吃本地村民自种的"杜瓜"，虽然价格稍贵，却更为味美。

一百六十二、腌菜

半畦腴翠曝茅檐，秋末晚菘霜打甜。
郎踏菜时双白足，教侬多糝一星盐。

青菜，是江南一带最常见的绿叶蔬菜，叶色深绿，帮如白菜，属油菜的一个品种，又名油白菜。古人称青菜为“晚菘”，《南齐书》中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为最美味的蔬菜。青菜有许多品种，其中以“八月菜”为最，至深秋霜降后，青菜里原本不溶于水的淀粉，经植株内淀粉酶的作用，变成能溶于水的葡萄糖，此时的青菜有甜味，更受青睐，称为“霜打菜”。

旧时的盛泽城乡，几乎每家都会在深秋时节自制腌菜。先将青菜摊放在屋檐下晾晒，待晾去了水分后，放在陶缸里腌制。腌制时，先将一棵棵青菜在缸内密密地排齐，码实，均匀地撒上盐，再码上一层菜，然后赤了双脚开始踏菜。踏严实后，再码菜，再撒盐，再踏菜，直至踏满一缸，最后在菜面上压上几块压菜石。

几天后，菜缸里生出一汪卤水，菜才算腌成。此时的新腌菜味不太咸，正好上口，爽、脆、甜、嫩，鲜美无比，尤其在酒足饭饱后，入口一嚼，既醒酒又解油腻，其味胜于山珍海味。

“腴翠”，指青菜。

“糝”，原意为谷物磨成的碎粒；在盛泽土话中，“糝”作动词用，意为“撒”。

一百六十三、土银鱼与针口鱼

水涨黄梅上土银，烂溪矶畔好垂纶。
白肥自足盘飧媚，不数寸余针口鳞。

江南水乡的鱼类资源非常丰富，水乡之人也大多喜爱吃鱼。

在吴地方言中，“吴”与“鱼”同音，甚至有人认为“吴”字“从口下大”，为鱼之大口，故“吴”字就是“鱼”字。春秋时，因吴王僚嗜好“炙鱼”，故专诸借献鱼之机，用藏在鱼肚内的“鱼肠剑”行刺吴王僚。

盛泽为水乡泽国，所产鱼类极多，有鲈鱼、银鱼、鳊鱼、白鱼、鲤鱼、青鱼、草鱼、鲢鱼、鲫鱼、鳑鲏鱼、鲞鲦鱼，还有黄鳝、鳗鲡等，数不胜数。

此外，每到黄梅时节，雨多水涨，烂溪中产一种名叫土银鱼的小鱼，为盛泽特产。清乾隆《盛湖志》土产篇称：“土银鱼，出烂溪，长四五寸，多肉，有子，极肥，霉天有之。”同治《盛湖志》上还说土银鱼“味如鲚鲊”。

另有一种针口鱼，“大不盈寸，以口上有针，故名，味亦美”。针口鱼，又名角鱼，长在浅水中，体呈圆柱形，娇小玲珑，一般在八、九月份捕捞。

“垂纶”，即垂钓。

“飧”，即晚饭，也泛指饭食。

一百六十四、菱角

秋来乡味半湖菱，肉软香清得未曾？
剥与郎尝不伤手，徐家荡产最堪称。

江南水乡物产丰富，水生植物尤为著名，其中茭白、莲藕、茨菰、水芹、荸荠、芡实、莼菜和菱角被誉为“水中八仙”。

菱，古时称芰，为一年生浮叶水生植物，主根长约数尺，伸入水底泥中，茎蔓细长，沉于水中，叶呈菱形，浮于水面，其果实又称菱角，色泽有青、红、紫等。

菱角以角的数目分为四角菱、两角菱和无角菱几种。四角菱有小白菱、大青菱、水红菱、沙角菱等，两角菱如乌菱（又名风菱），无角菱又名圆菱、和尚菱、元宝菱，因其主要产于嘉兴南湖一带，故又称南湖菱，王江泾的徐家荡所产菱角也是无角菱。无角菱的皮呈绿白色，四角退化，仅剩痕迹，皮较薄，性糯，品质优良，且剥菱壳时不会伤手。

盛泽周边湖荡密布，各种菱角都有种植，汪文柏的《盛湖》诗中有“夜灯千匹练，秋雨半湖菱”一联，极为有名。

菱角一般在立秋至霜降时节采收。旧时盛泽有句俗语：“八月八，买斤菱来剥一剥。”每到秋后，街头巷尾弥漫着熟菱的香味，“鲜鲜咂咂格铜锅子热菱！”叫卖声此起彼伏。也有人喜欢吃生菱，其味更为鲜嫩甜脆，譬如南湖菱就宜生食。

一百六十五、云片糕

薄于蝉翼雪云糕，争说饼师手段高。
斤运成风丝不起，祖传惟有许湾刀。

云片糕，又名雪片糕，因片薄、色白而得名，为传统中式糕点。

“糕”字最早见于汉代，俗称糕点，《说文解字》解释：“糕，饵属。”一般而言，软胎的称“糕”，带有馅心的称“点”，外挂糖、蜜的称“裹”，内无馅料、外无挂料的称“食”。中国各地都生产糕点，但以苏州的糕点最具盛名，民间有“食糕还须苏州行”之说。

关于云片糕名字的由来还有个传说。据说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地方官员呈上糕点请皇上品尝。乾隆一尝，香甜松软、清新可口，便大加赞赏，问是何糕点？官员说，是家中自制的点心，请皇上赐名。其时，乾隆正在欣赏满天的雪花，便随口说叫雪片糕吧，并取笔在纸上题名。乾隆一高兴，竟笔下大意，把“雪片糕”写成了“云（繁体为‘雲’）片糕”，于是两个名字同时传开。

云片糕质地滋润细软，犹如凝脂，且久藏不硬，入口即化；主要原料有糯米、猪油、白糖、芝麻等；在制作上也十分讲究：所用炒糯米粉须熟透、保白、绵细如面，且要储藏半年，以去其燥性；尤其是切糕的刀工最为关键，须以专用的大方刀，切成薄如书页的片状。

云片糕虽然各处都有，但切糕的糕刀都出自盛泽许家湾。相传“湾前之水用以锻炼，刀锋犀利，不起丝，不胶刀”，故而各地都来此买刀，有“通省糕刀”之称。

“斤运成风”，比喻技术高超。

一百六十六、蒸缸羊肉冬酿酒

生泔白酒暖茅柴，羊肉开缸味最佳。
更有太牢沿路卖，市招尽挂教门牌。

生泔酒、三白酒、茅柴酒，都是旧时盛泽农家自制的土酒。每年入冬时，江南一带的许多乡民都会“以草药、糯米酿酒，名为冬酿酒，色清香冽，甘美异常”。

冬酿酒的名目繁多，有桂花酒、秋露白、杜茅柴、靠壁清、三白酒、十月白、生泔酒等。“其酿而未煮，旋即可饮者”名生泔酒，“以清泉水浸白糯米，以白面造麴（酒母）酿成者”名三白酒，“有名榨头酒，初出酒糟也”，俗称杜茅柴。

每到西风起时，盛泽人都喜食羊肉以进补。蒸缸羊肉是盛泽的特产，旧时新开弄口“胡立大”、庄面上“雷老三”的羊肉都颇具盛名。

蒸缸羊肉的烧制方法颇具特色：以瓦缸为炊具，肥、瘦搭配的羊肉用咸水草扎成块，再放入老姜、红枣、白糖、酱油，压上竹制蒸架，用老桑树作燃料，用火煨上12小时，煮成后汤色如玛瑙，肉酥而不烂，油而不腻，味道鲜美。

五香酱牛肉也是旧时盛泽的特色冷菜，一般都是小贩在家中煮好后沿街设摊叫卖。牛在旧时作为耕作农田的主要畜力，官府规定宰杀牛有罪，所以，卖酱牛肉的小贩都自称清真教门。

“太牢”，这里指牛肉。《大戴礼记》载：“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

“教门”即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常自称为“教门”。

一百六十七、绸糖

米制饴饧异杂粮，练绸光洁味甘芳。
初非养老兼粘牡，惠蹠何劳论短长。

绸糖即饴糖，是以大米、高粱、大麦、玉米等淀粉质的粮食为原料，经发酵糖化制成的食品，又称饧、胶饴。以大米为原料熬制饴糖，比用杂粮制作的饴糖味更甘芳。饴糖熬成时，是黄褐色的浓稠粘液，经搅拌后凝固成白色糖块。旧时，小孩子们常以绕（绞）绸糖为游戏。

饴糖的主要成分为麦芽糖，并含维生素B和铁等，不仅有甜味，还有健脾胃、润肺止咳的功效，是老少皆宜的食品。

旧时，盛泽的练坊在练绸时普遍使用饴糖，故而盛泽人又称饴糖为绸糖。

练绸，是真丝绸生产工序之一。绸匹织成时为生绸，须经练煮除去丝胶，使之成为熟绸，以改善穿着性能并增添白度与光泽。

“初非养老兼粘牡，惠蹠何劳论短长。”此句说到了《淮南子·说林训》中记述的一个典故：“柳下惠见饴曰：‘可以养老。’盗跖见饴曰：‘可以粘牡（粘门闩，粘上后开关门没声响，便于行窃）。’见物同而用之异。”

“惠”指柳下惠，是有名的君子；“蹠”同“跖”，指柳下惠的弟弟柳下跖，在先秦古籍中被指为大盗，称盗跖。柳下惠认为饴糖可以养身，盗跖则认为饴糖可以用来粘门闩，而在盛泽则用以练绸，可见一物可以有不同的用处。

一百六十八、定胜糕

粆姖饿馆馈送劳，四时熟食亦堪豪。
东邻有女茶新受，红绿忙题定胜糕。

定胜糕，是一种很具江南特色的著名糕点，色呈淡红，松软清香，入口甜糯。制作时，先将配置好的米粉放进特制的印版里，中间再放入红豆沙，然后蒸熟即成。

盛泽一带，亲戚之间往来时，都相互馈赠熟食，定胜糕是首选之物。

旧时，男女议婚繁文缛节极多。男方备盘，以首饰、衣料、礼金、茶叶、枣子等为礼送至女家，俗称“送盘（或担盘）”，选择吉日定亲，称“文定”，女家收礼后，在原盘中以衣料、鞋帽、定胜糕等物回赠男家，称“允谢”，其中定胜糕为必有之物，并在糕上用红绿色题写吉祥语。

女子订婚，称之“受茶”。旧时盛泽有谚语：“一家女儿不吃（受）两家茶”。

定胜糕名字的由来传说极多。传说南宋时，老百姓为鼓舞岳家军将士的士气，特意在所制的糕面上模印“定胜”二字，送至军中，于是有了定胜糕的名字。另有一说，南宋名将韩世忠吃了苏州老百姓送来的糕点后，在黄天荡打败了金兀术，故名定胜糕。

定胜糕的形状如榫（竹木构件凹凸部分相衔接之处，俗称榫头），故而又名定榫糕。

定胜糕又名定升糕、鼎盛糕，都取其好口彩。直至今天，凡满月、生日、升学、乔迁等喜庆时节，依旧赠送定胜糕以示祝贺。

“粆姖”、“饿馆”都是古代的面食。

一百六十九、点心

户户眠迟早起难，清晨试检点心单。
登春周氏汤团好，牢九胡皴亦可餐。

旧时，一些从事丝绸贸易的绸行、丝行和领投业的从业人员有晚起的习惯，大多在街面上购买熟食作早餐，名曰“点心”，故而盛泽的点心店摊极多。

盛泽旧有“吃镇”之称，饭店、面馆以及熟食、糕团、馄饨之类点心、小吃都极为有名。

登椿桥堍的周氏汤团店是百年老店，因其汤团皮薄、馅饱、汤足而颇具盛名，虽然后来几易其主，但顾客仍呼为“周汤团”。

庄面上的金顺记糕团店首创的盘龙糕，用糯米粉加赤豆沙、白糖、猪油和多种果仁制成，形如盘龙，松软香甜，入口即化，肥而不腻。其制作技艺现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东庙场上的锡昌馄饨店，经营烧卖、绉纱馄饨、汤包等，味道鲜美，名声极大。盛泽旧俗，每至新年，大人小孩都爱去东庙场上“吃烧卖、看画张”。

此外还有团子、小笼包子、水糕、油汆饺、梅花糕、大饼、油条等等，不一而足。

直至今日，盛泽人依然有早餐吃面或食用点心的习惯。

“牢九”与“胡皴”都是古代的面食名，相当于今天的大饼、包子之类。宋代诗人苏轼的《游博罗香积寺》诗中有“岂惟牢九荐古味，要使真一流仙浆”之句。另据宋代资料记载，当时所制作的胡饼，经烘烤后表面出现裂纹，故有“胡皴”之说。

一百七十、过新年

门神荼垒又新描，颇耐街头市寂寥。
饤果辛盘茶橄榄，雉卢声里杂年消。

春节，俗称过新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旧时除夕之夜，吃完了年夜饭，家家红烛高烧，成年人围炉而坐，谈笑欢歌，通宵达旦，名曰“守岁”。到了午夜时分，换上新的春联（或门神），放爆竹，庆贺新年的来临。

年初一至初三，盛泽旧俗停市三日，镇民合家团聚欢度新年，或相互拜年联络情谊，每家准备好果盘、橄榄和茶招待客人。有的人则逢场作戏，玩玩麻将、牌九、扑克或打打“年消锣鼓”以为游戏。

贴春联的习俗源于桃符。相传上古时，神荼和郁垒俩兄弟擅长捉鬼，后来人们在两块桃木板上画神荼和郁垒，挂在门的两边驱鬼辟邪。据南朝《荆楚岁时记》记载：“造桃板着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门神。”

“荼垒”即神荼和郁垒。

“饤果”和“辛盘”在这里泛指茶食。“饾饤”，原指供陈设的食品。“辛盘”即“五辛盘”，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元旦立春，以葱、蒜、韭、蒿、芥辛嫩之菜杂和食之，取迎新之意，谓之五辛盘。”

“雉卢”，是古代的一种游戏，这里代指博戏。

一百七十一、请厕神

粪帚堆头乞如愿，灶觚壁下请姑娘。
堂前女伴娇憨甚，休咎问完笑口张。

旧时迷信盛行，民间供奉的神明多如牛毛，门有门神，床有床神，灶有灶神，就连人们方便的厕所也有厕神。

关于厕神，各地的说法有所不同，有紫姑、戚姑、坑三姑娘、灰七姑娘等多种传说。祭祀的时间也不同，有冬至、除夕、元旦（年初一）、元宵等，各地不一。

早在唐代，民间就有“请戚姑厕神”的习俗。《月令广义》载：“唐俗元宵请戚姑之神，盖汉之戚夫人死于厕，故凡请者诣厕请之。”

厕神戚姑，即汉高祖刘邦的妃子戚夫人，被吕后贬为奴仆，并削光头发，熏聋耳朵，毒哑喉咙，挖去双眼，扔入茅厕，并称之“人彘”（人猪），最后死于茅厕中，故民间奉戚姑为厕神。因“戚”、“七”同音，也称七姑。

盛泽一带过去如厕都用马桶，为减少马桶内恶臭，常在桶内撒放草木灰，故而人们称厕神为“灰七姑娘”。

民间祭祀厕神都由妇女担任。盛泽旧俗，大年初一，妇女用布扎成人形置于粪土上，又以饭筲箕“着女帽插花朵，向灶壁下呼请”，口中说：“请灰七姑娘！”传说妇女若有心事，此时可向厕神请教。

“休咎”，意为吉凶、善恶。

一百七十二、接路头

花筒爆竹把神留，忙肃衣冠接路头。
得色更将骰子掷，状元抢罢又挑侯。

中国民间对财神的崇拜因地而异，难以考证其起源，有所谓“正财神”赵公明、“文财神”比干、范蠡、“武财神”关羽、“偏财神”五路神等多种说法。

路头神即五路神，是江南一带的民众所信奉的财神，作为商业重镇的盛泽，祭拜路头神的礼仪也就格外的隆重。

清代顾禄的《清嘉录》记载：“正月初五日，为路头神诞辰，金锣爆竹，牲醴毕陈，以争先为利市，必早起迎之，谓之接路头。”

传说正月初五是路头神的诞辰，因此早年间的初四夜间，镇民就抬着路头神的塑像，敲锣打鼓在镇区闹市中巡游，名为“路头会”。这一夜，镇中的各家商铺都准备好祭牲、糕点，开门等候路头神的到来。等路头神路过店门时，各家都争先将财神请入自家的厅堂奉祀，放花筒，鸣鞭炮，燃香烛，整肃衣冠虔诚膜拜，名为“接路头”、“抢路头”、“接财神”。盛泽的商家历来将“接路头”视为巨典，“奉祀弥虔”。直至今日，商家对“接路头”的习俗依然热情不减，从初四夜到初五，镇中爆竹声此起彼伏，通宵达旦，只是省略了路头神巡游的节目。

旧时的商家，还迷信在此日掷骰子，“目掷骰得色，以取吉利。”“状元抢罢又挑侯”：“抢状元”是古代掷骰子游戏的玩法之一。

一百七十三、刘猛将神

元宵过后舁刘王，也似人间拜客忙。
钲鼓喧天光烛夜，队灯衔接里余长。

刘王，即刘猛将，传说是一位为民驱除蝗虫的英雄，故被民间尊为驱蝗之神。《清嘉录》载："刘猛将军，相传神能驱蝗。"至于刘猛将神是谁，历来争议颇多，有说是宋朝武穆公刘錡，也有说是元朝指挥使刘承忠。

刘承忠，元朝末年任江淮指挥使。当时，江淮地区（今江苏、安徽一带）大旱，蝗虫成灾，刘承忠带领百姓扑灭蝗虫。元亡后，刘承忠投水而死，江淮百姓尊他为刘猛将军，建庙祭祀。清雍正二年（1724），皇帝诏令全国各省、府、州、县建刘猛将军庙，每年春秋祭祀。《清史稿》称："世宗朝，各省祀猛将军元刘承忠。"同治二年，被封为普佑上天王。

刘猛将神是江南一带的农民崇拜的主要神灵之一，各地祭祀的形式大同小异。

过去，许多村都有刘猛将庙。每年元宵节后，各村的乡民手持灯烛，敲锣打鼓，前呼后拥，抬着刘猛将神，拿着神的"帖子"到其它的刘猛将庙"互访"，轮流聚集于各庙中，就如人间拜客一般，俗称"灯会"。

嘉兴王江泾莲泗荡的刘王庙是江南最具影响的刘猛将庙，自清代至民国时期，每年清明前后的网船会闻名遐迩。

"舁"，是抬的意思。

一百七十四、马灯会

少年姚冶饰娇娥，百戏鱼龙烛队多。
月下新妆齐出看，金吾不问夜如何。

旧时，盛泽各类节会甚多。二月初二，除了吃撑腰糕外，还有夜间出马灯会的习俗。

马灯会是由各行各业的热心人士自愿组织的民俗活动。届时，先由商会及各行业公会的头面人物协商筹备马灯会事宜，然后各行业及规模较大的商家分头准备，或扎制彩灯，或组成锣鼓队，或排练江南丝竹演奏，或扮演戏文。因为这类民间活动是各行各业拼比实力、展示风采的最好时机，因此都极尽奢华、各出奇招。

至夜间，各行各业的队伍列队行进于闹市街区，“鸣金击鼓，奔走若狂”。有各色彩绸扎制的龙马诸灯，飞禽走兽无奇不有；有少年穿彩衣、傅粉墨扮演的戏文故事，如许仙白娘娘断桥相会、蔡状元造洛阳桥，有的还扮演三百六十行。有时，这样的活动会延续多天。

在娱乐活动相对贫乏的从前，城乡民众都对马灯会热情有加，人们穿上节日新妆，挤满大街两侧观看热闹。

民国四年（1915）的马灯会酿成了死亡80余人的巨灾，灾后，当局严令禁止马灯会，此风始息。

“姚冶”，即妖艳，是艳丽的意思。

“金吾”为古代官名，掌管京城的戒备。从前，京城内禁止人们夜间行走，元宵节夜间解除宵禁，让百姓观灯，称为“金吾不禁”。

一百七十五、开庄日

二月初旬喜气饶，开庄吉日市声嚣。
五更爆竹惊人睡，商店悬牌趁此朝。

庄面在花园街潇湘弄之南，是清代至民国时期集中进行丝绸交易的场所。

庄面是一幢封闭型的建筑，四周筑围墙，北设一门，东西各有两门作通径。庄内是一式的店面，每间一隔为二，分别由绸行和领投户租用。每天，绸行与领投户各自入庄挂牌收绸。

旧俗农村机户及练、染、轴坊在春节前后都“歇年”，外地客商亦相继回乡过年，庄面也于腊月二十左右闭门，称为“关庄”；至来年二月初，择吉开市，称为“开庄”。开庄后，则终年不辍，直至腊月。

开庄之日，是盛泽的重大节日。四更时分，绸业公所内灯烛辉煌，镇上头面人物及绸业、领业两公所的主要人员群集于所内关帝厅焚香膜拜。礼毕，一起行至庄面，在爆竹声中开启庄门，并将印有“盛泽庄面上”的红纸木刻财神像，贴遍庄面内各家店铺内外。

庄面内各家绸行、领投户都在此日挂牌收绸，四乡的机户也都在此日争相来庄面交售绸匹，因为按照惯例，为讨吉利，机户在开庄之日所交售之绸，不论优劣都照收不误，且价格高于平时；领投还额外赠送交绸者筹棒一根，凭此筹棒可到指定面店吃双浇面一碗。

开庄日清晨，全镇各家商店也提早开门营业，街市灯烛如昼，人声鼎沸，喧闹万分。

一百七十六、小满戏

先蚕庙里剧登场，男释耕耘女罢桑。
只为今朝逢小满，万人空巷斗新妆。

先蚕庙即先蚕祠，俗称“蚕花殿”，在五龙路南口。

先蚕祠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是由盛泽丝业界同仁出资公建的蚕神庙兼丝业公所。先蚕祠是一座庙堂式建筑，“规模之宏敞，建筑之精美居江南之首”；大殿中祀黄帝轩辕氏、炎帝神农氏和蚕神嫘祖三尊神像；大殿正对面有一座精致的古戏台。

传说小满日（5月下旬）是蚕神的诞辰，届时由丝业公所出资聘请名戏班在古戏台上演戏三天以酬神，名为“小满戏”。此时，“新丝行将上市，丝行转旺在即”，蚕农、丝商借此热闹一番，预祝丰收。开戏之日，远近的镇民、蚕农蜂拥而至，如潮似涌，蔚为大观。

“小满戏”是先蚕祠的一项传统活动，远近闻名。1936年由茅盾先生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中记录了小满戏的盛况，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中，也有以盛泽小满戏为题材的大型壁画。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先蚕祠被改作粮库使用，祭祀与小满戏等活动告停，至九十年代，先蚕祠作为中国丝绸文化的重要遗存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盛泽镇政府筹资500余万元修复了先蚕祠，恢复了一年一度的“小满戏”，并利用丝业公所的房厅建成展示吴江丝绸历史文化的丝绸陈列馆。

“释”、“罢”：放下、停止的意思。

一百七十七、上花坟

小桃园路雨纷纷，几簇夭桃隐水滨。
林外红裳谁氏妇，双双展拜上花坟。

小桃园，在圆明寺之西北，从前此地四面阻水，坟墓极多，环境幽僻。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小桃园之地建起了盛泽乡工艺织造厂。

清明时节，民间有扫墓的习俗。据传，此俗始于古代帝王“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经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固定风俗。

旧时，民间对扫墓十分注重。每到清明时节，郊外到处都是扫墓之人，正如唐代杜牧的《清明》诗中所写：“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扫墓时间一般在清明前十日到后十日之间，按江南习俗，新坟必须在清明前祭扫，旧坟可以在清明后祭扫，但不能过立夏。扫墓时，先要清除坟上及周围的杂草，再给坟头添上新土，叫“圆坟”；然后供上荤素菜肴及酒饭等祭品，举行祭祀仪式。参加祭祀的每个人都要亲手给祖先烧纸钱，行礼拜祭。

按旧俗，新媳妇必须在清明时与夫君一起去祭扫祖坟，俗称“上花坟”。

“滨”：水边。

一百七十八、网船会

网船赶会艳阳春，雁荡湖边多丽人。
争向陶家甸上去，衣香鬓影一时新。

王江泾莲泗荡的刘王庙网船会是江南著名的水上庙会。清代及民国时期，每年清明时节，江浙沪一带的渔船集结于刘王庙前的莲泗荡湖面，祭祀刘王神。“远近赴会者扁舟巨艇不下四五千艘，自长虹桥至庙前十余里内排泊如鳞。”

关于刘王神的传说，各地略有不同。在王江泾民间，传说元代刘承忠将军带领百姓扑灭蝗虫，又下湖捕鱼捉蟹度过饥荒，因劳累过度，不幸溺死于莲泗荡中。百姓感恩戴德，尊刘承忠为“刘猛将神”，亦称“刘王”，尤其在江南一带的渔民心中，刘王是最受尊崇的水神。

在网船会期间，刘王庙附近的石桥头庙也出“猛将会”，届时，盛泽镇中的妇女都去陶家甸等处烧香还愿。

雁荡、陶家甸都在王江泾境内。

1958年，刘王庙被拆除，网船会中止。1979年前后，民众又自发来此祭祀刘王，烧香者大多为渔民和妇女，几年后祭祀民众多达十余万人。1986年，当地政府在刘王庙原址上建成“刘承忠纪念馆”，并恢复了一年一度的网船会，2010年网船会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网船”是江南渔民在湖河港汊中捕鱼捉蟹的渔船，俗称捉鱼船。

一百七十九、双阳会

双阳会届十年终，魔煞万人巷尽空。
东港西洋箫鼓闹，纷纷注目碧波中。

双阳会是清中叶至民国时期江浙边界一带的水上盛会，每十年举行一次。最后一次双阳会在民国十三年（1924）。

双阳会源于震泽东北五里许的双阳村城隍庙，由城隍庙董（庙主）与南浔、震泽两地丝业公所筹划出会事宜。

农历三月初，邻近的江浙边界各庙组织会船到双阳村聚会，然后开锣启程。船队先至震泽停留五天，再至梅堰停留三天，然后横渡北麻漾，经坛丘至盛泽，由东港河进入镇区，穿过东白漾，沿环镇南路水道，出沉瓦桥，泊于西白漾。由于沿途陆续有会船加入，故而队伍逐日扩大，首尾相接，浩浩荡荡，逶迤数里。参加者号称有七十二圩之多。

船队在盛泽西白漾停留七天，会汛随即进入高潮。会船装饰成楼台亭阁，三五艘一排，用木板连成戏台，上演京、昆、苏、湖各剧以及木偶、草偶戏，或表演采桑、饲蚕、缫丝、络纬、摇经、织绸等场景。湖上旌旗蔽日，锣鼓喧天，四方观会者纷至沓来，盛况空前。

双阳会在盛泽结束后，会船在归途中陆续散去，剩下的船队行至震泽慈云寺前荻塘河内再演三天酬神戏，会期才告终了。

“东港西洋”即东港河与西白漾。

一百八十、坐蒲墩

东岳凭空实以人，居然诞降有生辰。
夜邀女伴蒲团坐，不复礼防庞吠嗔。

盛泽原有两座东岳庙，一在老字圩下窑村（今前跃村），建置无考；一在大饱圩（今东港村），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里人汤崑建，同治三年（1864）重建。今俱废。

东岳庙祀泰山神。泰山是五岳中的东岳，位居东方，是万物发祥之地，因此古代之人认为泰山神具有主生、主死的重要职能，其影响渗透至社会各阶层，全国各地几乎都建有东岳庙。

历代帝王对泰山神都尊崇有加，屡赠封号，唐代封为“天齐王”，宋代晋封为“仁圣天齐王”、“天齐仁圣帝”，从秦始皇到清乾隆帝，许多皇帝都曾去泰山封禅。民间则尊称泰山神为“东岳天齐大帝”。

传说农历三月二十八是东岳天齐大帝的诞辰，按旧俗，盛泽的善男信女都会去东岳庙进香，以示庆贺，一些女香客还提前一日入庙，彻夜诵经祈祷，以示虔诚之意，名为“坐蒲墩”。

“蒲墩”是用蒲草编成的圆形坐垫，旧时的庙中，诵经之人都坐在蒲墩上。

“礼防”，指礼法。语出《礼记》：“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防止水之所由自来也。”

“庞”即“庞杂”，意为多而杂乱。“吠嗔”意为愤怒、责怪。

一百八十一、轧神仙

门庭佳运夏初迎，吉语还凭草数茎。
今日神仙谁轧得，忙招姊妹到圆明。

轧神仙是苏州一带的传统民俗活动。

神仙指吕纯阳，是八仙中传闻最广的一位仙人。传说他原是唐朝的一位书生，字洞宾，别号纯阳子，后来得到汉钟离的点化，得道成仙，被尊为全真道北五祖之一，民间称他为吕祖、纯阳祖师等。

在民间，关于吕洞宾的传说颇多，影响广泛。传说他行踪不定，经常在人间济世度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乞丐娼妓，许多人受到过他的点化，他尤其热心于救助贫穷的人和患病的人。

传说农历四月十四是吕纯阳的诞辰。这一天，他会化身为乞丐或小贩等形象混在人群中，如果谁能轧到他的身边，就会得到仙气，交好运。因此，每到此日，人们会去人多的地方人轧人，祈求轧得好运，称之“轧神仙”。

盛泽旧俗，此日早晨，人们会采集千年蕴（万年青）叶散置于门口，称为“起运”，然后到圆明寺去轧神仙。这一天，圆明寺人山人海，各类小贩、杂耍艺人等也都云集于此，轧神仙成为一年一度的传统庙会。

“轧”是苏州方言，是挤的意思。

一百八十二、蚕关门

蚕事关门忌百端，山头满望十分欢。
天公此月真难做，既要温和又要寒。

盛泽居民世代以蚕桑丝绸为业，形成了许多特有的蚕桑行业习俗。

农历三四月为“蚕月”（养蚕季节）。蚕农以蚕事为头等大事，在“蚕月”中专心于育蚕。

养蚕之始，先要孵蚁。蚕娘身穿棉袄，将蚕种焐在胸口，靠体温使之孵出，称暖种。蚁蚕孵出后，在蚕室内挂帏，置火盆加温。在此期间，蚕农停止一切交往活动：官府暂停征收，亲友邻里间庆贺、吊唁诸事亦须避免，家家闭户，红纸贴门，“禁喧闹，忌亲朋来往”，称“蚕关门”。“蚕关门”客观上起到防止蚕病传染蔓延的作用，是养蚕经验的反映。

待蚕宝宝上簇（俗称“上山”）后，蚕农开始串门走访，亲戚之间携礼物拜望，评看结茧情况，互相祝贺，称“望山头”。采茧后，蚕农家门户洞开，称“蚕开门”，并设宴庆贺，名“落山酒”。

“蚕月”中，蚕农说话、行事有诸多禁忌：如忌说“死”，避“死蚕”之讳；忌说“生姜”，避“僵（蚕）”之讳；忌说“葱”，以免“犯冲”；还忌拍打蚕箔，怕财气拍光；忌赤膊，怕蚕宝宝不穿衣（不结茧）。

农谚云：“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反映的正是蚕区的农副业生产对天气的不同需求。

一百八十三、看花蚕

荆布苗条新嫁娘，花蚕看罢又分秧。
落田羞被旁人笑，不敢回头偷觑郎。

江南一带，是桑蚕丝绸业的起源地之一，早在五千年前，当地的先民就已学会了养蚕、缫丝和织绸。

吴江历来重视蚕桑生产，据清乾隆《吴江县志》载："春夏之交，绿荫弥望，通计一邑，无虑数十万株。"现存之古石桥楹联上常有"桑麻蔽野"、"农桑兴大利"之类描述。蚕桑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蚕桑之利，厚于稼穑，公私赖焉。"是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丝之丰歉即小民有岁无岁之分。"

在蚕区农村，妇女是重要的劳动力，不仅农田中拔秧、插秧之类轻体力劳动大多由妇女承担，在采桑、养蚕的过程中，妇女更是主要劳动力。一般蚕农家，都根据家中女劳力的多寡来确定养蚕的数量。

农家娶新媳妇，必定会扩大养蚕的规模，名为"看花蚕"，一方面是借结婚的喜气，祈求有个好年成，另一方面也因为增加了一名女劳力的缘故。

"荆布"，是"荆钗布裙"的意思，也是旧时对自己妻子的谦称。

"落田"，女子下田拔秧、插秧，名为"落田"。

"觑"，即偷看。

一百八十四、小暑一声雷

昨夜一声小暑雷，今朝翻转做黄梅。
问郎何日开秧耙，莫任树头插禾催。

中国是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农业生产历史悠久。农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通俗易懂的谚语或歌谣等形式加以总结并广泛流传，对农业生产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旧时，农业生产主要靠天吃饭，因此天气的状况与农业收成的好坏关系密切，有关天气的谚语也就成为农谚中主要的组成部分。

小暑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在每年的7月7日或8日，当太阳到达黄经105°时为小暑。小暑时节天气开始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即将结束，盛夏开始，气温升高，并进入伏旱期。

但在某些年份，小暑前后北方冷空气势力仍较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南方暖空气势均力敌，出现锋面雷雨。农谚说："小暑一声雷，翻转做黄梅。"小暑时节的雷雨常是"倒黄梅"的天气信息，预兆雨情还会继续维持一段时间。

小暑时节，全国各地的农作物都进入茁壮成长的阶段，需加强田间管理。

一百八十五、上看初三下十六

晨曦开口雨崇朝，夏至西南没小桥。
上看初三下十六，占天经验老农饶。

在民间，关于天气的谚语很多。

谚云：“朝开口，东方大雨落一缸。”朝，是指早晨东方日出之时；开口，是指太阳的四周都是乌云。朝开口，预示着要下雨，因此“晨曦开口雨崇朝”。

“夏至西南没小桥”，意为夏至日吹西南风，雨期必长。

类似的谚语还有很多，如“雷公先唱歌，有雨也勿多”、“太阳颜色黄，明朝大风狂”、“东风两头大，西风腰里粗”（东风早晚大，西风中午大）、“邋遢冬至晴过年，晴过冬至邋遢年”等等。

江南地区还有“上看初三，下看十六”之说，认为一个月的天气晴雨，与初三与十六两日的天气关系密切。此外，民间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上看初三，下看十六”之说应该是“上看出山，下看日落”，这里的“上”指早晨，“下”指傍晚，意为一天的晴雨，看早晚的太阳，所谓“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

当然，谚语所预测的天气情况只是长年积累的经验，未必都准确，尤其在近年中屡屡出现异常天气的情况下，更应相信科学的天气预报。

一百八十六、立夏称人

立夏先将疰夏防，妾身顿觉秤低昂。
三春闷损腰围减，非复曩时新嫁娘。

立夏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在每年的5月5日或6日，在天文学上，太阳到达黄经45°时为立夏，表示夏天的开始。

从立夏起，天气逐渐转热，人容易感到烦躁不安，因此切忌暴怒，尽量保持心情舒畅、安宁。有些人因为体质虚弱，加上感受暑热之气而引起乏力倦怠、眩晕心烦、多汗纳呆或有低热，俗称“疰夏”。“疰夏”是中医特有的病名，又叫“苦夏”。

江南地区有立夏日称人的习俗，旧时人们以为立夏日称人不会疰夏。

关于称人习俗的由来，各地有不同的传说。有说三国时蜀国刘阿斗投降晋朝后，孟获每年立夏要去洛阳称阿斗的体重，以验证晋朝是否亏待了阿斗；也有说阿斗幼年时被孙夫人带至东吴后，每年立夏称阿斗体重。

为了预防疰夏，在饮食上应多食清淡和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以清热、防暑、敛汗、补液并增进食欲。

苏州一带有“立夏见三新”的俗谚，“三新”指新熟的樱桃、青梅和麦子，还有吃新鲜的蚕豆、咸鸭蛋、乌米饭等习俗。

“曩时”，即往时、以前。

一百八十七、端午旧俗

东洋久已划船空，照眼榴花依旧红。
亲制健人符一个，替郎常佩内衣中。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的法定假日，并已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有几种传说。较为普遍的说法是纪念屈原。相传屈原于五月五投汨罗江，人们在此日划龙舟、裹粽子以为纪念；但在江浙一带另有一说，据说伍子胥含冤而死，于五月初五被投入大江，化为涛神，端午节是为纪念伍子胥。

在先秦时代，人们认为五月是毒月，五日是恶日，相传此日五毒并出，故而形成了一系列辟邪镇恶的习俗。人们在此日挂菖蒲、蒿草、艾叶，熏苍术、白芷，喝雄黄酒，佩戴健人符、香囊，用雄黄酒在儿童额上写“王”字，在儿童衣衫上绣“五毒”(蝎子、蛇、蜈蚣、壁虎、蟾蜍)。

明清时，盛泽有端午节东白漾赛龙舟的旧俗，“东漾划船”是明代卜梦熊先生所题“盛湖八景”之一。

“榴花”即石榴花。石榴夏季开花，唐代韩愈有《榴花》诗曰：“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

“健人符”：旧时，人们以艾叶制成人形，于端午日佩戴于衣衫上，以为能辟邪去病，名为“健人符”。

一百八十八、暑月食素

暑月宜存澹泊怀，观音斋后又雷斋。
素馄饨与素浇面，却比鸡豚滋味佳。

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的季节，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容易出现全身乏力、食欲不振、出汗、头晕、心烦、昏昏欲睡等症状。

中国的传统养生学认为人们在夏天应尽量保持淡泊安宁的心情，饮食宜清淡，故而旧时民间有暑月多吃素食的习俗，素馄饨、素包子、素浇面大行其道，熟食店也按时令推出素鸡、素火腿等各种美味豆制品及其它素食品。

“观音斋”、“雷斋”：信仰佛教、道教等宗教的人所吃的素食称“斋”，“斋”的意思是“戒其心、身、口也”。佛教与道教都很重视斋戒，认为饮酒食肉会使人神志不清明，在斋戒时应心无妄念，身无妄行，口无妄言。最虔诚的信徒往往吃长斋，长年不吃荤酒。这个“荤”不仅仅是动物性食物的“荤腥”，还包括佛家所说的有辛辣异味的“五荤”：葱、蒜、韭、薤（藠头）、兴渠（产于西域，生熟皆臭如蒜）。有的信徒则吃其它的各种“斋”，如“观音斋”（观音菩萨的三个生日：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吃素）、“雷斋”（农历六月二十四是雷尊诞辰，自六月十五至二十四吃素）、“罗汉斋”（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吃素）等。

“豚”即猪。

一百八十九、七夕乞巧

七夕斋星瓜果堆，轻红染上玉尖才。
一宵离别诉难尽，犹盼天孙送巧来。

七夕节，又称乞巧节、女儿节。农历七月初七，俗称“七夕”，旧时风俗，少女们于七夕之夜，在庭院中摆设瓜果以及针线女红，向织女星乞求智巧，称之“乞巧”。南朝《荆楚岁时记》载：“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锄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

七夕乞巧最早源于对自然的崇拜。随着人们对天文的认识和纺织技术的产生，就有了关于牛郎星和织女星的传说。传说中的织女“巧于织造”，故而成为少女们崇拜的偶像。

汉代，女子们在七夕夜把一种小蜘蛛放在盒子里，“以其织网的疏密为巧拙之征”；唐代时，则将蜘蛛放在瓜上；到了宋元时期，则“视水中针影占拙巧，细长则巧，散则拙”。至近代，乞巧的方式大多是少女们穿针引线比试技巧，有的用面粉制成各种形状，用油煎炸，名为“巧果”。此夕，少女们还摘取红色凤仙花瓣，捣成汁染指甲。

“天孙”即织女，《汉书·天文志》载：“织女，天帝孙也。”唐朝唐彦谦的《七夕》诗曰：“而予愿乞天孙巧，五色纫针补衮衣。”

一百九十、观音赛会

观音赛会肇天崇，总角彩衣萃百童。
罗绮金珠争斗富，后人踵事失遗风。

观音赛会又称中元赛会，是盛泽所特有的民俗活动。

中元节本是道教的节日，在农历七月十五，是祭祀先人的日子；而佛教徒也在此日举行“盂兰盆会”超度先人亡灵。据佛家所说，旧历七月亡灵都归观音的化身所管辖，故而盛泽的中元赛会请出观音塑像巡行于市，称观音赛会。

据《舜湖纪略》记述，观音赛会始于明朝天启、崇祯年间“里人徐隆溪家”，后来此俗愈演愈烈，由盛泽的绸行、领投、染练坊等行业募资，成为绸商们争奇斗富的场所。

自农历七月十三至十六，由东庙、西庙请出的观音、韦陀塑像以及仪仗队、民乐队、荡湖船、灯船、采莲船、龙船、荡秋千、掮阁、抬阁等组成的队伍沿全镇主要街道游行，“罗绮金珠，焜耀夺目”，万人空巷争相观赏。

队伍中还有“童子百人，总角彩衣，或捧佛，或执炉，相间而行。行六七步，执炉者转身，向佛口诵佛号，作礼拜状”，故而又名童子会。

“肇”意为开始，“天崇”指明代天启、崇祯年间。

“总角”：古代，未成年的人把头发扎成髻，称总角。“彩衣”：指戏剧表演中的服装。

“踵事”意为继续前人之事。

一百九十一、中元对歌

汤家汇里斗山歌，信口成腔音节和。
借问歌中何所有，燕私语杂别离多。

中元对歌是盛泽丝绸行业所独有的习俗。

盛泽一带的居民世代以丝绸为业，旧时几乎每家都从事种桑、养蚕、缫丝、织绸或丝绸贸易。自明代中叶起，盛泽及周边乡村出现一批专业从事丝绸织造的作坊，雇用织绸工和拽花儿（在旧式花机的花楼上人工提花的少年）日夜轮班织绸。

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是旧时重要的节日，各丝绸作坊按例放假。中元之夜（或前一夕），盛泽四乡的佣织少年与拽花儿聚集在东庙前的汤家汇（即夜船汇）及昇明桥斗唱山歌。斗唱之人多达数千人，“喧闹达旦”。歌唱者往往自编歌词，内容“多赠答之词，表达燕私离别之情，令听者移情动容”，“其旁引曲证、假物借声之法，淳朴纤巧无所不全，不失乐府本旨”；“其唱法初则高亢，而收尾时清悠和缓”，悠扬动听。

自古以来，江南的吴语地区流传着一种民间的山歌，称之“吴歌”，是民间的口头文学创作，主要依靠口口相传，代代承袭，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间韵文形式，盛泽的中元对歌属于吴歌的一个分支。

一百九十二、宝塔灯

溺鬼云难觉岸登，须将佛火照波澄。
黄昏日落儿童喜，处处桥心宝塔灯。

旧时，农历七月十五是个重要的节日，道教称中元节，佛教有盂兰盆会，是所谓的三大鬼节（清明节、中元节、十月初一寒衣节）中最重要的一个。

传说此日地宫打开了地狱之门，已故的祖先可以回家团圆，因此家家会祭祖、上坟，寺院、道观也会设道场、做法事为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超度灵魂。

古人认为，上元节（元宵节）是人间的节日，人们张灯结彩庆元宵，中元节是鬼节，也应该张灯，但是人为阳，鬼为阴，故而中元节所张的灯是与水相伴的水灯和桥灯。

旧时盛泽习俗，进入七月后，镇区的桥面上竖起两三丈高的巨木，用竹篾编成灯架，悬起一串宝塔状的灯，俗称宝塔灯。此灯一直会悬至中元节后才收起。过去，各街坊都有自发组成的人员轮流管理每年的张灯事宜。按民间的说法，点宝塔灯是“佛火照波”，为溺水而死的亡魂指点路径。

“觉岸”为佛教用语。迷惘如海，觉悟如岸，由迷惘而到觉悟的境界称为登觉岸。

一百九十三、盂兰盆会

盂兰盆会盛河干，铙钹喧天夜结坛。
到处鸣锣化纸锭，水灯散放月中看。

盂兰盆会又称盂兰盆节，一般在农历七月十五前后举行，是汉传佛教根据《佛说盂兰盆经》而举行的一种超度历代祖先的佛事，源于佛陀的弟子大目连犍尊者救母的佛教传说。自南朝梁武帝时期起，在中国各地逐渐形成了在盂兰盆会期间拜祭先祖、超度亡灵、送走灾祸疾病、祈求吉祥平安和放焰口、施饿鬼食、在河中放水灯等民间习俗。

盛泽旧俗，农历七月“各坊建盂兰盆会”，放焰口超度孤魂。“两小儿扛竹竿，一人鸣锣，高呼：‘化纸锭！’”至夜间，以油纸制成灯，放至河面上，名为“放水灯”，又称“照冥”，为孤魂照明引路。

放焰口是一种为饿鬼施食的佛教法事。在街口和村前搭起法师座和施孤台，法师座前供地藏王菩萨，施孤台上立着灵牌和招魂幡，供着大米和面制的桃子，祭品上插三角纸旗。仪式在乐声中开始后，法师敲响引钟，带领座下众僧诵念咒语真言，然后施食，将面桃子和大米撒向四方，反复三次。这种仪式叫“放焰口”。

“河干”，即河边、河岸。

一百九十四、狗屎香

狗屎香烧光满庭，人缘藉此结幽冥。
门前加个双红烛，知是昨宵添一丁。

农历七月三十传说是地藏王菩萨的诞辰。旧时此日，镇中妇女都去昇明桥北堍的地藏庵（即法轮禅院）进香。此夜，大家小户都在庭院中或门前燃点香烛，蜡烛之数与家中人数相等，如果家中新添小孩，则燃双红烛。此外，又将木屑、竹头和油脚置于地上焚烧，名为“狗屎香”。民间以为烧狗屎香“可结来世人缘”。

在苏州一带，烧狗屎香另有一种传说。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盐贩出身的张士诚占领平江城（今苏州），自称姑苏王。由于张士诚实行增收减税政策，因此颇得民心。后来朱元璋举兵围攻苏州时，苏州百姓主动协助张士诚守城，朱元璋久攻不下，对苏州百姓恨之入骨。

朱元璋攻占苏州后，为发泄心中仇恨，对苏州地方苛以重税重赋，故而苏州百姓更加怀念张士诚。七月三十日是张的生日，家家在门前地上燃香，名义上庆贺地藏王诞辰，实际为纪念张士诚。因张士诚小名九四，故而称之“九四香”。九四与狗屎谐音，久而久之，九四香被讹传为狗屎香。

一百九十五、重阳节

花船汇上菊花来，佳节重阳把酒杯。
莫道登高无雅兴，四围平野少崔嵬。

农历九月初九为重阳节。因《易经》中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两个九相重，故而称“重阳”或“重九”。

农历九月是丰收的季节，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九月祭祀天帝、祖先以谢恩的活动，后来重阳节与清明、中元、除夕一样成为祭祖的重要节日。

据汉代《西京杂记》中记载：“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当时的重阳日已有了求寿之俗，故又称“老人节”。1989年，重阳节被定为中国的“敬老节”，倡导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

民间有重阳节登高、赏菊花、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的习俗。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但盛泽地区是平原水乡，每到重阳无高可登，只能去郊外“踏秋”。

旧时，花船汇是卖花船聚集之地，每到重阳日，镇民来此选购菊花。

“崔嵬”指高山。

一百九十六、烧香船

一站吴兴石冢村，愚氓哄动祀淫昏。
香船日泊舜湖畔，赢得丐头利薮存。

旧时，一般老百姓大多缺少科学文化知识，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神佛身上，许多镇民村妇到处烧香，求神拜佛，祈求菩萨和诸神的保佑。

过去，江南城乡的寺院、道观、庙宇极多，一年四季都有庙会、神诞、节日，热衷于烧香的人常常乘坐烧香船赴外地进香。烧香船一般都是农船或租用的航船，船尾插上朝山进香的黄色旗帜，进香之人身背黄色香袋，内藏香烛，一路念诵经文，极为虔诚。

民国初年，湖州城南五十里的石冢村有座南堂殿，据说菩萨极为灵验，盛泽的善男信女纷纷坐烧香船前去进香。每年七月至九月，烧香船麇集于西白漾湖滨。按历来陋习，丐头向每艘香船索要一至两角，据说一年可得数百元。

“吴兴”：湖州市旧名吴兴郡。

“一站”：旧时出门大多乘船，一站指船行一天的路程，大致为数十里。

“淫昏”是沉迷的意思。

“丐头”指乞丐中的头目。

“利薮”意为财利聚集之处。

一百九十七、“开租欠”

粜将新谷典春衣，三日还租限趁飞。
哪计终年妻子食，免教开欠入圜扉。

旧时，许多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或缺少土地，只能向地主租田耕种，沦为佃农。

佃农耕种地主的土地，但自有一定的劳动工具、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形成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家庭经济。在封建地主制经济下，早期的佃农与地主之间存在着依附关系，除了缴纳地租外，还要承担各种劳役。清代，随着定额租制、永佃制和押租制的推行，佃农取得了安排生产的自由，与地主之间开始具有契约关系的色彩。

由于田租极重，佃农生活都极为艰难，青黄不接之时，常常需“典春衣”度日，待“粜将新谷”后再赎回。

每年初冬新谷登场，地主们“设栈收租”，凡未到限期三日中已交完地租的佃户，可享受一定的优惠，称之“飞限”。对于迟迟不交地租的佃户，地主通过官府将佃户押入班房追租，名为“开租欠”。佃户对此“畏之如虎”，只能不顾家中有无口粮，先将地租交清。

“粜”：卖出粮食。

“典春衣”：典当衣物。语出杜甫的诗句：“朝回日日典春衣”。

“圜扉”：狱门，借指为牢狱。

一百九十八、小年夜

家家南货打来忙，掸去埃尘送灶王。
漫道家庭无失德，胶牙多用几分糖。

进入腊月，家家开始为过年忙碌。除了买肉，买鱼，杀鸡，宰鸭，制作酱肉、酱鸡、风鱼、风肉，为年夜饭作准备外，临近年终时，还要去南货店购买瓜子、花生、红糖、白糖，准备新年中待客的茶食点心，家家显得嘈嘈杂杂忙忙碌碌，名为“打南货”。

小年夜是腊月中的重要节日。在南方，小年夜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北方是二十三，有些地方则是除夕前一天，此外还有“官三民四船五”之说，即官家二十三、百姓二十四、船民则是二十五日。

旧时，“掸檐尘”与“送灶”是小年夜必须做的事。

灶神，又称灶王或灶君，负责监督每一家的善恶，并用灰尘在每家的檐下或墙壁等处做上记号，小年夜上天庭时向天帝汇报，因此必须在小年夜掸去檐尘，“以灭其迹”。

为了讨好灶神，每家都会在小年夜祭灶，为他饯行。祭灶时所用的供品主要是胶牙糖（麦芽糖）和汤饼之类，为的是把灶神的牙齿粘住，到了天庭不能说坏话。祭完灶神后，再将灶神的像请至天井焚烧，称之“送灶”，到除夕夜再换上新的灶神像，贴上“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的对联。

一百九十九、祭年神

岁事将阑祀事明，高烧绛腊展三牲。
哪知罗拜诸神像，半是稗官点缀成。

旧时每至除夕，不仅要祭祀祖先，还有祭祀年神的风俗。在除夕前的几天里，各家都在正屋上方悬挂起各种神像，供上猪头三牲和蔬果，燃起大红蜡烛，由一家之主带领全家人顶礼膜拜，祭祀年神，称“过年”。

祭年神时，所悬挂的神像往往神仙儒佛兼而有之，其中半数出自《封神榜》。

中华文化是由多元文化融合而成的悠久文化，每一种宗教都在流传的过程中融入了其它宗教和儒家文化的元素，故而民间的信仰也常常出现儒释道兼收并蓄的现象。如三国时的关羽，在佛教、道教和儒家文化中都成为崇拜的偶像。

“阑”：尽。

“绛腊”：红烛。

“三牲”：指祭祀所用的三种牲畜。民间泛指的三牲有大小之分，大三牲指猪、牛、羊，小三牲指鸡、鸭、兔或鸡、鸭、鱼，后来也指猪、鸡、鱼。

“稗官”：小官。《汉书·艺文志》载：“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后来称野史小说为稗官。

二百、过房亲

过房儿女盼新年，红线双穿压岁钱。
烛礼答来赢过当，豚蹄鱼脍满堂前。

中国人历来重情义，民间除了血亲、姻亲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亲情，叫“认干亲”，俗称“过房亲”，也就是认义父、义母。北方人叫认干爹、干妈，南方人叫认寄爷、寄娘或过房爷、过房娘。

过房亲一般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孩子出生后，因体弱或娇生惯养，怕不好抚养，于是找一家人丁兴旺或者小孩强健的人家认过房亲，祈求孩子能顺利成长。第二种是按照旧时的迷信习俗，孩子的八字与父母相冲，怕难以养大，便将孩子过房给八字相合的人家，有的甚至改姓过房爷家的姓氏（称寄名出姓）。另有一种是在相互关系密切的家庭之间，为了进一步增进友谊，让子女与对方结成过房亲。

这类过房亲与收养过继子女有所区别。一般的过房亲，双方之间没有抚养和赡养关系，也没有财产与责任的继承关系。

按旧俗，每年的年终，过房儿女家买了寿烛和礼物去拜望过房爷娘，过房爷娘则答以压岁钱，并留过房子女吃丰盛的年夜饭。

“豚蹄鱼脍”：泛指丰盛的菜肴。“豚”指猪，“脍”的原意是切细的生肉。